

C H I N A S P R I N G

中國之春

總第四期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中國大陸又搞肅反了

六屆人大內幕

兩起遣返留學生回國事件

褚建剛參加中國之春

王希哲（電影文學）

台灣民主化的障礙



愛國的人們，警惕呵

——評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的通知」——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正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大力渲染他們經濟上的改革的同時，政治上的控制正在朝收緊的方向大踏步前進。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的通知》（原文附後），對於民運人士來說，是一個信號彈，對於善良的“幻想派”來說，則是一帖清醒劑。

“似曾相識燕歸來”。讀了《通知》，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民，都會倒抽一口冷氣，《通知》裏面的行文和用語，全部不陌生。有可能的話，人們就不妨翻閱一下歷來的中共中央文件，諸如著名的《公安六條》，“一九七九第九號文件”“七·三、七·二四佈告”等等。還可以對證一下「一打三反運動」「策反勾聯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等等的文件。年紀大點的，還可以一直上溯到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肅反運動」、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等等歷次政治運動的文件。不管你對這些文件的評價如何，你都不得不承認，它們的口氣，是多麼驚人的雷同！

有一句科學名言說：“凡是規律性的東西，都是在歷史上反復出現多次的”。

《通知》的決策人，又怎能向人民證明，這“反復出現”、今天又一次出現的“肅反”運動文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規律性的、本質上的東西呢？

要問，這次有點新貨嗎？

有。《通知》曰：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個可愛的東西。愛國主義人人

誇，賣國主義人人罵。所以，七十歲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罵了好多年。

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來：愛國不等於愛黨。愛中國不等於愛中國共產黨或者某某黨。愛祖國也不等於愛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愛「無產階級專政」。

建議中共中央以後發文件，一律在「愛國」一詞前面，冠上定語：熱愛某某人爲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的祖國，（至於定語太長顯得累贅，也沒有辦法。）以免混淆視聽。

還值得指出的是，刑事罪，叛國犯，是各國都有，美國也不例外。這是世界通病，人類共同的悲哀。然而以點當面，無限擴大打擊，却是中國的「專症」。危言聳聽，混淆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一貫故法。而以執政黨的名義，頻繁地濫發中央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運動」，來轉移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呢，則以中國共產黨爲第一。

因此，我們要愛國，但不要如假包換的“愛國主義”！拜託。

十八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 JOHNSON)曾痛心地指出：「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白樺在「苦戀」裏也借主人公的嘴飽含熱淚地說過：“我不是不愛祖國，而是祖國不愛我呵！”這些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們的話，可以作讀《通知》時的一種旁白。

在這裏，我們要請善良的人們注意了，《通知》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行動作爲注腳的。《通知》發出後的這六個月裏，戴枕、羅孚的嚴刑，劉山青，黃賢的重判，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事出有因。這是又一次“運動”犧牲品的政治需要。到底還需要多少人的犧牲才能使

這一次運動告一段落呢？我們且拭目以待。

善良的人們應當注意了，《通知》也絕不是光抓幾個人就完了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既定方針」。光是看一看最近宣布正式成立的「國家安全部」和正式的警察部隊，效法蘇聯的KGB，使秘密警察統治國家合法化，這一點，就會令那些只會「歡欣鼓舞」農民多了幾分自留地的理論家們，少却一些書生氣。

善良的人們，還有不應上當的地方，你可以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第一次，痛哭流涕的“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你還可以相信他們的第二次，誠懇萬分的“階級鬭爭已經基本結束”，“今後再不搞政治運動”的承諾；看了這《通知》後，你還要不要相信他們第三次，

第四次，……直到無完無了的“無產階級專政結束”的那一次呢？

《通知》特別要引起留學生們的警惕。這個文件的中心思想是狠狠鎮壓，打擊“叛國者”。遙想建國初期，多少優秀兒女被派往蘇聯留學。但曾幾何時，他們又成了運動對象，一些人被打成“蘇修特務”。目前中國的外交政策反反覆覆，今日的留學生，怎能保證今後不被打成“美國特務”“日本特務”呢？

中國當局爲了給《通知》的出籠製造輿論準備，重判了爲民主運動出過力的戴枕，國內《羊城晚報》一馬當先發表了專文，就讓我們借用它的題目，來作本文的題目吧。

「愛國的人們，警惕呵！」

編者按：
此件由國內轉來，來函稱：「這是聽取傳達時根據錄音整理的。幾個朋友經過核對，原意無誤。」

中共中央文件

《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軍兵種、野戰部隊黨委，軍事院校，政府直屬機關、各部委黨的核心小組：

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爲完成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加速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一小撮反壞分子在各地能鑽空子的地方進行各種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背叛祖國的現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在各地利用我國建設中的薄弱環節，進行反革命誹謗、攻擊黨和人民政府、組織反革命地下軍；利用我國的包產承包制、進行經濟結黨；同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外國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勾結、秘密接觸、電訊來往、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有的地區和單位、個別人甘受欺騙，唯利是圖、利用各種方便、處心積慮地攫獲各種途徑，唾棄家庭、背叛祖國、以行動公然幹出損害祖國利益的勾當。爲了維護社會主義建設成果，更廣泛地動員和發揮我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建設四個現代化，中央要求各級黨委，認真抓好如下工作：

1. 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次愛國主義的教育，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學習黨的重要文件，要組織愛國演講會。
2. 公安、檢察院、法院單位要派出宣傳員到各工廠企業，宣傳法律，宣傳共產主義與愛國主義和叛國刑事事例。
3. 各地區各單位要配合公安部門抓好戶口管理制度。
4. 人民解放軍和各地區保衛部門，在加強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要徹底抓好肅反工作，注意打擊美蔣特務分子和各國在中國進行顛覆、搗亂、破壞的特務集團，堅決肅清國內的反革命。對裏通外國，特別是犯有叛國罪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堅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5. 各地區、各單位，特別是科研教育部門，在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同時，要抓好思想工作。對出國的我國留學人員，要認真審查，要注意關心他們的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
6. 我國的海關、邊防幹警、人民解放軍各單位，邊疆民兵要在最短時間內，實行崗位責任制，保衛祖國的邊疆，嚴防階級敵人的滲透。
7. 在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中，要獎懲分明，要把它當作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項目來抓。

此文件發至縣團級黨委。

中共中央 1983.2.25

總第四期



目 錄



社 論

愛國的人們，警惕呵！

(附錄) 中共中央文件 “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的通知”

國內動態

評李先念的當選 柳 平 (北京) 6

國家安全部豈能保安全 木 易 9

報 導

〔國際反極權〕大會 本刊記者 長 弓 10

歡迎褚建剛參加“中國之春” 本刊評論員 14

(附錄一) 參加“中國之春”申請書 褚建剛

(附錄二) 湖南花鼓團給褚建剛的一封信

留學生園地

中國留學生的人權 本刊特約評論員 16

波士頓〔包斯琴事件〕調查報告 本刊記者 19

羅切斯特〔陳韋事件〕調查報告 本刊記者 20

大陸專欄

民運的火炬 方 丹 (香港) 25

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 徐 山 (鄭州) 28

〔一胎化〕政策質疑 黃 醫生 38

香港專欄
台灣專欄

香港之〔戰〕 怡 文 (芝加哥) 40

評台灣民主化的兩大障礙 余 軍 43

祖國未來	還是計劃經濟好	兆立	45
	為私有制平反	士心 (波士頓)	47
雜文	蔣經國與王希哲	流螢 (舊金山)	49
	簡介 [政治空間]	史均	50
	論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性	共芝	51
	幻影 [五·一六]	鮑布平	52
來信摘登	一個外國友人的來信	比爾·卡洛 (加州)	54
	但願某個春天	李燕 (台北)	
	請不必介意	藍之國 (荷蘭)	
	中國人的恥辱	劉協鷹 (多米尼加)	
	謊話多說幾遍就成了真話	王慧 (美國加州)	
	"告海內外同胞書" 評註	徐志宣 (香港)	
	有客自大陸來	謙明 (中國留日學生)	
	不要與政府勢不兩立	黃果益 (中國留學生)	
	沙灘上的大廈	陳之榮 (加拿大)	
	由它去吧!	陸華 (中國留學生)	
	羣衆運動	黃宗霑 (台灣)	
	很高興你們發表了主張	程屏 (美國)	
文藝	寄遺孤	卜友書	39
	自由歌	鄭保羅	39
	雨水	燕君	59
	懷念林志毅君	蔡可風	60
	王希哲 (電影文學)	小楓	62
資料	波蘭團結工會	史鋒 (香港)	69
	中國之春第三號公告		
封底	貓 (畫)	李爽	

評李先念的當選

——六屆人大幕前幕後

柳平（北京）

這次六屆人大選擇了李先念為國家主席，國內各界早有預料，中南海大院也多次放出風聲。

北京的機關大院裡傳出話說：“先念同志出任國家主席能擺得平”。擺得平，是權力暫時平衡的褒性解釋。問題接着就出來了，權力平衡是指哪一派與哪一派之間的平衡？中央新的派系是什麼？為什麼要搞這種平衡？

答案要從今年二月份「人民日報」的一份漏報事件開始慢慢尋找。

趙紫陽漏提李先念

「人民日報」1983年2月8日有一份報導云：趙紫陽總理2月7日在人民大會堂向參加「北京軍區離休幹部茶話會」的老幹部們發表慰問講話。該報導指出：“趙紫陽受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委託，向離職退休的同志，表示節日的問候（節日指“二、七”大罷工）”。習慣於從報紙的報導縫中觀察中央是否出事的北京群眾，一下子議論起來了：“胡、葉、鄧、陳、趙都是中央常委，為什麼六名常委中偏偏少了李先念？是趙紫陽在講話中故意不提李先念，還是「人民日報」在報導時刻意剔除了李的名字？好事者立即打電話向「人民日報」社詢問。人們之所以對李先念這麼敏感，是因為昨日（2月7日）人民日報還報導說，李先念和鄧小平、葉劍英三個常委為“二、七”大罷工六十周年題了詞。李先念的題詞是：“中國工人階級要發揚「二、七」革命傳統，永遠不忘過去，正確對待現在，努力創造未來！”本來，人們對這類題詞並不感興趣。趙紫陽漏掉了李先念的大名，反而吸引了好奇者翻回了昨日的人民日報，細細品味着李先念題詞的滋味。是否李對某些人不滿而利用題詞進行發洩？趙紫陽是否秉承了什麼人的旨意，在次日故意將李的名字刪掉，放個試探汽球？正當人們問號越來越多之時，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來了一個“重要補正”，指出二月八日的報紙把李先念漏掉了，要予以重要補正。

這一“重要補正”，更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中央常委中，竟然有一人被不小心漏掉，

總共才六個人頭嘛。“不小心”能解釋得了嗎？本來對2月8日的消息未留意的人，看了這個“重要補正”也議論起來了。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趙紫陽在講話中提沒提李先念？如果趙沒提，那是趙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趙在講話中提到李先念，人民日報在報導時將李的名字刪去，就有受人指使，別有用心之嫌。

幾經周折，終於在一位2月7日到人民大會堂參加離休退休幹部茶話會的老首長處得到消息：他不記得趙紫陽在講話時提到李先念的名字。看來人民日報沒有責任。

新的問題接着產生：趙紫陽漏提李先念，是一時的疏忽，屬於個人責任，還是預先的策劃，故意而為？這個問題的答案除了趙紫陽本人外，最多只有四人可能知道：鄧小平、胡耀邦、陳雲和葉劍英，想從這些人的口中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這個小小的風波，把李先念帶入了議論的旋渦，直到六屆人大前後。

李先念——中國的米高揚

李先念長期以來被北京群眾比喻為中國的米高揚。米高揚為蘇聯高層的三朝元老，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主管過經濟工作，米氏在斯大林時代開始升遷，赫魯曉夫時代走紅，勃列日列夫將赫魯曉夫搞垮後的一段時間，米仍居高位而不倒。李先念簡直就是米高揚在中國的化身。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李先念受周恩來總理提拔而成為政治局委員。文革開始到1969年的“九大”，原“八大”政治局委員中，除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四大頭外，其餘全被刷了下來，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賀龍等，唯獨李先念一直保住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陳伯達、康生在“八大”時僅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葉劍英僅為中央委員）。李先念在文革中，未受過什麼實際上的批鬥，一直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陳毅垮掉後，李經常接見外賓，有代理外長的風範。所以，他大體上是被林彪、四人幫接受的人物，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十二中全會及“九大”上都被圈入政治局，比起其他“八大”老政治局委員的遭遇，強上



百倍。林彪集團垮台後，李先念亦穩如泰山。四人幫完蛋時，李又成了功臣。華國鋒被解職後，李先念仍居中央副主席和常委要職，一直到最近達到他人生政治生涯的巔峰，出任國家主席。

李先念充當五朝元老（第一朝“八大”，第二朝文革毛林內閣，第三朝十大四人幫內閣，第四朝華國鋒內閣，第五朝胡耀邦鄧小平內閣）的經歷，深刻地打着黨內派系鬭爭的烙印，反映了他調和、搖擺、隨大流的性格，試舉幾個事實：

1967年“二月逆流”時，陳毅、譚震林、葉劍英等聯合反對林彪奪權，李先念隨了大流。林彪、四人幫的文革派對“二月逆流”懷恨在心，分頭從各口炮轟國務院，以孤立周總理，粉碎二月逆流派。財貿口、衛生口分擔了炮打李先念的任務。李先念見勢頭不對，立即左擺，承認“錯誤”比較徹底，揭發劉、鄧也較為堅決，較陳毅、譚震林態度好得多。林彪、四人幫視李為劉鄧司令部中分化出來的樣版，採用了聯合的作法。

1974年，鄧小平在周恩來的力保下復出。四人幫因“紅都女皇”事件暫時處於劣勢。李先念此時順應形勢而右擺，支持鄧小平的整頓。

1976年元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毛澤東也病入膏肓。據傳，當時政治局開會確定新總理人選時，一派支持鄧小平出任，因鄧為第一副總理。四人幫一派推張春橋，理由為張是第二副總理，鄧小平犯了右傾翻案的錯誤，無資

格繼任。兩派相持不下，幾次會議無結果。起初，以防中國赫魯曉夫的出現，毛澤東在兩派相持的情況下，密晤華國鋒，向他講述漢高祖劉邦臨終前授權心腹除掉政敵的故事，明確表示希望抬出華國鋒，打掉鄧小平。華心領神會，受寵若驚，手持聖旨拉攏了吳德、紀登奎、陳錫聯等人，在政治局會上一反常態，大反鄧小平，使會議形勢急轉直下。毛澤東見機行事，委任華國鋒代國務院總理職務，以息內哄。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又一次搖擺，倒向華國鋒一方。天安門事件前後，李先念和胡喬木等更揭發了鄧的右傾翻案錯誤。李的左擺，在當時確定華國鋒的位置上起了重要作用。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內鬭又起。李先念、葉劍英、汪東興等支持華國鋒逮捕四人幫。出於黨內外壓力，李先念、葉劍英等也同意鄧小平復出，但以不威脅華國鋒主席地位為前提。鄧小平1978年底開始排擠華國鋒時，李先念是持反對意見的。1980年後，待到鄧小平勢力已經坐大，準備將華趕下黨主席寶座時，李先念再度右擺，投了贊成胡耀邦當黨主席的一票。

然而，鄧小平對李先念曾在關鍵時刻背叛他一直耿耿於懷。鄧把華國鋒擠掉後，開始向華的後台李進攻。今年年初，鄧成功地逼葉辭職。某些人認為，下一個就該輪到李先念了。

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怎麼能夠走上國家主席的位置呢？歷史的經驗表明，調和、搖擺的人物，有時固然危險，但“識時務者為俊傑”者，常又來被用做平衡各派勢力的支點。這次李又充當了這樣的角色。

六屆人大前鄧胡矛盾的表面化

其實，真正關心六屆人大的北京人寥寥無幾。這給採訪內部消息，造成不少困難，盡管如此，一些大院內還是有些特別的議論。

議論之一，是國家主席可能由胡耀邦出任。消息來源說，胡想強化自己在黨、政府中的地位，擺脫受鄧小平操縱的形象。

胡耀邦在京城綽號是“胡里胡塗還要人幫。”去年十二大時，人民日報發過不少照片，其中兩張意味特別。一張是鄧小平指着胡耀邦進行指點，一張是鄧小平坐在中間，旁邊陪伴着胡耀邦、趙紫陽等。二張給人的印象是，胡耀邦完全是個傀儡，與外號“胡里胡塗還要人幫”合拍。有人說，胡對這些照片的處理曾大皺眉頭。

胡想擺脫鄧小平的控制意向由來已久。白樺的“苦戀事件”時，即已有顯露，胡耀邦的兒子曾對人說過，他爸爸胡耀邦認為“苦戀”是個好電影。電影製片廠也在胡耀邦的默許下進行拍攝。後來，軍中左派發起對“苦戀”的批判，使鄧小平不得不也看了“苦戀”。據傳

中共中央百老翁

，鄧不滿地說：“這怎麼行？這不是說共產黨比國民黨還糟糕嗎？”爲了緩和與軍中左派的矛盾，表明他“四個堅持”的堅定立場，最後點頭同意批一下“苦戀”，并指示胡耀邦照辦。胡當時即有不服，不願意做否定自己的事。然而，在鄧的指令下，胡只好忍氣吞聲派人到電影製片廠做解釋工作，把“苦戀”槍斃了。胡對此事一直不服，後來，廣大知識份子和海內外輿論對批判白樺表示憤慨時，胡曾向鄧施加過壓力，表明自己的意見。鄧小平終以解職解放軍的趙易亞，對極左派和白樺爲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派各打五十大板，平息了這場爭論。

據說，胡耀邦曾研究過蘇聯的政經體制，做出“中國搞成蘇聯那樣就不錯了”的結論，有明顯向蘇聯靠攏的傾向。對蘇聯更爲了解的鄧小平，始終對蘇聯六十年代的霸道作風存有介意，而且也生怕否定了他六十年代初期勇敢反修表現，對蘇聯關係的處理，一直小心翼翼。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已效法蘇聯（總書記制）。六屆人大前幾個月，北京又出現胡耀邦準備出任國家主席的議論，這是不是胡耀邦想步勃列日列夫の後塵，充當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故意放放空氣呢？

六屆人大前，北京還有過一些議論，說趙紫陽可能出任國家主席，總理由萬里或姚依林接替。

人們推論，不管胡耀邦、趙紫陽本人意向如何，六屆人大前胡趙可能出任國家主席的輿論，反映了第二代共產黨人要第一代共產黨人徹底交權的意願。

顯然，鄧小平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葉劍英等軍方派，他們對葉劍英的被迫辭職心懷不滿，妄圖再奪回一些權力；一方面是胡耀邦等第二代共產黨人，他們要求樹立獨立形象，掌握更多的實權。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又成了平衡各派的最適當人選。

權力鬭爭的新開始

北京城裡的一般老百姓，對上層權力爭鬥已經十分厭膩，對六屆人大難以發生興趣。有的說：“什麼選舉，完全是舉而不選，國家主席候選人只有一個，這叫什麼選，叫推舉算了。”有的講：“主席有什麼用？這種主席席而不主，半點做主的權都沒有，完全是聾子耳朵一一配的。”

較有責任感的人普遍認爲，李先念被推舉爲國家主席，并不代表着權力分配的結束，而意味着新的權力鬭爭的開始。

目前，中央領導可略分爲幾大派：(1)鄧小平、彭真、陳雲爲首的老反毛派，有鄧氏鐵三角之稱，握有實權。(2)胡耀邦的共青團派，比較年青，擺出準備全面接權的架勢。(3)擁毛派，以葉劍英爲首，一部份軍方支持。



李先念被三派所接納，暫時用以維持平衡。可是，李先念已七五歲，而且有較重的慢性氣管炎和輕度心臟病，來日無多。一旦去見馬克思，接替就成了問題。既便長壽到下一屆，也難以連任。那麼，李先念之後的主席人選是誰呢？這倒成了人們感興趣的問題。彭真嗎？太老了，今年八一歲，比李還大六歲。副委員長陳丕顯并不見得被胡耀邦共青團派所接納。

據分析，胡耀邦的共青團派正竭力爭取下屆國家主席的職位。如果遭到抵制，趙紫陽可能會以第二個調合、折衷人物的形象被抬出來平衡。

最嚴重的還是軍權問題。人們一談軍委的組成就搖頭。軍委正副主席鄧小平、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楊尚昆平均年齡超過八十，爲世界有史以來最老朽的軍事首腦集團。問題在於，一旦鄧小平百年之後，誰來出掌軍曹？楊尚昆還是楊得志？他們也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比鄧小平小不了幾歲。人有旦夕禍福，誰走在前面還說不定。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普遍懷疑二楊的能力與聲望。目前的局勢基本上由鄧彭陳三角控制，如果鄧小平出個三長兩短，三角失去平衡，局勢還能穩定嗎？人們真是憂心忡忡。難怪中央高層領導紛紛將子女送到國外，他們大概有某種不祥的預感吧！■

增設「國家安全部」豈能保安全

木 易



公安人員在研究「天安門事件」

據新華社報導，六月六日趙紫陽同志在人大會上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是在複雜的、動蕩不安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爲了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提請成立國家安全部」。

原來當前國際環境是複雜和動蕩不安的，並已危及中國的四化建設。又是「爲了確保國家安全」故不得不新設國家安全部。貌似有理，似應舉雙手贊成。但請問，當前國際環境的複雜與動蕩不安的表徵何在？豈不是杞人憂天。恰恰相反，當前的國際環境較以往數十年穩定和安全得多。再退一步講，即便是在世界的某一地區有些零星的槍聲，又怎能危及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台灣和南朝鮮的經濟起飛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那也正是其近鄰越南戰爭激烈，國際上動蕩不安之時。

強詞奪理與嫁禍於人原是共產黨的傳統手藝。他們歷來把人爲的、制度上造成的災難歸咎於國內階級敵人的破壞；歸咎於國際上的「帝、修、反」；有時還歸咎於上帝的「天災」。自詡爲「改革派」的趙紫陽却重施故技，重彈老調。這也表明在政治上仍沿襲傳統的窠臼，何改革之有？

其實，是國內環境的複雜和動蕩不安，是明擺著的。大陸在「精減機構」的同時，却增設國家安全部，益發表明國內不安全的嚴重性。

大陸的三信危機表明了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了。覺醒了的人民必然起來反抗，起來鬥爭；隨着大陸自由市場的開放與城鄉部份經濟政策的調整，投機倒把，貪污盜竊彌蔓全國；在黨內和軍內派系的鬥爭與權力的爭奪也日益激化，覺悟了的年輕一代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方興未艾，魏京生、王希哲、劉青等民運先鋒被捕，也沒有嚇阻民主運動。廣大民運戰士改變鬥爭策略，轉爲地下活動。有些利用出國的機會留在海外搞民主運動。裏外結合，潮勢洶湧。鄧胡政權在心態上是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這些才是新設國家安全部的主要原因。

其實中共歷來強化保安工作，嚴格控制黨內外的言行。建國前就有中共中央保衛局（鄧發）、中共中央社會部（李克農）、中共中央安全部（康生）。一九四九年建國後，成立了公安部（謝富治），還相繼設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羅瑞卿、謝富治），一九七八年又設立了民政部。現在更設立了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李剛、趙蒼壁）。大陸安全保衛機構之龐大令人乍舌。何以又要壘床架屋再新設國家安全部？它表明這個政權越來越不安全。

中國新設的國家安全部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翻版。列寧時代KGB（原名契卡——肅反委員會）的頭目是捷爾寧斯基；斯大林時代的KGB頭目是貝利亞；勃列日涅夫時代的KGB頭目是安德羅波夫（現已繼承勃氏皇位）。蘇聯KGB權力之廣大，手段之卑劣爲世人罕見。蘇聯人民往往談此變色。捷爾寧斯基殺人如毛，曾引起高爾基等人向列寧抗議，斯大林利用貝利亞的安全部殺掉數百萬人民，在黨內爭權鬥爭中殺掉了百分之七十的蘇共中央委員。也是這個安全部的貝利亞於1953年殺掉了他的老師斯大林。1954年赫魯曉夫又殺掉了貝利亞。這就是蘇聯國家安全部的基本歷史。今天的中共步蘇聯後塵，公然設立中國的KGB，不能不引起我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嚴重關切。其實，用紅色恐怖的「關、管、殺」，絕對不能確保國家安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整個國家的政治局勢，又哪裏是多幾個秘密警察能改變得了的呢？請謹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秦始皇的時代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中國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的。■



「國際反極權」大會

本刊記者

長弓



「爭人權，爭民主，爭自由，爭獨立！」
「不要極權，也不要死亡！」的口號一直震盪着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晚法國巴黎互助大會堂的禮堂。會場內外燈火通明，熱情激揚。來自全世界包括蘇聯、中國、波蘭、阿富汗、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越南、古巴、南斯拉夫、烏克蘭、柬埔寨、英三鼻結、阿爾巴尼亞等二十多極權主義國家內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積極分子，民主運動科學家、作家、詩人、和藝術家以及支持者一千多人歷史上第一次聚集在一起，為爭取在極權主義國家內的人民基本人權與民主，為互相聲援各國的人民自由和解放事業以及更有效地揭露和反對極權主義的統治和擴張，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個全球性的緊密協調的「反極權國際」誕生了！

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反極權爭民主同盟大約在半年前就由來自蘇聯、波蘭、阿富汗、古巴、越南等極權主義國家被迫流亡在海外的著名持不同政治見解的活動積極分子積極籌備發起的。他們包括著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布可夫斯基(Vladimi Boukovski)、作家科茲涅佐夫(Edouard Kouznetsov)、著名的古巴詩人互拉達爾斯(Armando Valladares)、阿富汗國內抵抗運動駐巴黎代表布汗努丁(Said Borhannodin)、波蘭團結工會駐歐洲代表喬耶基(Miroslav Chojecki)、羅馬尼亞著名不同政見作家高瑪(Paul Goma)、及越南海上逃亡生存者協會代表(Vo Van Ai)以及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薩哈羅夫協會。

在籌備以及成立國際反極權爭民主同盟的時候，這個運動還廣泛地得到歐洲以及全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作家、社會活動積極分子、記者、藝術家以及各界社會人士的支持。這些支持者還特別成立了「支持國際反極權同盟協會」，聲援來自極權主義國家內的人權和民主活動分子為爭取恢復他們本國內人民基本權利而進行的鬭爭。在他們中間有：前歐洲議會

主席、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納粹運動著名戰士西蒙·魏爾(Simone Veil, 女)，英國議會下院議員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前南斯拉夫的總統、南斯拉夫政治活動家，「新階級」一書作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西德慕尼黑大學校長勞勃庫威克(Nicolas Lobkowitz)，法國巴黎理工學院院長加朗(Marie-France Garud)，法國政府公共關係部顧問帕魁特(Gilles Paquet)，法國作家協會杰倫(Christian Jelen)，法國著名詩人哈特(Marek Halter)，英國議會上院議員、歐洲議會議員巴西爾(Nicolas Bettiel)，法國著名詩人、法國科學院院士佩香·埃曼紐(Pierre Emmanuel)，法國劇作家，法國科學院院士埃奈斯科(Eugene Ionesco)，意大利人民陣綫總書記富米戈尼(Roberto Formigoni)，意大利自由黨推行委員、歐洲議會議員帕蒂查(Enzo Bettiza)，意大利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意大利參議院議員波尼佛(Argharita Boniver)，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副總書記、眾議院議員瑪佐塔(Roberto Mazzotta)，意大利社會黨參議院議員、歐洲議會議員米勒(Cario Ripa Meana)，西德議會議員斯特芬伯格(Stauffen-Berg)，西德記者協會主席根斯汀梅厄(Cornelia Gertenmaier)，挪威政治活動家霍凡遜(Leif Hovelson)。

來自蘇聯、東歐以及其他地區極權主義統治國家的持不同政治見解的活動積極分子一直在注視及關切我們中國國內的政治、民主和人權情況。特別是非常有興趣地注視着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以及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出現的北京之春和西單民主牆運動。非常注意受到國內極權統治官僚階級壓制的北京之春延申海外。在北美出版中國之春雜誌的短短半年以來，我們就收到數以百計從他們以及世界各地人權和民主運動組織給我們寄來熱情洋溢的信件，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和道義上的支持。

在國際反極權爭民主聯盟籌備期間，蘇聯的著名持不同政治見解的科學家布科夫斯基（Boukovski），古巴著名詩人、由法國總統密特朗親自營救出獄的政治活動家互拉皮爾斯（Valadares）以及波蘭團結工會的代表給我們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發來親筆邀請信，希望我們能同他們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民主和人權運動在揭露和反對極權主義中互相聲援，支持和共同鬥爭。



大會期間展出中國民運資料

中國之春出席國際反極權聯盟大會代表團由五人組成。他們是張偉（中國在美留學生）、陳其琛（中國在美學者）、劉文杰（中國在美學者）、金陵（中國留歐學生）、劉梓榮（華裔越南難民、法國巴黎大學學生）。中國之春代表團于五月十五日上午由美國乘機途經倫敦到達法國首都巴黎。到達巴黎時，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科學家布科夫斯基以及大會秘書長亞歷山大·史密斯（Alexandra Sutmidt）親自迎接了我們代表團。布科夫斯基對我們代表團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他告訴我們說，由于不同的政治意見，他被蘇聯極權政府長期關押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流放長達十二年之久。一九七六年，在一次東西方安排的交換國際政治犯中，他被營救出獄。出獄不久，他就聽到了我們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和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的人權運動。他說，他一直非常關注着我們中國的人權和民主運動，並非常高興地看到中國的人權活動積極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終於走出來同我們在一起在國際政治社會中為爭取基本人權和民主鬥爭。他祝願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成功。他還告訴我們一個小故事。在西伯利亞獄中十二年的生活，是和一個來自中國的政治犯在一起單獨生活的。他說，這位姓 Wang 的中國政治犯因反對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而被蘇聯政府囚禁，布科夫斯基在被國際社會營救出來時，他仍然被囚禁在那裡。布科夫斯基還說，他同那位中國人曾一起在西伯利亞相依為命地被流放了整整十二年。布科夫斯基還對魏京生

、劉青、王希哲等人在獄中的情況表示很大的關切對中國極權政府迫害這麼年輕和獻身于中國人權的積極分子表示極大的憤怒。

國際反極權爭民主同盟籌備委員會在大會正式成立前夕，曾在巴黎盧得易（Hotel Lutettia）大飯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以及新聞界宣布國際反極權聯盟的誕生。記者招待會由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著名科學家布科夫斯基主持。他代表所有參加這個運動來自世界上二十二個極權主義國家內人權和民主運動積極分子闡明了這個運動的目的。

國際反極權同盟將進行如下的工作：

——在全世界來自極權主義國家數百萬的政治流亡者和難民中建立一個有效地揭露和反對極權主義的國際組織；

——有效地協調全世界各國人民為反對極權主義，保障基本人權，維護民族權利的一切政治鬥爭；

——政治和物質上對在處於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民主力量進行援助和支持；

——對專制制度的受害者給予幫助，保衛政治難民的基本權利；

——收集和傳播極權主義國家內的有關消息；

——爭取國際社會承認，並被接納為國際社會的一個政治和公眾機構。

前歐洲議會主席，法國前內閣部長，二次世界大戰抵抗戰士西蒙·魏爾（女）代表所有支持協會成員也在記者招待會中講話。她對所有來自極權主義國家的人權和民主活動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支持。她認為極權主義是今天現代社會的一個悲劇，正在威脅着人類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極權主義無論出現在什麼地方，無論是在蘇聯、波蘭、古巴、阿富汗、中國，或是在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必須堅定地和它鬥爭。她祝國際反極權同盟成功。

包括來自中國之春代表張偉、金陵在內的古巴、阿富汗、中國、越南、莫三比克、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代表也分別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簡短講話。中國之春代表張偉、金陵應邀出席在大會籌備會議委員會的主席台上。在他們五分鐘的簡短講話中，他們簡單地介紹了當前中國人權和民主運動以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情況，以及呼籲世界新聞界對中國極權主義政府迫害國內人權活動分子魏京生、劉青、徐文生、王希哲等人野蠻行為的注意。

國際反極權同盟的成立大會是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晚上九時開始的。成立大會由法

國著名的前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抵抗納粹極權統治自由戰士領導人，前法國政府多次內閣部長，富卡德夫人(Marie-Madeleine Fourcade)主持。當她在大會上回憶起她同戴高樂將軍一起拒絕納粹的極權統治，並領導法國人民起來進行反抗的時候，富卡德夫人博得了全場經久不息的鼓掌。富卡德夫人還提到，由於這個新的國際聯盟的成立，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針對極權主義的威脅和擴張而組成的組織。她回顧了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的人民反抗鬥爭（即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工人不停地鬥爭，阿富汗人民直接起來反對蘇聯極權侵略的抵抗運動和中國的民主牆人權運動。她強調說，支持這些極權主義國家內民主力量反對極權的統治是我們民主力量義不容辭的責任。

來自蘇聯、古巴、阿富汗、中國、越南、烏克蘭、保加利亞、柬埔寨、安哥拉、和羅馬尼亞的反抗和民主運動的代表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

阿富汗國內極權主義抵抗運動的代表布汗努丁在大會上說，他們國內的形勢可以為其他所有處於極權主義國家內人民為爭取早日結束共產主義極權的入侵提供一個例子。他說，來自蘇聯的極權主義正在迷惑着喀布爾政權的一些領袖，但是百分之九十的阿富汗人都支持我們抵抗運動。布汗努丁還提到，他們最近在戰場上俘虜了一名古巴籍的軍官，但蘇聯駐阿富汗的部隊中還有來自東德、保加利亞等東歐極權主義國家的軍事人員。蘇聯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正在扼殺我們阿富汗人的自由。除非世界上的共產主義極權被制止，它們將威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

越南海上逃亡幸存者協會的代表VO VAN AI 在大會上說，如果今天誰還相信無產階級革命的神話，他應該睜開眼睛看看越南的悲劇。他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所有共產主義極權政府引導的行動中，工人和農民是根本沒有一點絲毫的權利。

張偉代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也在大會上做了正式發言。他說現今中國的極權統治，本質上同蘇聯沒有什麼區別，不要幻想中國共產黨會幫助你們遏止蘇聯政權的擴張。中國政府在國內繼續迫害不同政見者，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呼籲世界民主力量對中國人權問題加以密切地注意。

古巴著名政治活動家，詩人互拉達爾斯(Vallarars)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世界

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如果沒有壓制和勞改營，它就不可能存在。我希望我們國際反極權聯盟能給正在忍受極權主義統治的不幸人民帶來希望。」

蘇聯持不同政治意見的科學家布科夫斯基在會上說：「我們國際反極權民主同盟的成員就好像是在一個大家庭。雖然他們從世界的不同地方來，雖然他們正在說着不同的祖國語言，雖然一些曾經遭受過典型的獄中生活，而另一些渡着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但是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在一個相同的監獄，那就是極權主義的統治。」布科夫斯基本人就在監獄中渡過了十二個春夏秋冬。他還說，極權主義的基礎就是仇恨，它在人民中間煽起仇恨。如果消除了這些仇恨，極權主義也就完蛋了。他還說，今天極權主義是一個全球的事實，因此反對和揭露它的鬥爭也應該是國際性。布科夫斯基還代表國際反抗極權聯盟執行委員會說：「我們的反極權同盟主要為一個互相聲援、協調的鬆馳的人權和民主組織，各國民力量對他們本國極權統治採取什麼方式進行鬥爭，那完全是他們本國民主力量的事，他們單獨地對他們本國的行動負責。作為國際聯盟來說，我們不搞武裝和其他任何暴力的行動。」

五月十八日晚上的國際反極權聯盟成立大會一直在情緒激昂的氣氛中進行。會場四周到處可以看到聯盟的主要口號「不要極權，也不要死亡！」二十多位仍在世界各極權主義國家監獄或集中營的著名世界人權和民主活動家的巨幅畫像懸掛在會場四周的高牆。他們其中包括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蘇聯持不同政見科學家薩哈羅夫，以及中國年輕的持不同政治意見的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王希哲。會議通過決議，呼籲世界民主力量和公眾輿論為迫使監禁這些良心政治犯的極權政府立即釋放他們而鬥爭。

在會議期間，來自阿富汗國內抵抗運動的戰士代表同中國之春的代表們碰巧被安排在一起。阿富汗國內抵抗運動駐巴黎的代表布汗努丁主動地走上來同我們中國之春的代表打招呼。他告訴張偉、金陵和劉梓榮說：「我很早就聽說你們中國人權活動的兄弟要來參加我們的國際反極權聯盟。我們非常高興，我們都是亞洲國家，又是鄰國。我們應該很好相互聲援和支持。」張向布汗努丁提到：「是不是我們中國政府向你們提供武器？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怎樣？」布汗努丁先生說：「是的，中國政府曾經通過巴基斯坦向我們提供了一些輕武器。蘇

聯、中國二個極權主義政府在世界極權主義統治權力方面的爭吵給我們阿富汗國內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帶來了很有利的條件。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中國政府給我們武器並不是要我們去保衛我們的自由，民主和人民的基本人權。而且他們現在給我們的武器正在減少。」他還說：「我知道，我們兩國人民，還有蘇聯人民都在遭受着一樣的痛苦。我們的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權都被同一個敵人剝奪了，這個敵人就是極權統治。」他繼續說：「我們不反對接受來自中國的武器，因為它對我們達到我們自己的目的有利。」說到這點他會心地笑了一笑。

大會最後通過了國際反極權聯盟的成立宣言以及六點行動綱領，並選舉了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布科夫斯基為國際反極權聯盟的第一屆主席，古巴著名詩人、政治活動家互拉達爾斯為副主席，蘇聯持不同政治見解的著名作家科茲涅佐夫為執行主席。大會考慮到中國有十億人口處於極權主義的統治之下，她佔了全世界生活在這個極權制度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一致同意來自中國持不同政見的代表作為該國際聯盟的常任執行委員。

出席這次大會的還有來自全世界各地各主

要新聞機構、電視台、報紙與新聞記者一百多人。國際聯盟（反極權）的成立，在世界上，特別是在歐洲引起了社會廣泛的注意。參加會議的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他們中間有：國際大赦組織，國際人權保障協會，國際薩哈羅夫協會，法國爭取釋放魏京生、劉青全國委員會，捷克七七人憲章，赫爾辛基協定觀委員會，歐洲團結工會支持委員會，東南亞難民權利保障委員會等十幾個國際組織。中國之春代表團在法國逗留期間還特別受到了所有關心中國問題和人權情況的法國友好人士的熱情歡迎和接待。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前幾年在中國的留學生，有的在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北京外語學院；有的在南京、上海、廣州、瀋陽，武漢等地學習。很多人到中國去以前甚至是法國的毛派。但是他們告訴記者，在中國的實際生活教育了他們。在中國之春代表團即將離開巴黎時，這些法國朋友激動地同我們說，中國的希望不在毛澤東，中國的希望不在鄧小平，中國的希望不在那個極權主義的制度，中國的希望在你們這年輕的一代！祝你們為爭取中國人民民主、自由、法制、人權以及中國民族最後解放的正義鬪爭成功！



大會期間展出中國民運資料

歡迎褚建剛參加中國之春

本刊評論員

中國湖南花鼓劇團樂隊隊員褚建剛，在出國前就在湖南長沙聞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北美開展的情況，並暗下决心，準備赴美演出時，設法投身於這一運動。

褚建剛到達美國後，很快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三日與中國之春舊金山聯絡站取得了聯繫，表達了他參加中國之春運動的強烈願望。五月廿六月，褚建剛在與中國之春總部的長途電話交談中，再次要求參加中國之春。五月廿八日，中國之春雜誌主編汪岷赴舊金山與褚建剛和其委託律師直接接洽，褚建剛向汪岷當面詳談了他出國前後的情況，並多次表示，他要求暫居美國，並不是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而是要投身於以變革中國社會制度為目標的民主運動。

我們歡迎褚建剛同志參加中國之春。

我們從有關方面獲得了由湖南花鼓劇團團長金漢珊簽署的給褚建剛的一封信。此封信用威脅和利誘的雙重手法，企圖說服褚建剛“歸隊”。信中說（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同志和駐美國大使館的同志已分別向舊金山移民局和美國國務院了解過，美國國務院和舊金山移民局都認為你要求留在美國工作是不能同意的，是違反美國移民法的。”據可靠消息，美國國務院至今未對褚建剛一案正式表態，該信的說法純屬造美國政府之謠。我們對以此種手法威逼不了解美國法律的褚建剛就範，表示遺憾。

信中還講什麼；只要褚建剛“迷途知返”，“我們保證不給予任何處分。”這種假猩猩的『保證』中國政府不知使用了多少次，而每次都是自食其言。這種誘惑也“此地無銀三百兩”地道出了，按中國官方術語，褚建剛現已入“迷途”。對“叛逆”者進行懲罰，是中國政府一貫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使用的信箋是“外交部公用箋”，清楚地說明了此信是官方授意、精心策劃的。

我們從不主張中國留學生在美尋求政府庇

護。我們希望留學生盡可能返回中國，在國內從事變革中國社會制度的事業。參加中國之春的大部份留學生不暴露身份，道理就在於此。另一方面，我們也願指出，如果參與中國之春活動的同志已經受到中國官方的密切注意、而且回國面臨政治迫害危險的話，暫時留在海外也是必要的。我們反對無謂的犧牲。

我們對其他中國留學生在外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態度是，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個人的人權與自由，中國政府不必加以干涉。中國政府應該清楚，是中國現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逼迫一些人客走他鄉，要杜絕這種現象，恐嚇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徹底變革中國的社會制度，使之走向民主大道，尊重人權與自由，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而這正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宗旨。

附1：金漢珊給褚建剛的一封信（攷見件）

附2：褚建剛申請參加中國之春的一封信

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人
權政治為了徹之改革中
國目前政治制度我
褚建剛要求參加中國
之春民主運動。

于美國 1983年5月24日 褚建剛

褚建剛

(附二)

褚建刚同志

你好！自从你离团以后，我们非常关心你。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同志和驻美国大使馆的同志已分别向旧金山移民局和美国国务院了解过，美国国务院和旧金山移民局都认为你要求留在美国工作是不能同意的，是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因为美国政府发给你的签证只能允许你在美国作短期访问。他们已决定一星期内在法院审理你的案子，然后把你遣解（驱逐）出境。

我们相信你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我的希望你立即向移民局表示愿意回国，我们将热烈地欢迎你，欢迎你到纽约来参加我团演出（我团在纽约首场演出相当成功，全场满座，并受到热烈欢迎），也可以随时安排你回国与亲人团聚。

我们一向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演员，这次只是一时思想糊涂，只要认识和改正了，仍然

是一个好同志。只要你回到团里来，迷途知返，既往不究，我们保证不给予任何处分，并将一如既往地对待你。现在你的父母及新婚的爱人听说你要留在美国都非常担心，他们盼望你早日回家团聚。希望你解除一切顾虑，尽快下决心归队，越快越好，这对你自己、对我们的剧团、对国家都有利。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找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陈为玉领事联系。电话是：5631718

金汉珊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一日

中國留學生的人權

本刊評論員 王文

這期『中國之春』登刊了兩篇關於中國公費留學生被遣返回國的調查報告。諸如此類的事件，也曾發生在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由於類似事件頻頻發生，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勢，我們有必要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留學生的人權必須受到尊重！

留學生被遣送回國，多出於政治因素。主要是大使館失去了對某留學生的信任，怕留學生“出事”——或去台灣、或留他國。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將五名學音樂的廿來歲的年輕留學生突然送回國內（原訂四年學習計劃只進行了一半），乃因他們生活逐漸“西化”，久而久之可能迷戀美國而留下（該五名小青年專門有一名輔導員陪住，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一方面便於領事館管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加拿大大使館將中國訪問學者陳振健押返回國，是防止他跑到台灣。陳在台灣有一叔父，原本想在陳回國前兩人在東京會面一次。陳到大使館申請繞道東京回國

時，遭到拘留，被秘密押返回國。大使館顯然是怕陳振健與其叔叔見面後，被“拐”到台灣去。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爲什麼會接二連三發生類似事件呢？分析起來，大體有如下幾點：

其一、使館負責留學生事物的人員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留學生負責。其實，這也是國內各級幹部普遍的工作作風。使館人員只要能向國內教育部交差，你送來兩次五十，我交回總數一百，就算太平大吉。使館領導最怕下屬人員和留學生“出事”，“出事”無法向上交待，輕者要做上幾次“檢討”，嚴重的還要丟官。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寧可錯送十個，不可漏走一人”成了使館工作的基本原則。凡對留學生管理較緊，沒出什麼大事的，則會受到上級的表揚。比如，原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曾被教育部於一九八一年表揚爲先進單位。『中國之春』雜誌一出，沒了先進的份兒。

其二、遣送事件是極權專制制度下的必然



大陸留學生在美國學習

產物。使館之所以採取上述的工作作風，責任並不完全在於使館本身。我們和使領館來往密切的公費生們也了解使館工作人員的苦衷。他們受到來自國內教育部、外交部等上級單位的壓力是相當大的。一有事，就要挨剋，而且永遠是上面批下面，弄不好還要找個替罪羊。拿胡娜一案，原本是鄧小平等不懂美國法律，小題大作，向美國要起極權主義威風來，結果鬧得自己下不了台，反而要外長黃華作檢討。做中國的駐外官員，大多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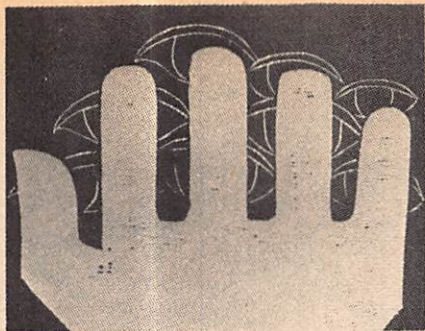
其三、遣返事件反映了共產黨好龍的特性。盡管在中共中央的和平“統一祖國”的統戰高調下，教育部也隨聲附和地向留學生交待做好台灣學生的統戰工作，並說大陸留學生可以和台灣男女留學生交異性朋友，允許到台灣探親、訪友、觀光旅遊等，但在我們留學生眼裏，這些都是虛偽的宣傳。一旦你提出到台灣看看親屬，準會把使館人員嚇一身冷汗。平時和台灣留學生來往過於密切，也會受到好意的“提醒”，更不用說交男女朋友了。據說，有一位學英文的年輕男公費生，和一位同班的台灣女同學長期相處，有了感情。該台灣女生主動提出要跟男友到大陸工作。我們這位語言學生將實情向大使館訴說，請求批准他的台灣女朋友回到大陸。按理說，這位公費生的“統戰工作”已做到了家，把女朋友都“統”到大陸來了。教育部送出一個留學生，回收兩個留學生，成全了個人，也給國家添了人材，天下那找這麼美的事。可是，你猜我們大使館說什麼？他們勸這位語言生：「你學成回國找女朋友還難嗎？要挑什麼樣，就有什麼樣。幹嘛找個

台灣女孩子，弄一身麻煩。趕快和她疏遠，別失去組織對你的信任，你有美好的前途嘛！」這位留學生只好在“女朋友”和“組織信任”、“美好前途”間，選擇了後者。據了解，在這種虛偽的統戰政策下，我們有的留學生寧願秘密去台灣參觀，而不向大使館報告。

其四、黨官僚們毫無人權觀念。人有天賦人權，這是有別於動物的重要標誌。中國人本應享受出國自由，留學自由，移民自由，和家人團聚的自由，以及交男女朋友的自由等。這些天賦人權不幸被共產黨剝奪了。黨一貫教導人民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黨把螺絲釘擰在那裏”，螺絲釘“就要在那裏發光”。在這種將人“物化”的毫無人權的觀念下，“把一生交給黨安排”，“黨指向那裏，就打到那裏”，“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等等“豪言壯語”，成了共產黨任意擺佈老百姓的“傳道”。在黨官僚眼裏，留學生出國，是黨挑選的，是黨批准的，是黨信任你的結果。黨不信任你了把你隨時送回，也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螺絲釘嘛，隨便擰就是了。

大使館可以就每個遣返事件拿出千萬個“理由”，但蔑視留學生的人權是最大的無理。大使館要仔細想一想，你們把留學生送回交了差，甚至可以報功領賞，留學生回去如何向親人和單位的同事們交待？這不是斷送了人家的前途嗎？正是出於顧忌，某些留學生在察覺有押返的危險時，被迫尋求政治避難或投向台灣。其實，他們有些人一開始並無逃跑念頭，是大使館把他們逼上梁山的。這些，大使館可能比我們體會更為深刻吧！

從遣返留學生事件中，我們公費留學生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首先，我們留學生要提高自身的人權觀念意識。有的留學生講：“共產黨現在改得不錯了，你看，都批准我出國了。”可是，這位同志沒深入想一想，出國學習，這本應是我們生來固有的天賦權利，以前出國沒有自由，是共產黨把這種權利剝奪了。現在出國，也應該無須共產黨的批准。在民主國家，出國是極平常的事，有的政府還宣傳公民領取護照的必要，認為這是公民應了解的權利。看看我們國家，執政者把批准出國看成是一種恩賜，個別人還乘機敲詐勒索一番，相比之下，不知落後了多少年。所以，我們留學生有幸能出國學習，不是共產黨恩賜的，而是本來應有的。同樣，我們自己也應該有權決定是否中途回國，是否完成學業後，根據研究工作的需要再延長一段時間（如進修單位提供資助的話）。牢固地樹立了這種觀念，留學生就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至於受制於大使館的任意擺佈。在『陳章事件』中王研和另一位公費生就沒有聽從大使館的強迫命令，自己掌握了主動權。結果，你頂了他一下，他還不是干瞪眼！在美國的土地上，量他也不敢公開綁架。當然，在發生問題時，盡量不要和大使館鬧翻，要和他們擺事實，講道理，取得他們的同情，因為，他們幹這種事也是被迫的。但須切記：在察覺情況稍有異常時，千萬不要私自進使館而自投羅網。共產黨見不得人的招法多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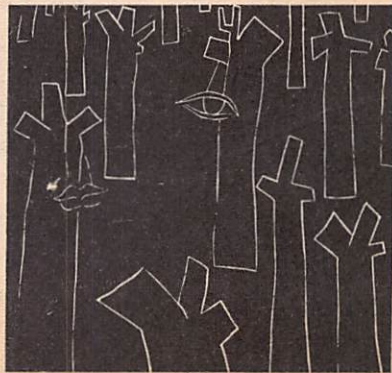
其次，為了維護我們應有的人權，留學生們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形成力量。『陳章事件』已初步顯示了留學生聯合互助的力量。由於集體的努力，據說陳章有被送回的希望。廣大留學生已意識到，一個人被遣返，似乎與己無關，但這種厄運可能會隨時降臨到自己頭上，要爭得個人的人權，必須經過集體的奮鬥。

最後，我們也想給大使館講幾句話，你們的處境，我們也是理解的。有時，使館人員執行遣返留學生的任務，也是硬着頭皮完成上級交給的例行公事。問題出在我們國家那個不合

理的制度上。在很多方面，使領館普通工作人員的人權同樣受到了剝奪。我們公費生們不知聽到了多少大使館工作人員的牢騷：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駐外使館，只有中國和越南的外交官（大使除外）不准攜帶妻子，兒女，過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也只有中國的外交館，無權在外居住，被集體關在大使館的鐵籠裏。難道只有大使需要過着有妻子的生活？難道七情六慾也要服從革命的需要？難道別人都不是人？在人權遭受剝奪方面，大使館人員與廣大留學生是同病相憐的。我們希望使領館人員多想想自己的處境，就會對留學生抱同情之心了。你們應該是能掩就掩，能拖就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方百計地保護留學生。這樣做，留學生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記得去年為了配合統戰宣傳，國內送到北美一部新電影『革命軍中馬前卒』，描寫辛亥革命的先烈鄭容的壯麗事業，領導選讓我們留學生多帶台灣學生去觀賞。該影片中有一出鄭容在日本留學的戲，給我們留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看了，如同身歷其境：當時鄭容是滿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公費留學生，但他和一些同學們在日本造起反來。清政府駐日使館的學監（相當於今天的留學生管理處）奉命召見留學生，氣急敗壞地講：朝廷拿了銀子，讓你們留洋，你們不但不報答皇上，反而造起反來了，那裏還有良心！清政府最後停了鄭容的獎學金，鄭被迫回國。即便在滿清的封建制度下，對造反的鄭容也只是停了官費而已，並未公開綁架他回國。近百年後的今天，共產黨大使館較清廷的公使館有過之而無不及，對失掉信任的留學生都大行押返之道，就別提對造反學生的處置了。難怪自從電影放映後，留學生們都將使館負責留學生的人員尊稱為“學監”了。

爭取留學生的人權，將是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大重要工作。我們希望廣大僑胞給予我們同情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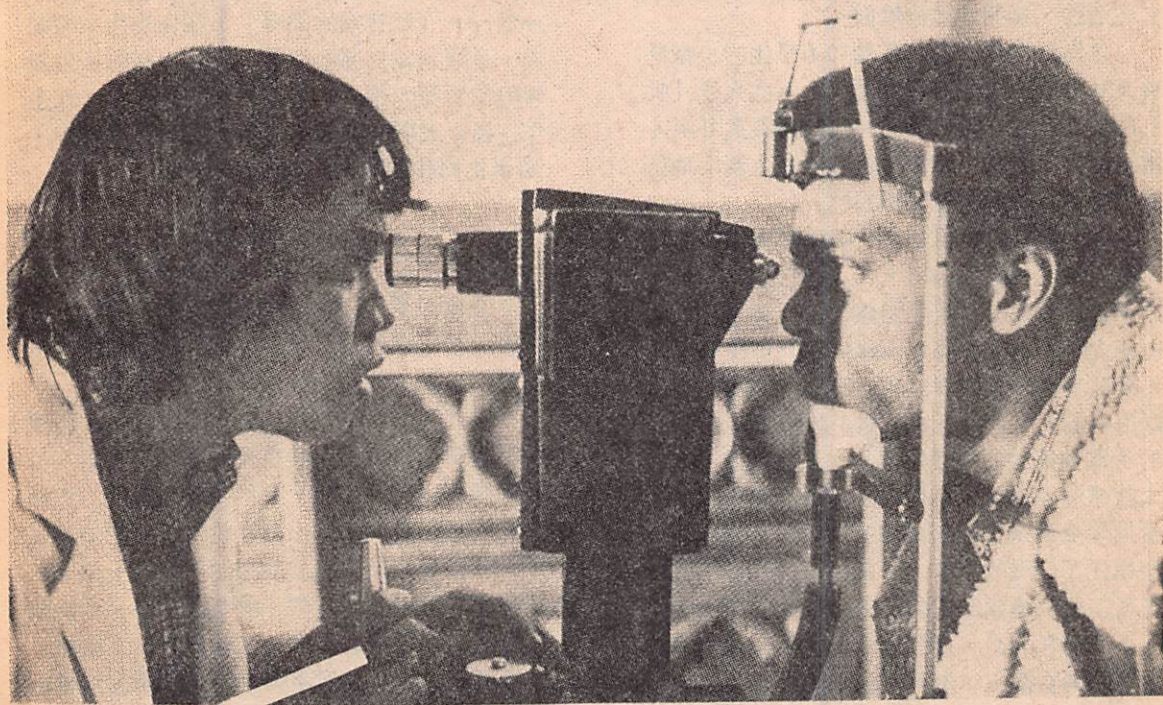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包斯琴事件」

調查報告

本刊駐波士頓記者 武鳴



一个留学生中共都不能容忍，深谈什麼民主，共產制度，就是那樣的勢態。

包斯琴，男，卅七歲。中國公費留學生，波士頓東北大學物理系研究生，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三日被突然遣返回國。

1 蒙族學生，倍受歡迎

包斯琴同志係蒙古族人，共產黨員。出國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某科研單位工作，他被選為公費出國並非尋常。按政治條件，他是不錯的，父親又是十四級幹部（中國大陸行政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按業務條件，包斯琴雖然學習工作努力，但並非十分拔尖。包斯琴被選拔出國，單位也曾出現一些議論。不過，工作特殊需要嘛，他還是出國了。

一九八一年，包斯琴同志脫下軍裝，換上

便服，在出國表格的原工作單位一格填上「內蒙古師範學院」（國內軍隊系統派出留學人員，均假一非軍事單位名義）。包斯琴抵達美國波士頓後，受到熱情的接待。美籍華人教授多次請他到家作客，介紹情況。尤其知道他是蒙古族人，更多了一分盛情，畢竟中國派出的蒙族留學生為數不多。他剛到美國時，像其他留學生一樣，生活不太習慣。但很快就在友好的歡迎氣氛中安下心來。

2 學習努力，成績優良

包斯琴被安排在波士頓東北大學物理系念研究生。據同學們講，剛開始聽課時，包因英文聽力不強而感到吃力，初來時成績並不理想。鑒於這種情況，包平時學習和工作均很努力

，常常研讀至深夜，成績很快就追了上來。第二學期始，成績保持優良，經教研組推薦，校方準備從下學期起給予包斯琴獎學金。

3. 草原歌手，平易近人

包斯琴同志初次給人的印象是文靜、穩重，但他也具有蒙古民族大方、開放的性格，他能歌善舞，與當地華僑和香港、台灣留學生很快打成一片。

他曾應邀在大波士頓華人文化協會舉辦的聯歡會上演唱蒙古民歌。據我們調查，該協會是波士頓地區美籍華人高級知識份子的一個文化組織，會員多為工程師、大學教授等。他們大都為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留學生，在波士頓地區的高等學府如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畢業後於本地就業。該協會常舉辦文化活動，無明顯政治傾向。

包斯琴也曾多次在華僑和留學生的小型聚會及私人家宴上演唱蒙古民歌。每次大家「哄」他演唱，他均樂於接受。由於他樸實可親，當地華僑、大陸、台灣、香港留學生親切地稱他為斯琴，而省略那僵硬的姓。

斯琴熱心宣傳祖國文化的熱情突出表現在「劉三姐」一劇的演出上。「劉三姐」一劇是去年五月由波士頓民間團體「東亞舞蹈社」及一些大陸、台灣和香港留學生共同排練演出的。組織者為一來自香港的女研究生余某，該劇採用中國大陸歌劇「劉三姐」的劇本。整個劇的排演前後共花去了四個月之久。有七、八個大陸來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參加了這次演出。當斯琴受到余女士的盛情邀請時，他滿口答應並擔任了伴唱的工作。「劉三姐」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禮堂演出時，座無虛席，相當成功。不同尋常的是，這公然由大陸、台灣和香港留學生同台演出，做到了祖國的「海外統一」。通過演出，斯琴也結識了不少新的朋友。由



於當時包斯琴來美不久，參加該劇的排演，的確沖走了他乍到時的寂寞，凡接觸過斯琴的人，都異口同聲讚他平易近人。

4. 領導工作，認真負責

波士頓地區建立中國大陸留學生黨支部後，受大使館委派，包斯琴擔任支部的領導工作，這對念研究生的人來說，是一個額外的負擔。讀者可能不了解，在海外做黨的工作，是一種極為特殊的任務，和國內的情況迥然不同。第一，大使館教黨員公開撒謊，不能向外人承認是共產黨員；第二，黨員開會要絕對保密。否則，讓美國政府知曉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土地上還有組織活動，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儘管工作任務艱難，包斯琴對領事館分配的工作還是比較認真負責的。國內「四個堅持」中的頭一條——「堅持黨的領導」，在留學生中的體現，是通過黨支部的領導，表現出來的。包斯琴對使領館的指示，均不折不扣地貫徹。他工作作風比較開放樸實，不搞小匯報、小動作，留學生們和他關係比較融洽。

5. 突遭遣返，解釋離奇

正當包斯琴已熟悉了美國環境，克服了語言關，而且學習已入軌道並即將取得獎學金的時候，大禍却降到他的頭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三日，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教育處負責留學生事務的杜某及另外一位幹部突然飛抵波士頓，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秘密地召見包斯琴，拿出機票說：「紐約領事館接到華盛頓大使館黨委的指示：組織上決定，你停止學習，立即回國。機票已買好，今晚飛往舊金山，我親自送你。」杜某親自「陪機」，「護送」包斯琴到達舊金山，然後立即將包送上經由東京回國的中國民航班機。

快速的行動如此的突然，一下子引起了校內外的輿論。

押解的原因呢？

紐約總領事館在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生黨員骨幹會上的解釋是：包斯琴犯了嚴重的組織紀律錯誤，具體是什麼錯誤屬於組織機密。包思想壓力很大，精神有些不正常，此次送回國是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杜某反復強調，他抵達波士頓處理包斯琴一事及包被遣返回國的細節，均屬於絕密，不得泄露。如果有人問及，就統一口徑說包斯琴不適應環境，患了精神病，不能堅持學業，自己要求回國。

這個「統一口徑」的說法，在包斯琴失踪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後，很快就在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生中流傳開來。同學們大為驚訝：「怎麼可能呢？前兩天還看到斯琴，他明明是好好的嘛！」

這個「統一口徑」的說法，也轉達給包斯琴所在的學校當局，算是個交待。

6. 事出有因，葉公好龍

根據我們的調查，包斯琴被遣返回國與下列情況直接有關：

- (一) 包在黨支部任職，有時經手一些文件。
- (二) 包為單身，和一位台灣女留學生關係較為密切。

進一步調查，終於揭開了包斯琴遭受遣返之謎：包斯琴曾不慎遺失過一份經手的文件和筆記本，但這絕不是有意的。他已向黨組織做過檢查，大使館黨委一時未做明確處理，因未有證據顯示此文件之遺失造成了什麼嚴重後果。然而，今年上半年當中共中央調查部（中國共產黨情報部門）的陸某帶著特殊任務赴美，來到波士頓「看望」留學生時，聞及包的遺失事件，又聽說包與僑界接觸頻繁，還與一個台灣女留學生來往密切，具有特殊嗅覺及負有神秘使命的陸某，頓時疑心大作。一方面給包斯琴施加壓力，讓他交待文件遺失細節，一方面建議使館黨委調查清楚，必要時將包遣返，以免節外生枝。包在強大壓力下，知道事情不妙，曾向個別人透露過，他懷疑有人跟踪，感覺處境危險。但這正是他預感禍臨、神智正常的反映。人在心境煩悶時，總想找個「知己」一

吐為快。當包斯琴向一位一向「友好」的美籍華人教授表露他困擾的心態時，這位與中國大使館關係密切的教授，立即用電話向大使館做了詳盡匯報。大使館黨委召開緊急會議，判定包斯琴可能「出事」，立即決議讓杜某刻不容緩抵達波士頓，將包斯琴遣返回國，以防「叛逃」。

據大家反映，包斯琴生活作風是比較正派的，他雖然和一位台灣女留學生關係較好，但屬於普通朋友，況且，他也對另外一位來自大陸的女學生表示過好感。對於一位未婚的青年來說，這些均屬正常，無可非議。教育部曾多次指示留學生，讓他們多和台灣學生接近，做好統戰工作。最近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生選接到指示，要多向台灣學生散發「台聲」雜誌（一本在大陸出版，對台灣同胞進行統戰工作的刊物）。

留學生出國前，教育部做報告時亦明確指出，大陸留學生可以和台灣留學生交男女朋友，可以到台灣探親、旅遊，以配合黨的統戰工作。從幾起事件看，這些「指示」，完全是一種統戰宣傳，一旦發現中國大陸留學生與異性台灣學生交往，大使館必會干涉。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作法，不知是教育部的「內部指示」，還是大使館的獨家發明。

7. 學生震驚，責聲四起

包斯琴被閃電式遣返回國事件，在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家在感到震驚的同時，懷疑使領館做出的不合邏輯的解釋。一位學醫的訪問學者講：「說包斯琴患了精神病，又說包自己要求回國，怎能自圓其說？騙別人可以，騙學醫的不容易。精神病人一般都否認自己有精神病，都認為自己是正常人，怎麼能自己要求回國呢？」另一位留學生說：「我們在國內怕說錯了話挨整，沒想到來到海外留學也沒有安全感，也要處處提防，否則不知何時被押走。」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訪問學者深有感觸地說：「連斯琴對黨這麼服從的同志都受到懷疑，遭押返之運。我們這些老『白干』，回去後不知要受多少嚴格的秘密審查，檔案袋子肯定又會厚了一截。」

包斯琴事件之後，波士頓地區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變得更為謹小慎微了。據說，前些天，黨員們被召集起來學習中央的一個重要文件，大家情緒低沉，相對寡言。包斯琴事件的陰影仍籠罩在波士頓留學生的頭上。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於波士頓

「陳韋事件」調查報告



本刊駐羅切斯特記者丁仁

陳韋，男，廿七歲，中國公費留學生，原在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紐約州羅切斯特（Rochester）大學物理系研究生。一九八三年五月廿六日被突然遣返回國。

王研殺嬰案——『陳韋事件』的起因

王研系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女，廿四歲，在羅切斯特大學主修電腦。王研出身知識份子，通過其父與外國教授的私交，獲得該外國教授的名義擔保而出國留學。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晨，清潔工人在清潔王研居住的宿舍樓的垃圾時發現一死嬰，然後報警，與警察循血跡查到王研宿舍，發覺王研產後昏迷，送醫院急救。

王研被紐約州檢察官以殺嬰起訴，但因健康原因，法院允許王研暫時監外就醫。

據云，王研來美後，生活比較隨便，公費留學生普遍看不慣。

大使館對王研案的急切處理引出『陳韋事件』

王研殺嬰案第二天即被羅切斯特（以下簡稱羅鎮）當地報紙披露，羅鎮中國留學生小組負責人向紐約總領事館做了匯報。

按美國法律，對殺嬰的判決一般是較重的。自起訴起，犯案人需坐班房候傳，但犯案人可以保釋候傳，只要有人出錢出面即可，法院判決王研的保釋金為一萬元。

王研案很快驚動了中國駐美國華盛頓大使館。由於王研系中國公民，觸犯了美國法律，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大使館黨委進行了研究。五月十八日至廿四日，大使館派彭領事和賀某以外交人員身份二次赴羅鎮，去醫院探訪了王研。他們轉達了大使館黨委的意見：1 大使館可以考慮出錢保釋王研；2 王研必須在保釋後立即回國，回國後可考慮調換工作單位。王研當時感到為難，反復問，如果她回國，大使館能否保證她還可以再回美國讀書。使館人員答道，這取決於美國政府，王研見無保障，又多次請求大使館不將她送回，均遭到拒絕。王研在面臨被迫回國境遇下，竟向使館人員宣稱中國公費生陳韋等二人與她有過性關係。一下子把大使館賀某等驚得呆若木鷄。王研反攻道：“你們非要我回國，那二位公費留學生也必須回國，否則我揭發他們。”

大家分析，王研這種“宣稱”的目的，是想告訴中國大使館，她手中握有決定中國公費生命運的材料，可以在法庭上咬住陳韋等，說是他們唆使她殺嬰的。以此做為要挾，讓中國大使館既出錢保釋她，又不逼她回國。否則，和盤托出，玉石俱碎。

據我們了解，羅鎮大部份中國公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認為王研告發陳等有報復之嫌，因陳等看不慣王研的行為而背後議論過王，並和王當面發生過糾紛。

中國大使館對陳韋的草率處置

按理，大使館在獲得王研的指控後，應在廣大公自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進行了解，冷靜地進行分析。可是，大使館的人員行踪神密

，一般留學生都不知道。善於發動群眾破案的黨，在此却迴避了群眾。

彭、賀二人帶着與王研談話的錄音返回使館後，使館黨委立即舉行會議，並向國內的“法律專家”請教。黨委認為，陳韋等二位公費生有遭受拘留、逮捕和起訴的危險，立即決定將陳韋等二同志遣返回國。當時，使館人員未做調查，的確懷疑陳韋等犯了嚴重的作風錯誤，以此，也足夠將他們“請”回國內了。

五月廿五日，紐約總領事館教育處施某等二人，帶着華盛頓大使館黨委的指示，秘密抵達羅鎮。施某等召見陳韋等二人，聲稱由於王研的指控，他們隨時可能被捕，為了他們的安全起見，必須在一個小時以內立即回國。這一宣佈，如同晴天霹靂，陳等二人連聲叫屈。施某等強調，這是黨委的指示，組織的決定，必須服從。在領事館人員的勸解、威脅下，陳因年輕而服從。另一公費生堅持王研的指控與實不符，回國後無法向家庭和單位交待，不能回國。由於他拒理力爭，領事館人員也無計可施。

陳韋隨施等二人當晚飛回紐約。聽說陳在紐約總領事館失聲痛哭，連一些領館人員也有些心動，打電話請示華盛頓大使館黨委。大使館黨委又召開緊急會議，仍決定將陳立即遞解回國，紐約總領事館只好從命。五月廿六日，陳韋被送上飛往北京的中國民航班機。

公費留學生申請正義，為陳韋抱打不平

中國大陸留學生聽說陳韋同學被突然押返紐約後，立即互相傳告，大表不平。紛紛要求“上訪”。第二天，兩位公費生受大家委託，“上訪”紐約總領事館，為陳韋求情，要求留下陳韋。他們的理由是：一、陳韋曾批評過王研，和她吵過架，不像有不正常關係；二、退一步講，即使陳韋有問題，並不見得與王研殺嬰案有關連。這樣偷偷溜走，反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畏罪潛逃之嫌。但兩位留學生的苦心未能奏效。

陳韋被遣送回國的消息在羅鎮越傳越廣，中國留學生們耳聽四面八方傳來對中國公費生的流言蜚語，更加憤憤不平，大家決心聯合起來，申張正義，把陳韋要回，一方面爭回留學生的人權，一方面維護中國公費生的名譽。羅鎮留學生領導小組幾次與紐約總領事館電話聯繫，轉告留學生的意見。六月中旬，留學生領導小組受大家委託，再度來到紐約總領事館，要求將陳韋同學送回。在集體的的努力下，在廣

大留學生的壓力下，據說總領事館已寫信給教育部，請教育部批准陳韋返美學習。廣大留學生的聯合努力，有了初步成效。大家決心奮爭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王研案的一些近況

讀者一定會關心王研案的進展。據了解，王研已被朋友保釋候審。在此之前，王研已經精神病院檢查未見異常。羅鎮地區華僑同情王研遭遇者，自案件一開始即聯合起來為王研募捐，以支持律師費用。王研的辯護律師稱，紐約州檢察官對王研的起訴，已由謀殺，降為誤殺。王研的律師有信心為王辯護到底，爭取使王獲得無罪宣判。羅切斯特大學當局也對王研處境表示同情，擬予在王研保釋候審期間免收王研學費，並給予每月二百元的生活補助。美國法律保護被告，着重證據，同情弱者；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懷有友好的感情，這些，都是對王研有利的。

對王研案的粗淺看法

全面評論王研案，不是本調查報告的目的。鑒於該案已在北美引起廣泛議論，我們也有必要在此簡短表達一下我們的粗淺看法，王研案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值得大家深思。

第一，王研同學是中國現行社會制度的受害者。由於中國共產黨推行不合理的極權專制制度，中國人民三十多年來不但在精神上受到極大創傷，物質上也極為貧乏。大陸有限的開放以來，精神上嚮往民主、自由，物質上追求富裕舒適的青年人，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出國，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大諷刺。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員紛紛為子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女攫取出國機會並為他們在海外謀求居留權而費盡心機。在這種黨的高層領導帶頭刮起的“出國才有出路”、“出國高人一等”的風頭下王研父親的最大願望就是給其女兒謀求出國機會。像很多天真爛漫的青年，王研以為離開了“朝前看無希望、往後看不留戀”的祖國，就會踏進遍地黃金的世界。王研來到美國後，自然羨慕這裏高水準的生活方式，這原本是無可非議之人之常情。但有些從大陸來的青年，並不真正了解美國人民和這裏華僑的現代化生活，是用辛勤的勞動換來的。因而，有人就採用了不理性的手段換取物質享受。與其像大使館所說的。王研受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不如痛快講她完全陷入了所謂的“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泥坑”。而值得黨官僚們所深思的是，把她推入這個“泥坑”的，正是我們“無比優越”的社會制度。

第二，王研是共產黨宣傳的偽君子哲學的殉葬品。多少年來，共產黨在大陸宣傳“革命”的戀愛觀、婚姻觀，暗地裏，黨的高級領導人過着奢淫的生活（毛澤東的小妾張玉鳳，葉帥的花八姐已為人熟知）；照面上，却限制大學生在學校談戀愛，禁止在大學結婚，教育兩地分居的夫婦，“以革命利益為重”。對那些男女關係稍有不慎的平民百姓，均大批小鬥、徹底搞臭。在那種偽善的制度下，討論性教育問題受到限制而青年人對性的知識幾乎是一紙空白、在違反人性的偽君子哲學的長期薰染下，王研一類的大陸青年來到美國後，對西方的性解放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像未種過牛痘的人對天花毫無免疫力一樣，某些純潔的大陸年輕人進入性開放的環境也缺乏應有的抵抗力，王研選擇男友的輕率表現即為明顯的例證。正是黨的長期虛偽教育使王研既害怕自己的作風問題被人發現而無臉見人，又缺乏基本的性知識而不知所措，終於冒着母子二人的生命危險做出蠢事。

第三，由於國內“一胎化”生育政策，殘害女嬰已成風氣。另外，在國內，拋棄私生子歷來很少受到法律的追究。王研在那種環境裏長大，受這方面的影響是自然的。在長期專制制度下生活的中國人，天賦人權的觀念非常缺乏，不體會毫無抵抗能力的嬰兒也是一個實在的人，而且最有必要受到法律的保護。試比較美國與中國的不同點：在以法治國的美國，如發現私生子被遺棄而死，必會追查而付諸法律，而對母親的貞操不潔，不會有什麼公開的遺責。相比之下，在我們以倫理道德觀點來維持社會秩序的中國，對私生子的溺死可能很少問

津，但對母親的議論遺責可以達到使之無臉存活的程度。王研顯然是在“保住名譽比保住嬰兒更為重要”的思想指導下行事的。

第四，王研還受了另一層的壓力，那就是大陸特有的政治壓力。按傳統，在國外犯了錯誤，因有失“國體”、將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對國內情況熟悉的王研會判斷出，這種不光彩的事，如果讓大使館和國內領導知道，一定會給戴上“給祖國丟臉”“有損於偉大祖國名譽”的大帽子，在當前大搞愛國主義教育的時候，可能會罪加一等。

我們建議中國大使館將王研案的全部材料送交國內高層領導人研究，找出社會原因，以減少類似悲劇。

對大使館處理陳章同學作法的意見

我們認為，中國大使館及領事館對王研案及對陳章等同學的處理原則有若干欠妥之處：

第一，使領館出面干預王研案是必要的。但不應以千方百計地將她遣返回國做為處理原則。應本着人道主義立場，協助王研請好律師，幫她渡過困難的時刻。如果大使館真正從關懷王研的立場出發，而不以遣返歸國為恐嚇，王研絕不會在感情上與大使館對抗而被迫涉及中國公費留學生。

第二，使領館對陳章等二同學的處理過於草率。既無起碼的調查研究，又無基本的人權觀念。爭取保護性措施而送回國內，貌似有理，實質斷送了一位留學生的前途。衆所周知，留學生中途被送回國，必定會被家屬及工作單位認為出了問題，受到了懲罰。留學生將在國內長期背黑鍋，跳到黃河洗不清。而且，隨意遣返留學生回國，只有用編造離奇的謊言向美國校方交待。

第三，使館黨委的主要負責人由於習慣了家長式的極權專制制度，對美國的法治觀念十分淡薄，對美國的法律更是一竅不通。

第四，自始至終，大使館黨委領導脫離廣大留學生，把留學生當阿斗。

第五，大使館黨委不尊重中國留學生的人權。他們手操控制廣大留學生命運的大權，任意擺佈留學生，拿留學生的前途做兒戲，這種局面，必須改變。

最後，我們希望大使館、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與廣大留學生聯合起來，對國內高層官僚們施加必要的壓力，使他們允許使領館工作人員和留學生攜帶家屬出國，我們大家都要過真正人的生活。■

方丹一九六一年在中國人
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時攝



方
丹

民主運動 的火炬

大陸現時的民主運動，從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算為起點，迄今已經過了八個春秋。人民群眾在短短的八年裏，通過各種形式向中國的假社會主義，真封建奴隸主義者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國人民嚮往自由、爭取民主法治的決心和信心，儘管人民付出了鮮血。在反動勢力圍剿之下，民主運動雖幾經摧殘，但並未被專制者的屠刀嚇阻，繼續以各種鬥爭形式在爭取自由民主。

現階段民主運動發展的總趨勢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表面上看，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從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發展到一個高潮。後以中共專制主義逮捕了民運領袖魏京生、傅月華、何求等下獄為一階段，使民運遭到了「危機」，繼而無理逮捕了王希哲，並逮捕了香港去廣州探望王希哲家眷的劉山青。使民運遭到「已是懸崖百丈水」的境地，進一步暴露了中共鎮壓民主的真面目。

大陸民運與中共的專制主義的鬥爭，現在發展到一個「白刃階段」。民運不得不以「公開」和「地下」兩種形式同時向封建專制主義展開猛攻。中共專制主義者們越是進一步鎮壓、迫害民運及其領袖，他們在政治上越陷入「四面楚歌」之困境。他們的血腥鎮壓也進一步喚醒了大陸同胞，也撕下了中共假民主的偽裝。民運先鋒們的牢不是白坐的，血不是白流的。他們的鮮血喚醒一批又一批群眾，也使全世界對中共抱幻想的善良人們覺醒了。

大陸目前的政治形勢頗似辛亥革命之後的形勢：推翻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封建皇帝」，從桌子底下拉出一個黎元洪似的「按既定方針辦」的華國鋒。繼後是曹琨似的人物上台，「辮子軍」重入「紫禁宮」，辛亥革命的口號和

任務並沒有實現。於是在動亂的北洋混戰之中醞釀並發動了「五四」運動。點燃了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火炬。這火炬照耀著一代又一代青年，為了民族存亡、為了中華民族和祖國的前途，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來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史詩。以孫中山先生為旗手，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北伐革命。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這就是歷史的定律。目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正處在當年「五四」革命的前夜。這就是我對大陸民主運動的一個總的認識。

接過「五四」的火炬

為了使當代的民運先鋒們充分認識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我們的民運不是一部「斷代史」。追根溯源，我們的民運不但是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的繼續，而且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繼續，也是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大民主」的繼續，也是一九五七年「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繼續，也是「一二、九」民主運動的繼續，也是「五四」運動的繼續。

以上我把一九五七年的「四大」和文化大革命「大民主」也歸納在中國的「民運史」中，這是很多人不同意的見解。這兩次「民運」有許多共同特點：

其一，都是由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民主運動」，也可以叫做「有領導的民主運動」，不是群眾的自發的行動。是統治階級利用「民主」迎合群眾的心理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五七年，毛澤東和中共利用「四大」以「陽謀」形式「引蛇出洞」他們借「四大」打擊和鎮壓所有對中共政權懷有疑義的批評者。

六六年毛澤東和中共又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再一次玩弄民主把戲。假群眾之手爭奪權利，排除黨內異己分子。當目的一達到，就立刻把紅衛兵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要的「四大」既打倒了黨內外的「當權派」，又打倒了打倒當權派的紅衛兵。這與五七年的「四大」稍有不同。五七年利用假民主把民運分子打成「右派」。

其二，這兩次「民運」雖然是由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陽謀」，但是參加民運的先鋒多數是以年輕學生為主體的。他們一方面被利用（不自覺地），一方面又誠心地認為是在「捍衛民主、捍衛黨」。所以他們也是民運鬥士，事實上在這兩次的民運中，許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其三，由於以上兩次「民運」都是毛澤東領導的，所以運動不能超越中共釐定的「民主

範圍」，跳不出如來佛的掌。

五七年「民運」的歷史背景是，史大林後的蘇共在一九五六年召開了「二十大」。在全世界共產黨內掀起了一個「非史大林化」的運動。「共運」因為揭批史大林的罪惡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毛澤東不得不在中共黨內搞一點「反對個人崇拜」的表示。反史大林式的獨裁之風，不但席捲所有共產黨國家，也席捲了中國大陸。毛澤東被迫搞點「民主」。先拋出「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接著又拋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繼而又鼓勵人民「向黨交心」、「向黨提意見」。接著就是鎮壓，把人民內部矛盾統統按敵我矛盾處理，全國到處抓「右派」，風聲鶴唳，腥風血雨。

其四，兩次「民運」的結果，使毛和中共的威信大大削弱，表面上看，共產黨似乎加強了統治，實際上却大失民心。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

其五，在國際輿論上中共進一步陷於孤立。

其六，兩次「民運」雖然相隔近十年，人民群眾在運動塵埃落定之後，自然地想到共產黨，想到共產主義，想到「社會主義」制度，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發展到懷疑恐懼，又從懷疑恐懼發展到仇恨反抗。共產黨和馬列主義在大陸已是日落西山，以致出現了這樣的民謠（順口溜）

「五十年代人鬥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殺人，八十年代各人顧各人。」；談到毛澤東就嘲笑，談到馬列主義就冷笑，談到社會主義就恥笑，談到共產主義就哈哈大笑。」這就是「三信危機」。

但是由群眾自發的民主運動，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了封建統治者。從「五四運動」到「北京之春」都是群眾的自發行動，所以波瀾壯闊。代表各種社會勢力、集團、階級、階層利益的人物紛紛登台表演，提出代表他們利益的建國施政大綱，提出他們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哲學思想。出現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政治局面。民主運動的火炬給民族和國家帶來了希望，全世界都注視著中國……。

從「五四」到「中國之春」的民主運動雖然經歷了六十餘年，中國大陸天翻地覆，但是民主運動的基本要求仍然是兩個口號：即反封、反帝。不打破封建法西斯專政是根本不能實現「民權」以及「民生」理想的。不打破帝國

主義對華的侵略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是不能實現「民族」的。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與中共大陸在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並存中鬥爭，競爭了三十多年，不但使中國人民，也使全世界正直的人民看清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台灣與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相比，雖然是遠不夠民主的，但與中共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來比，不但經濟大有發展，而且自由、民主的因素也多了一些。這使世界上所有西方社會學家從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奇蹟中發現，中國人的創造力並不亞於西方。從而得出一個結論：只要一個適應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這個社會制度首先是一個自由的，民主的社會。其次是必須實行法治，法治是把民主法律化了。沒有民主的要求，也就沒有民主的法治。法治不但是民主的要求，也是民主的保障。沒有法治的社會是根本談不上民主的。沒有民主要求的社會依然可以產生「法治」，不過這種「法治」不但不能保護民主，而它本身就是扼殺民主和維護封建制度的武器，這正像目前中國大陸所宣揚的「法治」一樣。整個憲法以及根據憲法精神的所有「立法」都不能代表民意，公然取消了罷工自由。憲法不是民主的結果，當然不能反映民主，更不能保護民主了。大陸的「法治」全是一小撮特權階級的保護傘。在馬列主義旗子上公然寫著要打倒法權，這怎麼又能奉行法治呢？在中共的「字典」裏，法治就是專政的代名詞。他們鼓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虛偽的、騙人的、也是「反馬列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列主義的「法律」是反映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屬意識形態。既然如此，法律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武器。既然如此那裏還有人人平等之說。人人是一個抽象的名稱。按馬列主義的教義，沒有抽象的人，只有具體的人，社會階級的人，所以人人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中共大陸不但「刑不上大夫」，而且「法不法法人」。

在民主社會不但不搞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也不偽裝，宣傳這種假平等。但是人們在法律面前基本是平等的。西方自由世界的法律雖然也有諸多的「黑暗面」，但基本上是民主的結果。它不但保護和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同時也保護和反映了被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在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至今沒有產生共產黨執政。

馬克思本人極端仇視資本主義，但他不能再封專制主義來反對資本主義，於是他創

立了共產主義。他的學說在封建農奴主義根深蒂固的俄國和封建落後的中國大陸取得勝利。新政權打上共產主義的印號，却依然實行改裝過的封建專制主義。於是產生了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和封建社會主義的中國以及朝鮮、越南等。改裝過的封建專制主義，只能在封建社會的土壤中萌發。這就和受精的卵子要尋找適合其發育的子宮壁「著床」一樣——馬克思主義的「精子」只能與它「相吸」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卵子」相結合（受精），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度裏「著床」發育。

中國人民被中共不斷玩弄之後，已經覺醒了。人民群眾說：五四以來「反封反帝」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大陸在四九年立國後，趕走了「美帝」又迎來了蘇俄「社帝」。後來毛澤東趕走了「社帝」，又迎來了「美帝」。反帝任務只可說是初步完成。

至於「反封」的任務，不但沒有完成，大陸在十年反革中，封建法西斯專政發展到頂峰，超越了任何時代。打倒「四人幫」後全國上下鬧了一陣子「民主」，很快就被鎮壓下去。目前是在改革的旗下「復辟」，用「經濟改革」掩蓋其政治上的封建復辟。這是全世界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必須擦亮眼睛正視的現實。

他們一方面利用「改革」消除異己，又利用「改革」把一切民主運動的先鋒打下去，把一切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志士打成「反革命」、「特務」……。他們在封建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的倒行逆施，迫使愛國的民主先鋒轉入地下，跑到國外。民主運動呈現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局面。

民主先鋒們已意識到只有接下「五四」的民主火炬，沿著先人們的足跡前進。團結一切民主力量，組成最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造成國際和國內的民主聲勢，為打倒封建專制重建中華，貢獻自己的力量，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

於無聲處聽驚雷

目前中國大陸的統治者開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和一切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企圖通過審判幾個「特務案」（包括黨內外的）重新扯起「階級鬥爭激烈」的旗子，用「階級鬥爭」對付一切「反對派」。民主運動到了「低潮階段」，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中國的民主運動由歡呼到觀望。又由觀望發展到徬徨、沮喪、失望的地步。甚至有些人對大陸留學生在海外辦的「中國之春」能堅持多久，也持懷疑的態度。這是由於人們對形勢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世界上沒有筆直的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何況是民主運動。挫折和失敗在所難免。請問「五四」和「四五」在當時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表面上看是失敗了，但本質上是勝利了。以後的歷史證明它們是完全勝利了。目前的大陸民主運動，表面上看好像是失敗了，但民運先鋒們轉入地下繼續堅持鬥爭。值得欣喜的是許多高幹子弟覺醒了。他們的覺醒給民運帶來一股新的力量，因為他們來自特權階級內部，對特權集團內幕黑暗非常熟悉。他們對民主運動會作出特殊的貢獻。

我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海外，目前還處在「造輿論」的階段。大多數熱心民運的人是讀書人和學有專長的專業人材。如果要想使民運成為制衡統治階級的力量，民運必須和老百姓相結合。

最近在大陸出現的「野草」和「抗聲」就足以證明，面對中共的紅色恐怖，民運鬥士並沒有被嚇破膽，他們在中共的腹地，堅守在民運第一線。他們隨時可能被抓進監獄，面對殺頭從不畏懼。他們是中國的希望。我們在海外的民運者應當作他們的後盾，以他們為榜樣，以他們為旗幟，在海外喚醒更多憂國憂民的同胞參加民主陣線，為結束封建專制重建中華，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力量，海內外一切對民運喪失信心，對民運前途悲觀失望的人，應當看到曙光在前。越是黑暗的時刻，越是黎明之時。

魯迅先生寫過一首詩：

萬家墨面沒蒿萊
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
於無聲處聽驚雷

大陸現在又是「萬家墨面沒蒿萊」的局面，就讓我們在「無聲」之中再次聽驚雷吧！■



（圖片說明：方丹在寫作）

* *
* *
* *
徐山

論社會主義國家的 經濟改革

● 改革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所經歷的第三個時代

馬克思主義所經歷的百餘年歷史可從某一角度劃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學說的時代。它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著作聯系起來的。第二個時代是專政的時代。它是與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及其國家聯系起來的。第三個時代是改革的時代。它是與鐵托、赫魯曉夫和鄧小平等名字及其修正主義和改革措施聯系起來的。這三個不同的時代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產生、興盛和衰亡的歷史全程。

作為學說時代的開端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其時代的頂峰則是《資本論》的面世和「第一國際」的建立。作為專政時代的曙光是十月革命的炮聲，其時代的烈焰則是二次大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作為改革時代的先聲是四十年代末南斯拉夫的改革。這個時代的降臨，人們普遍沒有意識到。因為當時正是社會主義陣營鼎盛之時，人們對社會主義有着足夠甚至狂熱的信心。當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從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情報局開除出去之時，人們只是盲目地贊成。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時代和潮流的開端。他們只把此視作一局部的修正現象，歸於道德上背叛的理由。但隨着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事件，特別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運動，使人們開始感覺到時代的脈搏。修正主義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歷史的必然。

在中國，這種來自東歐和蘇聯改革震波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泛起了一些漣漪。但也僅是一些漣漪，而不是巨浪。中國人對改革時代降臨的歷史感因受「新朝」的陶醉和毛澤東思想的麻醉而遲鈍。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的背景下，堅持列寧和斯大林過時的專政理論的一種負隅頑抗。晚年的毛澤東把「反修」視作他的頭等任務，並借此滿足他當馬克思主義第三代掌門人的「世界導師」之夢。「九評」和中蘇論戰，「四清」和文革的發動，都是他妄圖把改革浪潮扼於中國大門之外的一種恐懼心理，但他苦心孤詣在文革十年所建立的種種體制和精神的防範堤壩，隨着他的死亡及謫傳的四人幫的垮台而崩潰。改革的浪潮經過廿餘年在東歐和蘇聯的積聚終於叩開了中國的大門。開門人和引路人是鄧小平及其改良派。

改革的浪潮發紉於南斯拉夫，經過卅年，終於理清了中國這片紅色的大陸。時代的步伐

編者按：

最近，中國共產黨正在大張旗鼓的進行他們自上而下的「改革」。於是乎，有些人，包括一些心地善良的朋友說：「你們錯了，喏，他們不是在改嗎？」本期選用徐山的這篇文章，算是一個初步的回答。文章長了一些，理論性的詞語也多了一些，但願無礙于關心這個問題的讀者們。

我們希望讀者用經濟理論的眼光來讀這篇文章。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康·梁變法」之類的改革多的是，當是時也，揚者捧之上天，貶者打之入地，都是因為感情的色彩多，理性的色彩少，都是因為理論上的短視。

我們也希望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潮流的如鄧小平、陳雲等能看到這篇文章，如果目前正在海外收集「中國之春」情報的人員盡職的話。

摘要

- 改革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所經歷的第三個時代
- 數學模型
- 改革的背景和緣由
- 改革的內容
- 改革的先天缺陷
- 中國的經濟改良

雖然在中國姗姗來遲，但在今年却極為迅猛。似乎在彌補時間的誤差。這證明了修正主義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改革的過程包括政治、經濟以及上層建築諸方面，本文只就經濟改革試圖作一分析。

• 數學模型

1 概念

馬克思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概念及由此而推出的整個體系，使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理性化。這樣就不但以他的平等的誘人口號吸引勞苦大眾，更以他的體系的完備性吸引知識份子。由此可見概念的重要性。

在今天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科技及由應用新科技而製造的現代化設備在生產中作用大於勞動者的作用之時，「剩餘價值」地位便受到動搖。隨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也受到現實的否定。舊概念的價值便失去了現實的意義。「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這些概念也有着相似的命運。這些概念，曾在專政時代被斯大林運用得滾瓜爛熟。毛澤東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神奇反作用，也是對這些概念的極度發揮。這些概念至今仍是官方理論家分析社會的唯一墨斗。

經濟改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變種當然不能套用馬克思過時的概念。

2 生活率，生產率和占有率

自然科學之所以取得相對真理的無可爭辯的位置，這是由它取用數學化而達到精密化的結果。社會科學各門流派爭紛不休則由於它的非數學化而未能達到精密化。隨着廣義數學和電腦的發展，人文科學的數學化和精密化，已成了世界知識進化的趨勢。

本文只是對與體制改革效果有關的社會函數與其自變量（生活率、生產率、占有率）之間函數關係作一接近數學的粗略分析，仍不能算是數學化和精確化的。

分析經濟改革產生的原因導致的效果，其唯一的客觀依據便是社會效果。這是一個綜合的指數。按數學的概念，便是一個「多元復合函數」。這個社會函數雖然是一個龐大的綜合指數，其間有千千萬萬個依賴最先進的電腦亦無法精確處理的自變量，但為了研究的方便，在這裏我們只關心與經濟體制改革有關的社會函

數。在這種研究範圍的限制下，這個社會函數主要有三個自變量。經濟改革引發的三個自變量的改變，足可以在這個反映社會的繁榮和合理程度的函數中得到表征。

生活率——這即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主要成份是絕對值，再加上相對值的修正。生活水平的絕對值反映在「國民平均收入」，「耐用消費品平均占有量」，「住房每人平均面積」等指標上。生活水平的相對值，即是貧富懸殊度。它反映在全民免費的福利費用上。如免費教育程度、公費醫療、退休金、養老金、救濟金等等。

按照人本主義原則，我們視生活率為社會函數的第一個主要變量，而馬克思則把生產力視作最基礎和最重要的。當然早期馬克思主義亦有人道主義的成份和幻想，但由於其理論在出發點上不是把人視作第一位，導致了其在實踐上只強調生產，尤其是與人民生活距離較遠的重工業；只強調積累而忽視消費。這便是蘇聯六十年，中國三十餘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固定模式。社會主義生活的目的，這個經濟學上的淺顯的常識，我們在近年才開始討論辯明。這是何等荒謬！由於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出發點上的錯誤，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毫無例外的物質匱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排除購物和憑證供應是社會主義的特色。但共產黨的領袖及其理論家却憑着生產力水平有提高（一類與人民生活無關的廢鐵，甚至有害的武器！）振振有詞地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大唱贊歌！我們的空肚再忍受不了這種贊詞，必須拋棄這種評判社會生產力標準。重新回到「人」這個中心，以生活率作為評判社會重要標準。



落後的生產方式

生產率——即國民總產值（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它與「生產力」這個概念不同。首先，它把「生產力」概念中與體制改革無關的因素排除在外，從而更能清楚顯示制度與生產的函數關係。因為生產力包含三個要素，其中一個是勞動對象，即國家資源。這是由地理環境（當然科技也是一個因素）決定的，與制度無直接關係。中東產油諸國，其國民財富的急劇膨脹並不能說明他們的制度是最優的。這是有油的緣故。此外，①生產力只能反映靜態的生產狀況，而生產率却能表征動態的經濟狀況。②生產力的另外二個要素，即勞動者的質素（知識和技術的水平），勞動工具的水平，都反映着其生產和科技的現時水平，而看不出其變化，看不到制度的活力。而生產率這個變量却能反映着社會函數的變動，從而決定制度的好壞和改革是否必須。

當然，生產率也並不完全與社會函數成正比例關係。當生產力水平起點低時，一些微小的改良，也可使生產率大增，如我國的解放初期的狀況。而一些生產力水平起點高的國家，如美國和西歐諸國，制度仍有很大活力時，其增長率也不可能很高。

生產率是社會復合函數的第二個主要的變量。一個繁榮和完善的社會，首先依賴於高的生活率，而高的生活率則只有在高的生產率基礎上才能獲得，這是顯淺明白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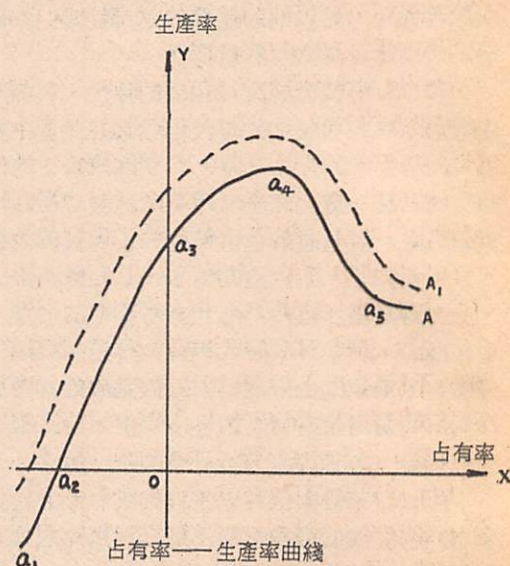
占有率——它是以公有化程度作量度的，其絕對值程度愈大，則表示其形式上的公有化程度愈高。為了表示資本主義國有化與奴隸主國有化，封建中央集權的國有化以及社會主義國有化本質上不同，則以正負數符號以示區別。實質上的公有化——即代行管理這種全民所有制的政府或企業管理層是民選的，並無權力上的特權，人民是真正共同占有國家財富——一則以正的符號加之。這種理想情況只存於馬克思的理想之中，在地球上並未存在過，在不久的將來也不會存在。但在目前諸種社會制度中，福利性的國家資本主義相對來說是較接近此一極限。此一極限可用 \ominus 表示。而奴隸主占有制，封建帝王的中央集權，法西斯專制以及個人獨裁形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應以負的符號加之。雖然後者似乎在形式上是公有制，實質上却是最大的私有制。它的公有化程度符合「絕對值愈大但符號為負的數，其值愈小」的數學規定。

占有率是社會函數的第三個主要自變量。社會函數首先決定於生活率，而生活率又有賴

於生產率，但生產率又因占有率而變。因為人們生產的動力來源於人們對財富的占有的分配狀況，即占有率分佈曲線。這便是通俗的「物質刺激」。而財富的占有則根源於人求生的自我肯定的本能。

這三個自變量分別占據生產、分配、消費（生活）的三個循環，互相影響。使得社會函數是一個多元的復合函數。體制改革的影響首先是引起占有率的改變，從而牽動生產率和生活率的改變，最後導致社會及函數變化。

有了以上這些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慣用的概念後，我們接着便可以用函數圖象象征式地分析它們間的關係及規律了。



3 占有率——生產率曲線

以占有率為X軸，生產率為Y軸作它們關係的曲線A，這不是一個單調函數（即只增或只減的函數）

①在 $a_1 \sim a_3$ 區間，由於占有率的負值是形式上的公有制，隨着公有制（形式上）的降低，即占有率絕對值的減少，生產率增大。即生產率與公有化成減函數關係，也可以說生產率與私有化成增函數關係。

以中國實際情況為例，在 $a_1 a_2$ 段生產率為負數的區間代表五九年開始的經濟困難時期以及六六年開始至六九年文革動亂期，與此生產率對應的占有率是形式上的極大的公有制，所以對應負的絕對值大的占有率，兩個經濟危機時期慘狀最能反映占有率——生產率的這種關係。

$a_2 a_3$ 段表示隨着私有化增加，生產率亦提高。這代表經濟困難後劉少奇所採取的修正主義改革以及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在農村所採取的包產責任制和在物質刺激的時期。這

時期的改革可歸納為使占有率的值減少，從而引起生產率的增加。以一般語言敘述，即是增加私有性從而增加生產率。

② a 3 a 4 段表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適當地增加一些現代化大企業的公有化程度（股份公司也是一種公有化的表現）也能使生產率上升。但這個生產率極大值的位置 a 4 亦是在私有制下部份企業的公有化。這只是一個尚未達到的理想點。處於 a 3 ~ a 4 段經濟已是一個很良好的經濟了。

③ a 4 ~ a 5 段表示占有率（公有化）的減函數。資本主義國有化程度愈高，國營企業越多，則生產率下降。如英國的國營企業，該國在這兩年對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後，生產率都有下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專家研究世界各國資料後證明在大多數公營企業當中都發生虧損，需要政府補貼。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情況，我們國家的情況則根本不同，不必多說。

粗略地說占有率（公有化）與生產率在一般情況下總是減函數。或者說私有化與生產率一般地總是增函數。最新的例證便是我國農村「一包就靈」的效果。

這條曲線 A 是屬於曲線族 A_x ，位移則決定於不同國家經濟起點或生產力狀況（資源、科技文化和機械設備等）。其曲線形狀可能有些差異，但這種減函數的大勢是不變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利用這條減函數曲線，使公有化的占有率減少，增加私有化程度從而取得上升的生產率，擺脫經濟困境。我國的經濟改革正艱難地在 a 2 a 3 段曲線上往上爬。

4 生產率——生活率曲線

以生產率為 X 軸，以生活率為 Y 軸作曲線 B 1, B 2

生產率與生活率成增函數關係是顯然而見的正常常識。這裏要分析的是這些不同的直線（B 1 與 B 2）的「斜率」是不同的。即在不同的經濟模式下，生產率的同樣值（如 b_0 ）對應不同直線（B 1 與 B 2）却有高低不同生活率（ b_1 和 b_2 ）。在同樣的生產率下生活率高的直線其「斜率」大。

一般來說在以生產者為中心的經濟模式下（斯大林經濟模式是典型）直線的斜率是低的，甚至可能發生極端的情況，生產率增長了，生活率反而下降。但這種經濟便不能沿直線向上移動，攀登更高的生產率，而只能在原處上

下作有限振幅的振蕩。因生活率低下牽制了生產率的上升。消費的萎縮也使社會停滯。

而在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模式下，直線的斜率是高的，尤其是全民福利的國家，但斜率的過高，影響了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也會使生產率下降。

這個「斜率」是決定於積累——消費的比率，重工業與輕工業和農業的比例等諸因素的，中國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兩次調整都是調整這個「斜率」。但最佳的斜率不會是一個靜態的固定點，它應放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動態中決定。

5 占有率——生活率曲線

由占有率——生產率曲線和生產率——生活率曲線，自然可以推導出占有率——生活率曲線，這第三條曲線是前二條曲線的推論。因為生產率與生活率近似成正比例的直線關係，只要把占有率——生產率曲線的 Y 軸（生產率）適當改變量度的比例關係便可換成生活率軸。所以占有率——生活率曲線的形狀與占有率——生產率曲線形狀大致相似。有關占有率——生產率曲線的敘述可套用於占有率——生活率曲線。

6 社會函數

以 S 表社會函數，O 表占有率，P 表生產率，L 表生活率。由上敘述，以數學語言表達。S 是 O、P、L 的函數。即

$$S = F(O, P, L)$$

$$\text{但 } P \text{ 又是 } O \text{ 的函數 } P = 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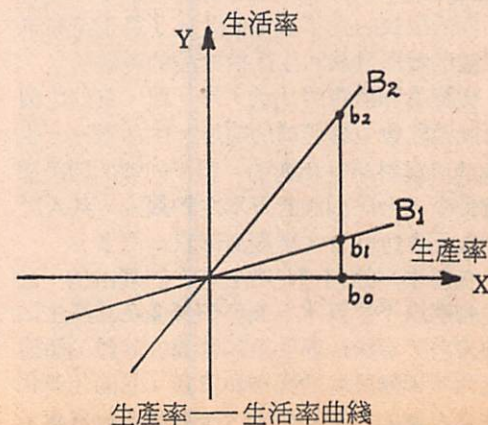
$$L \text{ 也是 } O \text{ 和 } P \text{ 的函數}$$

$$L = h(O, P)$$

所以 S 是一複合函數

$$S = F(O, g(O), h(O, P))$$

從這個關係式中可清楚看到占有率與社會函數的關係。通過體制改革，使占有率變化，從而使社會函數得到一個較大的值。



要評價中國目前的經濟改革，不得不先評價世界上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歷史，因為中國的改革只不過是這場歷史中的一部分而已。

• 改革的背景和緣由

改革發生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的經濟。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時代，雖是列寧所開創的，但他的實際統治只有短短幾年，隨後就是斯大林的長達近卅年的統治。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東歐所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是由蘇軍解放和蘇共控制的。那些國家的經濟也自然接受蘇式的斯大林模式。這種模式有如下的特點：

甲、低斜率型（依據生活率—生產率直綫）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消費品的奇缺，凭證供應和排隊購物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普遍感受並習以為常的現象。與這種貧乏的物質生活相匹配的是高調的精神說教和道德訓令。「時刻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勤儉樸素，艱苦奮鬥」等，不但是官方宣傳的口號，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這是緩和人民對貧困的物質生活不滿的精神麻醉劑。

要解釋這種觸目皆是的現象，可用數字，即國家的平均積累率。在蘇聯，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積累率大於 25%，匈牙利則大於 22%，波蘭大於 21%，捷克接近 20%。由於積累率高，國民分配自然就減少。這是從金錢的量值上計算的。如從生產物質佔工業總產值的百分率去計算，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都超過 60% 以上。在蘇聯這種比例在一九五〇年高達 69%，波蘭在一九六〇年為 63%。生產物資佔總產量的高比例意味着消費物資的低比例。在改革前，一般只佔 10% 左右。這就使得農業和輕工業這些與消費品有關的部門其生產增長率大大低於重工業的增長率。這種不平衡的發展的長年積累便造成了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畸形發展和生活消費品的奇缺。

從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農、輕、重的比例便可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畸形。生活率——生產率的直綫斜率是極低的。對於同樣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全民福利的資本主義國家，其人民生活水平會比社會主義經濟國家高得多。

低斜率型的經濟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像資本主義經濟那樣在其誕生之時和之前，有從外部供給其營養的母體的胎盤和乳汁。即殖民地的資源和財富。它的工業化只能凭自身的力量。像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農民去自由市場

在十六世紀使用過馬克思所處的十九世紀認為是殘酷的手段一樣，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在廿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也使用八十年代看來是可怕的手段，即利用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價格剝削農民，以高積累率籌措資金實行工業化來犧牲全體人民福利水平。這些在當時的環境是不得已的辦法。這是列寧所說的「打破循環」的辦法。而當時人民因受革命所煽起的熱情和理想，也願作出這種犧牲。所以蘇聯和中國都是凭這種高積累率和低生活水平以及相應的「政治熱情」而初步完成其工業化。這是低斜率型經濟的成就。

但是，「精神刺激」只能奏效于一時，「物質刺激」才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動力。人們初時自願犧牲的熱情是有時間作限制，並以將來能享受幸福為前提的。十年，廿年，甚至卅年的艱苦奮鬥的結果仍然是貧困的現實飄渺的將來理想，這個隨着時間不斷向前移而不可能拉近距離的理想，便失去了誘惑力，這便是中國目前出現「三信危機」的根由。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的絕對生活水平的一定提高，對消費品的種類，品質，數量的更高和更大的要求，與這「兩個比例」（即積累與消費，農、輕、重）的失調便形成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如果任由其激化，便會由經濟性的轉化為政治性。波蘭在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兩次導致政府和領袖倒台的政治事件，其根由都是由消費品的奇缺和加價所引起的。這種矛盾的壓力便導致了改革的產生。對於明智的統治者，改革是以矛盾未激化和轉化為政治爆炸事件前逐漸引渡的，蘇聯的柯西金改革和中國的鄧小平改革，是屬於這一類。對於低能的統治者，改革是在政治事件或經濟危機發生後才被逼推行的。匈牙利的改革和中國在六十年代初改革便屬於這一類。

而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盡量以「物質刺激」代替「精神刺激」。降低積累率，提高農業和輕工業在三大部門中的比例位置。一句話，即是改變低斜率型的經濟。

乙、高「佔有率」型

斯大林模式除了低斜率型的特點外，另一顯著特點便是高「佔有率」型，亦即負值的公有型。因為斯大林模式的經濟，其「佔有率」的絕對值是很大的，即它在形式上是全民所有制，佔了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除了在農業上是集體所有制），所以是公有型。但由於這種全民所有制實質是國家所有制，即中央集權制，而國家在實際上又並不代表全民的利益，國家只是由特權的官僚階層所控制並代表其利益的，它只是特權階層的私有制，故其符號是負值的。

這種增加佔有率，實行公有化和集體化的過程，也是通過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使用的野蠻手段實現的。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是通過對資本家的剝奪來達到的，就像英國「圈地運動」對農民的剝奪那樣。在中國則方法較溫和和漸進。除了對官僚資本「沒收」外，對民族資本則先利用，後贖買，最後剝奪（文革）的方法。而集體化則經兩個程序，首先是剝奪地主的土地（土改）並在一段時期內使農民佔有土地，第二個程序是使農民與土地分離，這就是集體化。

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體現為官僚階層的國家所有制，他們對經濟的所有權、控制權、管理權和分配權，又最集中表現在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上。正是通過計劃經濟，中央官僚通過層層的地方官僚，決定資源（投資金額、設備、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應量）的配置，生產計劃（生產品種類和數量），銷售和流通，分配和消費。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決定權力，表現出這種形式上的公有制實質上是官僚階層的私有制。在極端的情況下，如中國在五八年，最高領袖的個人意見成了經濟活動的主宰。這時，在形式上也成了真正的一個人的私有制，奴隸主或皇帝的私有制。

體現官僚階層的私有制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最根本的區別。當然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初期，這種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可以集中和調動全國的力量（不計成本），把有限的資金用於官僚階層認為最需要的地方，在短時期內，創造出一些純供顯示「成就」的個別項目上。在毛澤東時代最值得炫

耀的便是原子彈爆炸，洲際導彈發射，衛星的上天，南京的長江大橋等。但這與隋陽帝在外國人進入京城的沿途樹上，纏上絲綢以炫耀，又有什麼區別呢？這種計劃經濟在初期經濟落後情況下，企業數目不多，規模不大，資源的平衡，流通和分配並不複雜時，還能勉強適應，或者瑕不掩瑜。所以在五十年代，蘇聯的工業化成就和中國在建國十周年時成績，不是使世界和中國人醉心和贊頌嗎？那時，不知多少人真心呼喊「社會主義好！」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固有的弊病，便越來越明顯的暴露。企業的數目和規模越來越大，如蘇聯從五六年至六〇年新建四千八百七十個企業，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社會生產全過程的複雜和變動，係計劃經濟像一堆亂麻，「剪不斷，理還亂」。這樣，企業便經常處於或缺乏能源，或沒有原料而處於「開三停四」的狀態。設備的閒置和浪費，達到驚人程度，勞動生產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上，單憑政治宣傳鼓動勞動熱情和加班加點，增加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也無法彌補這種巨大的損耗。而品質的低劣，無法在市場銷售，更使它的價值不能實現。利潤率是負值。這種計劃經濟，使生產數量和價值都受到損失，造成國民經濟的停滯不前，從而使社會問題叢生。這樣，便為改革提供了「理由」。而計劃經濟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困難時期，則加速改革的到來。



卖了农副产品，买回钢筋建新楼。

以上說明體現官僚階層的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弊病，僅僅是一些表面現象。事實上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對立的集權的計劃經濟，因它從根本上違反了人的「自我肯定」本性，使人和企業單位在生產活動中失去了主動性，造成經濟困難和危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以上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初期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兩個顯著特點，即低斜率型和高佔有率型。正是這兩個特性違反了在生產中起決定因素的人的本性，負值的公有型把一切權力集中在官僚階層手上，剝奪了廣大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動性。低斜率型造成了低消費的社會，失去了勞動者的勞動興趣。這些「內病」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慢慢發作變成「顯症」。這便逼使改革的產生。所以經濟改革，（在政治上相配合的是修正主義），會在社會主義陣營內，毫無例外地，或遲或早地必然發生。這並不是某個英明領袖的務實主義和雄才偉略能產生的。

• 改革的內容

既然改革的產生源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低斜率型和高佔有率型，所以改革的內容也是改革這兩種特徵。

甲、提高斜率的改革

對低斜率型的改革，便是提高生活率——生產率直線的斜率。在生產領域上，主要是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比例。調整這兩個比例動的手術較大的是中國，無論六十年代初或目前這一次。目前中國定下的輕、重工業比例大約是各佔50%，調整的幅度是很大的。積累和消費比例中，中國由四人幫時期的積累45%降至一九八二年的28%，還準備降至25%。與此相比，蘇聯的調整比例則沒有中國的變幅大。政府只是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而已。但南斯拉夫其積累率則最低。

在分配和消費領域上，提高斜率，體現在物質刺激使用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首先集中在實行獎金制上。但不同國家的不同程度的分配方式的改革，使獎金與工資的比例有很大的差異。在蘇聯，獎金只是工資的補充。獎金政策仍牢牢控制在中央計劃部門手中。而中國在八十年代末期第一步改革中，雖然也有為數不少的基層單位「濫發獎金」（所謂濫發只是獎金比例超過固定的規定而已），但這是非法的。獎金總額大致上仍由計劃部門和勞動工資部門掌握，而由于國家控制着財政部門和銀行，濫發獎金是很困難的，有時還要退賠



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

和扣回。提高斜率的比獎金制更有效的方法，便是生產責任制和承包制。國家只對企業訂下一定稅收，農業單位只對個人訂下規定的上繳任務，超過此任務的全部收入便歸個人或企業所有。由獎金制過渡到承包制，是改革的初階段與高階段的區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已進入此一階段，其他的國家仍處在第一階段。而中國目前的第二步改革也是正向着高階段邁進。承包制已消溶了工資和獎金的界限，統一在一種個人收入之中。

乙、減少佔有率之改革

對負值公有型經濟的改革，便是減少其佔有率。減少佔有率即是把生產全過程中各種權力，從中央一級下放至地方，企業直至個人。由權力下放的終點在不同的層面上，而區分不同程度的改革。

蘇聯的經濟改革從赫魯曉夫時代始，改革的第一步，往往是把權力僅僅下放至地方為止。如一九五七年，蘇聯把經濟管理體制由「條條」（即國務院屬下各部）改為「塊塊」（即各地區經濟委員會）。這樣地方分享了中央部分自主權。這樣可減輕中央計劃經濟盲目錯誤導致的惡果，照顧了地方特殊的需求和利益，減少了信息文件傳遞還量及物資調撥運輸量。但是由于權力並未下達至企業和個人，對生產的直接動力仍未得到解放。所以收效仍不大。不但收效不大，相反還產生了一些流弊。這從來是改良派歷來的悲劇命運。從王安石、康有為到赫魯曉夫都是一樣。因為地方為了提高自給率，往往搞「小而全」。違背了現代工業的專業分工原則，造成經濟效率降低。而地方

和中央分享權力，造成了多頭領導的雍腫的官僚機構。這就是所謂「婆婆多」，降低了行政效率。

赫魯曉夫的「條條改塊塊」的改革，終于失敗，這是導致他下台的原因之一。一切改良派都應對此教訓深思。隨後開始了第二步的改革，即自六五年開始的，柯西金的新的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步改革特點是中央權力下放的終點降至企業和農業生產單位這一較低的層次。改革主要內容是擴大生產單位自主權。通過利潤原則，迫使企業面對競爭和自負盈虧，使他們的產品放在市場受取決。

大多數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已演進至此第二階段，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則走在蘇聯前面。中央權力下放至基層企業單位，是第二階段的標誌。但基層單位獲得多大程度的自主權，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

在南斯拉夫，企業獲得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最大限度的自主權，企業能根據市場供求關係決定他們生產的品種、數量。這些產品是面對市場，進行競爭，贏取利潤的商品。計劃經濟對企業的束縛極小，他們在企業內部是「自治」的。自主權達到「自治」的階段，差不多已是社會主義國家權力下放的極限。匈牙利的企業單位自治權則仍未達到「自治」的階段，他們仍受計劃經濟通過投資決策權，價格調節，金融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控制。但企業的自主權仍比蘇聯大。例如匈牙利的一些商店可租給私人承包，企業也可直接從銀行貸款而無須按計劃的分配投資。

權力的下放，無論在蘇聯、中國、捷克等國，大都經歷兩個階段，才最後達到企業單位。其間的抗拒是很大的，所以下移速度極為緩慢。

以上的減少佔有率的改革只限于微觀經濟上，即限于企業管理體制上。至於減少佔有率的宏觀經濟方面，則是以市場經濟減少計劃經濟的力量。因為負值公有制體現在計劃經濟上，而私有制（資本主義方式的而不是奴隸主或封建式的）則體現在市場經濟上。增加市場經濟力量，減少計劃經濟力量，便是減少佔有率。

不同程度的改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比例便不同。南斯拉夫型經濟，市場經濟比例最大，匈牙利型的次之，中國和東歐一些國家目前的改革則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這便是陳雲的經濟思想「籠子經濟」。而蘇聯的市場經濟比例最小。與市場經濟相關

聯的便是價格體制、財政政策和銀行功能。改革是否達到成熟，穩定，不會退化和自行運轉的階段，則依賴于改革是否觸及到這些宏觀經濟的骨骼上。

• 改革的先天缺陷

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無論跳得多遠，即使翻一萬八千個跟斗，也仍然在如來佛的掌心；社會主義經濟的如來佛掌心便是公有制。改良只是降低公有制的程度，趨向私有制，但絕不是私有制。從這個一致的趨向，我們已知私有制的強大引力場。私有產權才是改革趨向的磁極。私有產權如不能真正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永遠要依靠改良。私有產權不但應成為改良不可能達到的「趨向極心」，它還應真正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軸心。這個軸心在中國大地的樹立應成為民主運動的致力目標。這個軸心也是民主政治的有力靠山和基礎。

改革，有着共產黨人慣用詞句和口號所含有的「改革世界」的大言不慚的成份。

共產黨人在政治上要發動群眾，搞武裝鬭爭和政治運動；在經濟上要計劃經濟，世界順由人民天性的自行運動就這樣給粗暴地打亂了，造成了本世紀的極大禍害。柬埔寨波爾布特消滅城市的殺人行徑只是近年極端例子之一。無論計劃經濟也好，改革也好。都要依着共產黨人時時刻刻的領導、調整、改革而動。好像他們的行動一終止，地球便停止轉動。改革的基礎不建立在自動調節和自行運作的基礎上——依靠市場經濟、競爭、價格的自動調節，相反建立在共產黨的人為政策上，則改良效果始終有限，且還有逆轉的危險。只有把經濟建立在順乎人性的自動運轉的基礎上，經濟才能健康發展，西方凱恩斯主義所提倡的政府干預，即使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抑制了市場和競爭的自然力量，在八十年代也造成了相當的危機。馬克思曾把他的分析方法視作把每一事物看作「自然的歷史過程」。可惜，他的徒子徒孫並不能真正體會這個「自然歷史過程」的含義。

公有型和被動型是使改革不能徹底成功的



隱患。雖現時是一片頌揚報喜之聲，但前景却不可觀。

• 中國的經濟改良

本文不是專論中國的經濟改良，只是用以上模型和概念，對此一改良作一扼要的理性分析，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良的共同點不再重述。

1. 毛澤東模式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的。伴隨著五十年代初的中蘇蜜月期間蘇聯設備、專家的輸入，也一并輸入了斯大林的經濟模式。因此，中國的經濟也具有此模式的特徵。即它也是低斜率型的。也就是說有着高積累率 and 重、輕、農的次序。這種高積累率在一九五八年達到高峰，基本建設的投資極大，投資戰線過長——從農田基本建設，水利設施，發電站到煉鋼廠。而重、輕、農的比例則畸形化為「鋼鐵掛帥」。全民大煉鋼鐵，小土群，這種冶金工業的一部分幾乎變成全部工業，差不多取消了輕工業和手工業。農業也有一部分停頓。五八年的極端的斯大林模式演變成毛澤東模式——極低的斜率。國民經濟各部門嚴重失調。

在負值的公有型上毛澤東模式也是斯大林模式的極端。在毛澤東模式下佔有率增加的速度極快，即從私有制演變為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速度極快。劉少奇和鄧子恢就是這種速度過快的反對者，即他們是從傳統斯大林主義者反對極端的斯大林主義者。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八年短短五年，農村便完成了從個體、經由初級和高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改造。所以極高佔有率也是此模式特點。

2. 第一次改良（劉氏改良）

毛澤東模式達到五八年輝煌高峰後，由于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終於誘發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第一次改良。改良的緣由是毛澤東模式造成的經濟惡果。改良的內容，也是調高斜率和降低公有程度。在當時的流行語言便是「調整」，「下馬」，「退」，「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等。這就是以停、關、閉等形式縮小基本建設的項目，減少積累率。以下為新農業政策和重視輕工業政策改變農、輕、重之間比例關係。以物質刺激式的獎金制，提高人民生活率。從公社一級所有制降為相當於初級合作社水平

的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這是降低公有程度度的辦法。但這僅是在農業方面中央權力的下放，實現基層農業單位的自主權。而在工業方面計劃經濟完全沒有觸動，市場經濟只存在于交換農村產品的農貿自由市場。

雖然這次改良，尤其是改良的重心——生產隊的自主權及極端形式的包產到戶，對恢復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有很大的幫助。但這種改良畢竟只是初級的改良，它並未全面地從獎金制過渡到承包制；權力的下放也並未在工業上落實到基層單位；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只是一個微量的補充；它只涉及到微觀經濟而未觸及宏觀經濟。所以這種初級性質的改良只能在病態的社會中和低水平的起點上才能顯出奇效，在健康和正常的社會中奏效便不大了。由于它是初級的改良，它不是從根本上改良，並建立一套得自行運轉的經濟體制——即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所以它是「無根」的。它只是暫時地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大樹上剪下幾條樹枝作移花接木。特別是這場經濟改良基本上沒有政治改良作先導和保障，結果在毛澤東突然襲擊發動文革下，這場改良連同它的主腦人物劉少奇便徹底失敗了。但是，這只是形式上的失敗。經濟的生命力可以被政治的暴力壓抑十年八年，但合乎經濟進程的改革生命力始終會再度勃發的。這次改良的實踐和效果，雖被文革中批判修正主義的大批判浪潮所掩蓋，但在有頭腦的中國人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改良的大批主將後來成了第二次改良的倡導者，這就是「還原派」。

3. 第二次改良（鄧氏改良）

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浩劫，以毛澤東之死作導火線，終於又誘發了第二次改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是促使這場改良到來的主因。這次改良與第一次改良不同之點是它有政治改良作前導，因而較高級些。由于政治改良阻力重重，結果分成了二步走，所以第二次經濟改良也分二步。

甲、第一步改良（還原式）

第一步的政治改良是打倒四人幫，即打倒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極端的派別，「第一次改良派」得以復職（不是復權）。他們以鄧小平為首馬上執行的是「還原」政策，即重復第一次改良的措施：開放農貿市場，發回自留地，包產到戶，在工業和城市實行獎金制。隨後經過「洋躍進」的失敗，又仿第一次改革開始國

民經濟的調整，即調節兩個比例關係。以上這些都是還原政策。十年文革後的社會與六十年代初的社會一樣都是一個病態的社會。中國倒退回六十年代初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這種還原政策一樣收到顯著的效果。特別是農村的包產到戶。這次改良還有比第一次改良進步的地方，權力下放已從農村推移到城市，在全國，特別是在四川省，搞了六千多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而農村，改良也從以生產小隊所有制為主深入至個人的包產為主。而最為顯著的是，經濟由六十年代的完全封閉型，改為相對開放型，在這期間，地方（一般是省，在廣東、福建特區是縣）有外貿權，後來又被中央重新收回。在這第一步經濟改良，有進有退。調整期前是進，市場經濟直接向計劃經濟挑戰，在調整期中是退，這時是「鳥籠經濟」。

乙、第二步改良（突進式）

第二步政治改良是使凡是派和保守派在政壇上比重減至最小，而改良派則佔優勢，這是以十二大召開為標誌的，這兩派的失勢不像四人幫那樣是被打倒的（暴力式），而是使用幹部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以及精簡機構和裁冗員付職的和平替代式的。隨着第二步政治改良的實行，在今年，第二步的經濟改革便成為一股浪潮沖擊着中國大地。這次改良是向着高級形式沖刺的。

降低斜率的努力，在向着積累率為25%的目標降下去的同時，分配制度和用人制度上開始砸爛「大鍋飯」和「鐵飯碗」這會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色的弊病。範圍上，由農民的承包，擴展至農村的供銷社，城鎮的商店，甚至文教衛生等事業單位。而工人則將實行浮動工資制。浮動標準則按企業經濟效益和個人技術和生產表現。在用人制度上，今後招收的國家職工都按合同制履行。

降低佔有率的努力，表現在中央將給予基層企業更大的自主權，中央對地方和企業的控制，由行政命令和指令計劃的方式改為利用經濟手段，把上繳利潤改為收稅。經濟特區內企業其權利則更多。

所有這些都表明第二次的改良（特別是此次的第二步改良）比第一次改良高級。這是在本國範圍內的比較，把它放在社會主義陣營經濟改良的廣闊層面上比較，則中國的改良在蘇聯之上，而在匈牙利和波蘭之下。因為中國第二次改良起步晚，能趕上蘇聯，其「加速度」已是不慢的了。

丙、改良的前途

但由于毛澤東經濟模式的積重，不但難返，且也難變。原有的八級工資制，還有很多諸如地區差等等異常複雜，改為浮動工資，如何浮動，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中央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其間又要改良又要調整（在舊制度下），不把工資分配自主權完全交給企業，要由中央計劃和勞動工資部門訂出一個合理方案，將是天方夜譚。而國營企業在今年六月實行的利改稅制度，方法也是繁複，它分四種方式計算，即遞增包幹制，比例包幹制，定額包幹制和調節稅制，實行起來將會很困難。改良的措施的繁複，是與共產黨人的本性有關的。繁複性保證了官僚行政機構存在的必要性，肯定了官僚階層存在的理由和權力的使用。這種建立被動性（依賴于官僚的指令計劃）經濟體系的作法種下了改良的禍根，滋生了改良逆轉的可能性。那些改良之後的利益喪失者，他們會千方百計使改良逆轉，而這類保守派都是當今和過去政權的實力派，這就更為危險了。改良派將會處於人民不滿和保守派破壞的天縫中。

建立在被動性或指令性經濟體制之上的改良的局限性是必然的。我們且不去考慮由于政治的原因引致改良的逆轉或夭折，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中國的第一次改良失敗都是明顯的例子。單從經濟過程分析，這種改良的前景也是極為不妙的。由于改良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改良，所以社會主義經濟固有的公有制，中央集權和指令計劃是不可能改革掉的。這就使自動性的自由市場經濟萎縮在社會主義小花盆之內。在改良之初，引入一些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似乎使凝滯社會主義經濟大有生氣，引起不少國內外人士贊頌，但這兩種體制在本質上是互不相容的，當私有制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內取得可以對抗的力量時，兩種體制的矛盾便會尖銳，這兩種體制的矛盾會使國民經濟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出現危機，當然它不會是五九年那次全民饑餓的危機，這時改良派便會面臨嚴重的抉擇：私有制還是公有制？當然，凭着他們的權力，也許能抗拒社會的經濟潮流若干年，但在歷史的眼光看來，是不足輕重的，就像歷史和人民對待毛澤東一樣。人民和歷史終會作出合乎我們這代人現實的抉擇：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改良派如今利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就像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利用群眾運動一樣，放開閘門，就控制不住那萬馬奔騰的自由之川了。

“一胎化”人口政策質疑

黃醫生

喝采，聯合國計劃生育機構竟然要授與中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錢信忠一枚獎章，以做鼓勵，這就等於正面肯定了“一胎化”的政策。

但細細一想，“一胎化”問題重重，是否良策，值得懷疑。

由於男勞力的社會實際需要和重男輕女的封建傳統，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造成了農村普遍的殘殺女嬰現象。問題之嚴重，已到驚人地步。結果，男女嬰孩比例大大失調。附表是根據報導整理的安徽懷遠縣一九八一年男女嬰孩出生情況。男嬰已平均超出女嬰近百分之卅之多。國內各地報紙強調，此決非個別現象，而帶有很大的普遍性。

長此以往，二十年後，男女嬰孩均進入婚齡。必有大批男子漢找不到對象。那時的鄧小平已入九泉，肯定對此現象負不了責任了。那時的決策人物，為了解決百分之廿男人淪為單身漢的問題，會不會將古老的一妻多夫制復活？

中國大陸目前廿至四十歲的人佔三分之二，平均年齡為廿六歲左右，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之一。

但如果強制實施“一胎化”，有人估計，三十年後，中國目前佔人口佔三分之二的年輕人將步入暮年（五十~七十歲）。那時，廿至五十歲的人約佔六分之一，廿歲以下的未成熟人約佔六分之一。由於其餘六分之四的人為老年人，中國將會驟變為嚴重老化的國家。

請設想一下吧！三十年後，即公元二〇一〇年左右，當你走到商店、電影院、餐館、理髮店等公開場所，你將發現三分之二的男人為白鬍子老頭，三分之二的女子戴着老花眼鏡。二〇一〇年以後，社會上最暢銷的產品將是老人拐杖。醫院裏的小兒科醫生和婦產科醫生將有大批轉為老年病科醫生。餐館裏需求量最大的食品大抵將是稀粥、豆漿和軟面條，因為老年人的牙口是不好的……。

大概，最致命的問題是社會福利問題。大批老人將喪失勞力而退休，靠退休金和養老金，即靠社會福利而生存。那時，廿至五十歲的壯勞力一創造財富者，只佔六分之一。老年人和小孩子就靠這批壯勞力養活，相當於一個勞力支持四個或五個非勞動者！這樣的重擔，何



只要一個：男孩

原載 | 諷刺與幽默 |

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共產黨執行政策的規律，在人口政策上也是如此。遙想五十年代，馬寅初先生節制生育的合理建議，被毛澤東打成“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加以徹底壓制。馬寅初先生也大禍招身，定為右派。毛澤東的“人多，熱情高，好辦事”的聖旨，一下子使中國人口膨脹到十億，終成了爆炸局面。

中國共產黨一見大勢不妙，立即左擺，強行剝奪，制出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胎化”節育政策。共產黨決下之大，確也贏得不少人

以承當得起？

“一胎化”的嚴重後果還在下面。試想一下，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那麼，所有的孩子都將成為獨生子。所有的獨生子沒有哥哥，沒有姐姐，沒有弟弟，沒有妹妹，他們的後代自然沒有叔叔，沒有伯伯，沒有姑姑，沒有姨姨，沒有舅舅。什麼妯娌關係、裙帶關係、姑嫂關係，統統消失。那時的小孩子，只有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祖父、外祖母的概念。兄弟姐妹，姑叔姨舅的概念將在大陸滅絕。學校裏要教給小學生什麼是哥哥，什麼是姑姑，什

麼是舅舅，看來只有到動物園中，拿小猴子做活教材來打比方了。由於沒有感性知識，三十年後給高中學生講授妯娌、姑嫂的概念，可能比講解數學裏指數、對數的概念更為抽象，更為困難！

至於獨生子嬌生慣養所造成的特有的驕嬌二氣、唯我獨尊，將對社會倫理造成什麼樣的沖擊，目前則難以預言了。

史學家將把今日的人口爆炸歸罪於毛澤東，那麼又將把“姑叔姨舅”在大陸上的滅迹歸罪於誰呢？

附表：安徽省懷遠縣一九八一年男女嬰孩之比較

單位	出生情況					男嬰超 女出嬰%	男嬰平均 超出女嬰%
	總數	男	男占%	女	女占%		
河溜公社	285	164	57.5	121	42.5	15.0	27.0
雙溝公社	133	83	62.4	50	37.6	24.8	
龍元公社	231	145	62.8	86	37.2	25.6	
欄橋公社	104	66	63.5	38	36.5	27.0	
華圩公社南台大隊	8	7	87.5	1	12.5	75.0	
崗廟公社邵王大隊	9	7	77.8	2	22.2	55.6	
褚集公社橋口大隊	10	9	90%	1	10%	80.0	

自由歌

鄭保羅作詞

起來，起來！大中華的兒女們，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大家唱，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國家強！
自由人人愛，人權人人享，
民主要守法，社會得安詳，
看！這自由的大旗，放光芒，放光芒。
三光永照，倫常發揚，
五族共和，民富國強，
五洲大同，世界和平，
撐着這自由的大旗，勇敢前往，勇敢前往！

寄遺孤

卜友書

博士人情紙一張，
舊句潦短思念長。
中歲兩女頻問候，
殘秋十月過雁忙。
國內忠信含冤死，
海外孤直恨未亡。
果有人民作主日，
野祭告翁又何妨！

1980.10.12



香港之戰

怡文（芝加哥）



香港問題，去年九月英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開始了新的回合，但不是飛機大炮的，是除了武器以外，在所有外交、政治、經濟、統戰、教育、文化各條戰線上，都在激烈進行著。

「鐵娘子」進攻，中共設防退却

撒切爾夫人在北京提出三項原則：反對國際的侵略擴張，重視香港居民願望和利益，國際條約必須遵守。這樣，意味英國政府立場採取引人注目的新轉變。

衆所周知，中共一九七一年加入聯合國不久，就在殖民地委員會上聲明將港澳除名。當北京過去一再重申香港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的時候，英國和香港當局從來沒有否認過。大家一定會清楚記得，一九七九年四月上屆港督麥理浩首次正式訪問北京，與鄧小平、黃華等會談後返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香港是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有關領土問題，在時機成熟時，自可解決」。大前提完全承認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中國的。麥理浩爵士是經驗豐富，十分幹練的職業外交家，以香港總督身份發表講話，當然不是他個人意見，肯定是獲得英政府授權的。這次撒切爾夫人訪華，却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死扣過去的不平等條約，認為滿清政府被迫割讓香港仍然有效，使趙紫陽總理連忙聲明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領土主權，會談在唇槍舌劍中進行，毫無結果而散。

說要重視香港居民的願望和利益，是十分尖銳的挖苦諷刺。言下之意，指香港居民絕大多數雖然並不是英國人而是中國人，但他們通過現實生活對比，並不喜歡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制度，大陸遠不如英國統治的香港，給趙紫陽一記悶棍。

此後，中英兩國外長以下高級官員頻頻互訪，無非是把球踢給北京，迫著中共早日表態

。本來，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在收回後怎辦，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用不著英國人來干涉。但英國就是這樣做了。香港政府並沒有鼓勵居民去倫敦請願，却有意派出一個又一個代表團，如：新界的、學者的、工商界的、婦女的、其他各界的到北京，今天求見鄧小平、鄧穎超，明天找廖承志、喬仲勛，提出這個顧慮，那個擔心，出了許多建議和難題。

中共在忙於招架之下，不久前曾不得不通過駐港官方機關報「大公報」，拋出一個以「滙點」團體為名稱的建議，列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四十條，洋洋大觀，將「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的意見表達出來。但明眼人一看，就覺得它並不接觸實際，根本不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首次出現香港的巨額預算赤字。雖然石油跌價，但香港多種公用事業費用却大幅度地上漲，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整個工商業不景氣，輸出減少，失業增加。幾塊公地數次降低售價仍拍賣不出去，表明港人已對投資失去信心。隨之港幣貶價，美元與港幣的兌換率已從1：5.5貶為1：7.7，貶值率為百分之四十。股票亦跟隨下跌，這一切使香港人民惶惶不安，致使中共駐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蔣文桂，大公報和文匯報紛紛發表文章，籲請港府取消港幣存款利息稅。其實取消微弱的利息稅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祇表明了中共對香港不安定的憂慮。在「大限」之前香港商畏懼中共而挾資外逃。北美與中美，已成避秦之地，這當然影響中共的聲譽。

英國這個狡滑精練的殖民老手，肯定絕對不輕易放棄東方明珠的香港利益，其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地，咄咄迫人地，在香港問題上向中



我對香港前途，好有信心。」

共進攻，那是看透了中共的窘境弱點。主要原因是香港對於中共的價值鉅大。鄧小平要搞四個現代化急需的資金、技術、人材，那是向蘇俄、東歐集團請求辦不到的。對香港的任何急躁過左政策，會引起外資却步不前和失去西方國家的幫助。何況，香港在目前仍是通向西方聯繫的主要橋樑，中共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外匯收入直接來自香港，間接數字也相當龐大。因此，中共被迫不斷採取退讓守勢。最近港方更放出「香港問題談判會有新的突破」、「緩期收回」的試探性氣球，看你咋辦？

畢竟，中國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福克蘭島，解決香港問題完全排除武力一途。英方要在其他方面打主動進攻仗，只不過是最後一招，採取「攻勢防禦」的戰術而已。聰明的撒切爾夫人不會不明白最後的王牌在中國手裏，如果造成過度動盪不安，讓中共有理由提前收拾殘局，也是她不希望發生的，那時改用「上海方式」，接管大幅貶值的私人資產，將要以極低的價格支付「贖買」政策的利息，苦了的還是中國居民。

* 失去「自由化」後的香港

目前香港社會輿論，出於某些原因，有意迴避香港將要發生的問題。不講不等於事情不存在，想要解決問題，非要面對現實不可。

香港在英人長期統治之下，雖然也有一些工業，但基本上是個消費性、商業性、娛樂性、投機性的城市。某種意義上說，是靠一些畸形的行業支撐起來的，它在未來的時刻將要遭遇許多問題，在經濟上如：

金銀、股票、證券和期貨貿易市場，每年有超過二千億元買賣，這些稱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大動脈，在社會主義下則列為投機性，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其去留將會有什麼影響，能否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

馬票、六合彩每年也有二百億元生意，還有麻雀店、賭博等是否繼續保存。林立的茶樓、酒家、夜總會或一些變相的色情娛樂業又如何？

銀行和財務公司的經營對象和方式將要改變，未來香港市場不可能沒有中國貨幣，人民幣取代港幣流通後會怎樣，倘要發行特區的專用鈔票，國際匯兌結算的信用是不容易保證樹立起來的。

外匯和外貿自由化將不會長久，如果不加管制，有可能對當地產品和公私企業帶來不利

，卡死了又會失去靈活性。

未來國營企業對現有的私營工商業、國貨公司的供銷分配和利益協調問題。

懸掛中國國旗後，將使美、日、歐的巴黎統籌委員會批准的科技設備輸入香港受到限制；香港也再不作為一個貿易地區，單獨享受西方國家國際貿易的優惠待遇和占職工人數眾多的紡織、製衣、輕工、電子、五金等行業產品的進口配額，這些肯定使香港經濟受到重大打擊。

儘管香港現有的房地產集團與中共關係密切，這些大資本家並任大陸代表委員和國際投資公司董事，但這一項最大的投機事業對香港居民是最不得人心的，任其投機倒把，重利盤剝，最不利香港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中共對之將面臨重大抉擇。

在政治上，香港既然結束殖民地，中共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將代替總督，各部門的洋人主管，就得走路，體現共產黨的絕對正確領導，所有機關、企業、學校、團體就要建立黨、團、工、婦組織，職工就要協調與資本家、業主技術人員的關係以發揮組織管理取得經營效果。

中共領導只說要投資者放心，對九十五%的居民職工前途沒有說，沒有說不等於問題不存在，因為對香港居民如果取用大陸現行的辦法如：戶口管理、計劃生育、定量供應，憑票購買、上山下鄉、分配職業、憑證來往、宗教信仰等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稱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沒有民主自由不能使居民放心。最後，聰明的資本家也不放心了。何況，中共在政治上繼承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呢？

香港居民不僅不願回國定居，而且還打算離開香港到外國去。未來他們擔心到那一天香港再不作為地區，會失去了對美國每年二萬人移民，英聯邦國家的大量移民配額。

法律、行政、言論（包括出版、報刊、廣播、電視等）、文化、教育、娛樂、社會各方面，將出現新的準則，如果前面一律加蓋「四項原則」的戳記，束縛思想學術自由，甚至鄧麗君這樣正派的音樂也在禁制之列，令人啼笑皆非。

還有人擔心選出一位「港人治港」的新市長，經中共批准行不通，因為一切政策方針都不是由他制定的。

* 不可忽視的政治價值觀



求神庇佑，談判成功。

中共對於香港問題，在政治上，主權國與殖民地的界線是明確的。這也是談判時的出發點和歸宿。

設想，如果香港領土主權不能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收回，對一百多年來忍受屈辱的十億人民是通不過的。維護民族尊嚴，不容許拋棄祖國一寸土。海峽兩岸北京和台灣的領導人都絕不能讓步，人民沒有「賦予他們這個權力」。國家領導可以更迭，人民却是永存的。違背人民意志不行。簽約的滿清皇帝，最後連他的統治也被否定。

遺憾的是香港佔九十八%居民是中國人。在目前情況下，對香港領土主權回歸，面臨「解放」，却成了他們最擔心的事。在大陸每年仍有成千上萬人民冒著生命危險逃到那裏，這是十分反常的、悖理的。這樣的事實難道不能引起中共領導集團深省嗎？身居世界各地的華僑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失去民主自由的人民無祖國，實在令人感慨繫之。

作者過去曾和香港大學政治系主任夏理斯教授有過筆戰。他高談香港對英國沒有多大利益，英軍對保衛中國沿海有好處，得出期滿續約仍由英人治理的結論。我至今仍然不同意。目前有一種改換的說法：「承認主權，緩期收回治權」。要是中共接受的話，那就等於公開承認自己管理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無能，豈不加速大陸人的「三信危機」？

但願中共在這場未來十五年的「戰爭」中慎之又慎，不要成為政治上的失足者才好。

評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二大障礙

中國留學生 余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高雄區立法委員候選人顏明聖因五萬多張廢票落選後，顏太太在顏的號選助手楊金海陪同下到街上謝票，顏太太身穿白衣，上寫「冤枉」等字，站在她旁邊的是楊金海。

我是一名大陸留美學者，自來到美國後，有機會和台灣留學生、香港留學生以及海外僑胞們進行廣泛的接觸，也讀到不少香港、台灣的報刊雜誌，自己的眼界開闊了許多。彼此交談中，常涉及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等問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開展，更促進了我們對國共兩黨政策的思考和討論。對於大陸共產黨維持的政經體制的分析，我基本上同意『中國之春』的觀點，這裏不再重復。下面，我着重談談對台灣民主化的看法。

一、民主化方面，台灣領先大陸

我閱讀了不少台灣黨內外刊物，結合自己在大陸生活多年的體會，憑良心講，台灣在民主化方面是領先於大陸的。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導出這一結論：1. 在台灣，個人擁有的人身自由多於大陸。如遷居自由，尋找職業自由，留學自由，出國旅遊、探親自由等等。『美麗島』人員許信良、施明德胞弟施明雄等亦可獲得機會出國。但大陸魏京生、劉青的弟弟等，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批准他們出來的。2. 台灣言論自由尺度較大陸寬。如有不少黨外刊物。我見到就有『八十年代』、『亞洲人』、『深耕』、『新生代』、『縱橫』等，有些文章對國民黨政策的批評是相當激烈的。3. 選舉方面，台灣允許非黨人士與國民黨候選人在縣一級政權競選。而且據聞不少非黨人士擊敗了國民黨候選人而當上了縣長。此外，還有一些非黨人士競選上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尤其是一九七七年『美麗島』事件後，被捕的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張俊宏的太太許榮淑、黃信介的弟弟黃天賜等，都在一九八〇年中央民意代表補選

中，以高票當選為立法委員（姚嘉文、張俊宏、黃信介均為『美麗島』雜誌重要成員，『美麗島』事件中被捕）。在大陸，據我所知，民運人士被捕後，其家屬都會被看管得很嚴，就更談不上參加競選了。4. 立法委員可向政府方面提出尖銳的質詢，而且質詢結果報界均有報導。在我們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基本都是指定的，開會時，據說也有少數有良知的代表向中央問些問題，但均屬“絕密”。

有一點需要講明的是，台灣在民主方面之所以有這些進步，全賴人民的奮鬥與爭取，有不少“忠黨愛國”的台灣學生常向我鼓吹的這些“民主”，引為驕傲，並向大陸留學生誇耀。孰不知，這不是當權者恩賜的，而是向往民主的人士前赴後繼爭取得到的。當然，國民黨內的開明派也不無功勞，無論如何，沒有理由把這些“進步”統統記到台灣政府的功勞簿上。

二、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障礙之一——戒嚴法

我們講台灣在民主化方面優於大陸，是本着客觀的態度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承認台灣已經非常民主了。另一個事實也要承認，即：台灣距真正民主政體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台灣之民主要繼續推進，必須克服幾大障礙。第一個障礙就是軍事戒嚴法。

戒嚴法在台灣已實施卅四年。戒嚴法又稱軍事管制。在一個地區實行三十多年的戒嚴法，確是歷史上的罕事。

戒嚴法通常是在兩種特殊下施行的，一是瀕於內亂，必須用戒嚴維持秩序；二是面臨外侵威脅，用戒嚴保護臨戰狀態。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初期，面臨共產黨軍隊隨時攻佔台灣的威脅，在島內實施戒嚴，從道理上講是行得通的。而今，台灣全島政治經濟形勢安定，海峽對岸的共產黨政府又提倡和平統一祖國（雖然中共中央並未公開宣佈完全放棄武力解決統一問題，但眼下尚無解放軍大批調動而準備攻打台灣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仍然堅持戒嚴法是沒有道理的。

我聽到有些台灣人士說，他們在台灣生活了很多年，並未受到戒嚴法的什麼限制。而大陸的控制如同鐵幕，比真正的戒嚴還厲害。這



左：高雄事件中，軍事法庭的審檢人員
下右：八名被告的辯護律師
下左：旁聽席上的黨外人士家屬

些人士的結論是：台灣明義上有戒嚴法，但未實施之，故無戒嚴法之感；大陸上未實行戒嚴法，但實際上比戒嚴法還“戒嚴”。所以，他們進一步推論道，台灣是否宣佈取銷戒嚴法並非重要。言外之意，台灣當局無須取銷戒嚴法。

這種為當局開脫的論調有三點是站不住腳的。其一，既然像某些人所講的，台灣的戒嚴法“名存實亡”，那為什麼干脆不將這個惡名撇銷呢？其二，共產黨在大陸的極權統治，不能成為台灣國民黨在島內限制民主的借口。其三，戒嚴法實際上並未名存實亡，而正在發揮作用。舉例說明，台灣當局由於實施戒嚴令而發佈『戒嚴勸亂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當局一直用這個『出版物管制辦法』，不斷查扣民辦政論雜誌。自去年六月起，被查扣的雜誌達十多種，計有「政治家」、「博觀」、「八十年代」、「亞洲人」等。上月著名的「中華雜誌」亦遭到查禁一期的處分，這是該刊發行二百多期以來第一次遭到查扣。

那些在戒嚴法下生活、但未體會到戒嚴法存在的人，實際上是服服貼貼的順民，本來在政治上就沒多高的要求，難以代表整個民意。

時代已在不斷的變化。近來，海內外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的呼聲愈來愈大。連比較傾向台灣的丘宏達教授也呼籲取消戒嚴令。美國國會的肯尼迪、索拉茲、李奇等議員於五月份宣佈提出決議案，希望台灣繼續民主化的走向，解除戒嚴令。

在這種形勢下，能否順應時代要求，解除戒嚴令，將是對台灣國民黨政府是否有意推行民主的一項考驗。

三、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障礙之二——黨禁

三十多年來，台灣黨外力量有了相當的發展，這是促進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少人認為，台灣黨外力量已發展到可以組織新

黨的程度。可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法，一直未能開放黨禁，組織新黨問題儘限於空頭談論。

關於組織新黨問題，歷來都十分敏感。我想，如果政治家明白以下兩個基本道理，就能比較正確對待開放黨禁的問題了。

第一，政治上的反對派是永遠存在的。任何執政者都不是完人，更不是聖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所以，未必一貫正確。基於此，與執政者對立的反對派就必然會存在。執政者犯錯愈多，反對的人就愈多，反對派就愈強。中國歷來掌權的政治家有一個通病，就是不尊重反對派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因此，總是千方百計地去消滅反對派，認為把反對人士抓起來，關進牢房或處以死刑，就可以把持反對意見的消滅掉。實際上並非如此，抓起一個，就會激怒兩個；殺了一個，就會有十個站起來。共產黨抓了魏京生、王希哲，不又殺出了個『中國之春』嗎？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則是承認反對派的存並尊重反對派。他們不是用暴力消滅反對派，而是用合理的政綱和良好的政績去贏得人心，最大限度的縮小反對派。

第二，政治上的競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競爭才能導致經濟的發展，此道理已被多數執政者所接受。遺憾的是，這種原則一應用到政治上，很多執政的政治家就受不了。其實，執政者政績上的進步和發展，也有賴於競爭，這就是，執政的政治家與其反對派之間的競爭。政治上的反對派，對執政者是一個制衡和監督的力量。一個開明的執政者，應該從反對派的批評監督中汲取教益。公平地說，一個在位良久的受人民擁戴的執政者，都應該感謝反對派。如果執政者競爭不過反對派，則說明他做得不好，應由更受人民擁護的反對派政治家執掌政權。

我們把兩條原理運用到台灣，是想說明：反對派——黨外勢力永遠存在；組織新黨只是一種組織形式。今天不能組黨，但客觀存在的力量總有一天要組織成型，這是歷史必然。反對派只有以政黨形式嚴密組織起來，才能有效地起到政治競爭作用。開放黨禁是早晚的事，與其遲些開放，不如早些開放。

新黨組成，並和執政黨公開競選政權，將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大突破。我們盼望着這一天遲早到來。

做為大陸學者，我們希望台灣海峽兩岸政府在開言禁，開黨禁，釋放政治犯方面來一個全面的競賽，看誰的民主化進程快一些，以此推動祖國的統一。（完）

「中國大陸已經建立了比較牢固的國有工業體制」（該文作者的話），而且實施了「計劃經濟」，但是，從生產力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或者從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等方面看來，中國社會同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構想與原則相距很遠。所以中國社會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

這個過渡社會包含了很多矛盾，產生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不足。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不足，消費品非常短缺，因此消費品的分配問題，就成為過渡社會的一個中心問題。在目前的情況下，消費品的分配需要經過市場的交換，即買與賣。勞動力需要用貨幣去償付。因此商品、貨幣、市場等等本來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玩意兒，還在過渡社會頑強地殘存。它們的影響力如此的大，竟使該文作者主張以「市場經濟」來代替「計劃經濟」。

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的人們都應該知道，「市場經濟」是與「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市場經濟」是根據商品生產的法則（即需求的流動性、超額利潤的追求及競爭），來分配以及再分配經濟資源。正如該文作者所說的，「市場經濟」是要「充分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則是根據經濟的計劃者安排的優先次序，來分配與再分配經濟資源。

在這兩個根本不同的經濟動力之間可以有無數技術上的借用：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會運用計劃的技巧來「調節」過於狂烈的市場波動；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來更快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但是從長遠方向來看，這兩個經濟動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所有上述的技術上的借用，都不能防止這兩個經濟動力之間的本質上的矛盾。最能顯示這兩個經濟動力之間的矛盾就在於大型的投資上。根據市場經濟的邏輯，投資要按照價值規律而趨向於利潤高的部門；根據計劃經濟的邏輯，投資者就會按照計劃者的優先次序，而不會按照盲目的市場及利潤的規則。兩者的經濟活動的形式也不同：市場經濟是週期性的上下波動，計劃經濟則是直線條式的。（雖然發展的速度並不一定是一均一的）。

該文作者提出三個理由來說明中國經濟制度的方向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現在要分析一下這三個理由是否正當。

第一個理由是：「當今世界生產力發展階段，仍未超越商品生產，無論現代化的西方，還是共產主義的蘇聯東歐，都看不到商品生產趨於過時的跡象。……而商品生產，只有在市

還是計劃經濟好

兆立

《中國之春》總第二期發表了一篇以「對中國之春的幾點意見」為題目的國內來稿。其中一點意見，談到中國民運希望建立什麼樣的經濟制度。該文作者的意見，是希望中國的經濟制度成為「一種能夠充分運用價值規律的，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對這個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本着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原則，我想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我想談談中國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中共的理論家說，中國已是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雖然



場型經濟中才能充份得到發展」。

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商品生產為主，但是這個商品生產有沒有「過時」？就得看我們從那一個角度來觀察。從表面上看來，西方社會的商品真是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地來看，就會發現這些商品常常多到賣不出去。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經常地發生週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個生產過剩的危機一來，工廠就要關閉，失業人數劇增。目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自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就加拿大而論，失業人數已達到一百九十萬，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是「過時」了。

至於「共產主義」的蘇聯及東歐，只有消費品才是商品。商品的殘存，只表示生產力發展不足，消費品還要靠市場來分配而已，消費品的總生產量還是按照計劃而定。所以，過渡社會（蘇聯及東歐與中國一樣，都是過渡社會）的一個矛盾，就是社會化的計劃生產方式與殘存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中，才會逐漸地消失。我們不能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一夜之間「廢除」商品。我們也不能因商品的殘存，而主張倒回「市場經濟」去。

該文作者主張「市場經濟」的第二個理由是：「迄今為止，所有計劃經濟國家，弊端百出，效率低下，浪費驚人，皆因市場機制不完備，但仍不得不搞商品生產這一種自我矛盾狀態所致。」

這個理由也是不成立的。「迄今為止，所有計劃經濟國家」之「弊端百出，效率低下，

浪費驚人」的主要原因是官僚特權階層的獨霸國家與經濟的管理權，並不是「市場機制的不完備」。因為官僚層特別感興趣的是，保持及擴大他們自己的消費的特權，所以他們的措施，常常與經濟計劃的需要對立，使經濟不能達到最大的發展。

第三個理由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和民主制水火不相容，它只能和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互為因果。」

這個理由也不能證明我們需要以「市場經濟」來代替「計劃經濟」。我們只能說由官僚特權階層所控制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不能使經濟有高效率的發展。但是，除了由上而下的強加於群眾的官僚方法以外，人們有沒有想到另一條由下而上的「由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呢？該文作者曾提出在「企業內部，實行工人委員會的民主管理，但他們有沒有想到在整個工業部門及在整個國家實行工人委員會的民主管理呢？在這個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是不是比「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或者「市場經濟」優越呢？

該文作者選用了二套形容詞來描述他們所提出的「市場經濟」：一個是「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另一個是「在國家指導下的，而非無政府狀態」的市場經濟。

其實，只要是「市場經濟」，不管當政者加上怎樣的限制，價值規律的邏輯一定會把經濟引導到相反的道路上去。譬如該文作者在提出「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時，主張「各企業互相競爭以提高利潤」。如果各企業的生產目的，是要通過市場的競爭來提高利潤，那末投資的決定，就不會按照社會的需要，而會按照利潤的多寡了。這樣下去，生產過剩與失業的現象不是又會發生了嗎？這那裏是「社會主義」呢？至於該文作者所提的「在國家指導下的，而非無政府狀態」的「市場經濟」，事實上，不管「市場經濟」是如何「在國家的指導下」，只要計劃對企業沒有強制性，而只讓企業靠市場的競爭來作出投資的決定，這一定會產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

所以中國的經濟問題的解決，不是在於以「市場經濟」來代替「計劃經濟」，而是在於怎樣去改進「計劃經濟」。

由上而下的由官僚特權階層所控制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只能加深過渡社會的矛盾，所以必須被代之以由下而上的由工人所監督和管理的民主的計劃經濟。■

為私有制平反

士 心（波士頓）



什麼叫「私有制」？

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說，生產資料為私人佔有的形式，叫「私有制」。根據中國大陸出版的辭海說，「因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使每一家庭可能成為獨立的生產單位，才引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生。」從這裏，看不出「私有制」有什麼罪惡，足以使馬克思主義者把它消滅，以「公有制」來取代。

馬克思之所以把「私有制」當罪惡，乃認為「私有制」是一切剝削階級存在的根源，利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條件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價值。這個剝削關係，是用制度即私有制的形式，保證剝削者對被剝削者的剝削合法化。

馬克思認為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消滅剝削，使社會的生產性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加以解決。把生產資料變為全民所有，這不但使剝削失去剝削的物質條件，用以消滅剝削，而且可以把生產資料作為有計劃的生產和合理支配，克服了私有制下各自為政地進行盲目生產，從而實現計劃經濟中的計劃生產與計劃分配，克服了經濟危機的產生，解決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準備登共產主義的天堂。

馬克思為了證明他這個看法的正確，把原始社會描述得很美妙，又把「私有制」描述得很醜惡。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發展史中說原始共產主義雖然生產力很不發達，但原始社會人

類的生活，是「共同生產共同分配」的，十分「民主」；是「生產資料為公共所有制」，所以不存在剝削關係。這就是原始社會的「公有制」。至於「私有制」的醜惡，主要說是「私有制」是保證侵犯勞動者創造的果實的合法化。

我不能同意上述這兩點的說法。

先說原始社會人類的生活。他們是共同生產，但不是共同分配。他們不共同生產，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非常簡單的條件下，是有生命危險的，也無法單獨進行生產。但是原始人還帶著很大程度上動物界的野蠻性，不可能有「文明」到「共同分配」。他們還是下意識地對勞動果實進行你爭我奪，強者多佔，弱者少佔。平均分配可能出現於原始社會崩潰，生產力較為發展的，過渡到奴隸社會時期的一種偶然的事。而平均分配，也只能是一種相對於以後歷史階段中的落後的平均主義思想的起源。從這意義說，今天我們沒有什麼值得模仿而引起歌頌。而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大家也認為是由於生產力太低不能提供剩餘產品為個人所占有，有的只是簡單的打獵工具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那時候，掌管簡單生產資料的人，如果他們自己不去加入共同生產的話，生產果實就不夠分配。所以，不可能造成占有公共生產資料的人去剝削別人的勞動力，像這種生產

力落後的「公有制」，才有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一旦有了剩餘生產品，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因而這種「公有制」就崩潰，轉入奴隸社會了。

馬克思設想，在生產力發達的今天，剩餘產品已較豐富，一人勞動足以養活多人，於是應實行「公有制」。馬克思將當今社會的一切醜惡現象歸結於「私有制」。為了推翻「私有制」，應發動無產階級起來革命。

現在談談關於「私有制」是否醜惡的問題。

「私有制」是怎樣產生的呢？我不承認產生於「爲了侵吞勞動者所創造的果實」，故不能承認「私有制」是一切剝削者賴以剝削的根源。剛剛相反，「私有制」是起源於「保護勞動者所創造的果實不容受到侵犯」。前者是歪曲「私有制」的實質，後者才是「私有制」的實質。

我認爲，剩餘生產品的出現與發展，是提供「私有制」的物質條件，而不是「私有制」的本身。本文一開始引出辭海對「私有制」的解釋，也是一致的。其次，人的思想也隨著生產力發展而發展。有了剩餘生產品才有爲爭奪這些剩餘生產品的糾紛。在糾紛中，人類思想開始有「什麼應該是我的」和「什麼應該是你的」的問題存在。這反映了人類在生產上和思想上的很大進步。有了糾紛，遂漸形成第三者的代表社會公共意志的、排解這種糾紛的力量，並且按照由人們得出的評判公理來終止這些糾紛，這公理是第一次意識到保障勞動者由自己創造的勞動果實不容侵犯。這才是「私有制」的實質。「辭海」說：「因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使每一家庭有可能成爲獨立的生產單位，引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生」。也是說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原始社會的集體觀念向個體的私有觀念進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私有觀念，並非是必然發生侵犯他人勞動成果的原因，更不是「私有制」的本身。「私有制」本身的實質，剛剛是反對剝削的。是維護個人勞動成果不容侵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的也是反對個人勞動成果受到侵犯，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應該大喊「私有制」萬歲！我們如果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話，就不應該把原始社會那種落後的「公有制」和「集體觀念」有所留戀，企圖機械地灌以主觀的新的內容來恢復這個舊的形式，而應歌頌新的歷史進程。私有觀念不是主要促使「侵犯」或「剝削」觀念與行爲的因素。由於人類直至今天還沒有超出社會

的掠奪階段，還沒有完全脫離動物界而成爲一個真正純粹的人，這才是產生「侵犯」與「剝削」的主因，缺乏充分的生活資料的物質條件這個歷史責任，不能推給「私有制」。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私有制」的好處。人類有了這個私有的觀念，是從「私有制」能夠保護個人財產不容侵犯而產生的。如果私有財產得不到保障，誰又去爲個人積極創造財富而努力呢？沒有個人積極創造財富，社會財富從何而來？「大鍋飯」爲何會造成生產積極不起來呢？爲什麼在「私有制」的社會中，儘管存在剝削，但仍容許人們追求個人的享受與生存，而積極創造財富，結果客觀上也爲社會創造了財富，促進了社會生產。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客觀上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動力。這又有什麼不好的呢？

人們世世代代要求的，就是這個「個人勞動果實不容侵犯」的反剝削精神，亦即「私有制」的精神實質。爲了得到這一要求，產生了全世界歷代人類的流血革命。這不是事實嗎？因此，誰也有權利大聲疾呼「要爲私有制平反」！

怎樣爲私有制平反呢？

請讓我引出被馬克思主義者稱爲資產階級通俗經濟學家穆勒先生的一段話，作爲爲私有制平反的呼籲吧：

「一切爲私有財產權所作出的辯護，都是假定它的意義是：保證各個人都可以享有勞動和節欲的果實。對各個人自己沒有作出任何功績或努力而得到的別人的勞動和節欲的果實作保證，並不是私有財產制度的實質，而只是一種偶然的後果；這種後果，當它達到了某種高度時，就不會促進那些使私有財產制度成爲合理的目的，而只會和這些目的發生衝突。要去判斷私有財產制的最後命運，我們必須假定，一切使該制度發生違反報酬和努力能成比例的公平原則的事情，都已糾正過來；爲私有財產制所作的一切站得住的辯護，都假定它是以上述原則爲根據的。」

爲了避免發生誤解，還得多說兩句：

我爲「私有制」提出的「平反」呼籲，要知道，「私有制」不等於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封建社會制度」和「奴隸社會制度」。這些制度正是違反「私有制」所規定的原則，請勿混爲一談。這當然包括今天不是公有制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社會在內。■



興
王希哲
蔣經國

流螢(舊金山)

蔣氏與王氏，一個是台府首腦，一個是大陸書生，兩個人非親非故，向無瓜葛。但近來却由於共產黨的新政策而產生了一種無形的關係。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繼葉劍英先生提出和平統一台灣之九點方案後，廖承志先生更進一步對蔣氏執起兄弟大禮。喻理在前，曉情在後，懇望能與台府諸公握手言歡，共商建國大計。果如是，國家幸甚，百姓幸甚。

可是在此之前，却在大陸重興文字獄，以「反革命」等罪名，把王氏之類的人士關入牢籠，以箝其口，結其舌。

內戰期間，國共兵戎相見，各自死傷不計其數。而王氏之類的書生，手無寸鐵（至少未見法庭出示其「以武犯禁」的證據），無非是把個人思想形諸文字，公諸於衆。欲在思想上「緊跟黨中央」「步調一致」的輿論界外，唱幾曲反調而矣。

筆者不禁自問：何以昔日仇者今忽敬之，昔日親者今反囚之（這類人士絕大多數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立過「緊跟毛主席、緊跟共產黨，永遠鬧革命」的重誓，故曰昔日親者）。

百思之後，似有初解，拋磚引玉，以求教正。

台灣政要，乃今日之實力人物，北京政府欲與師問罪逾三十載未奏其功，久擒不下，故縱之。

王氏之流，乃書生造反。囚之不費吹灰之力，一則可以使耳目清靜，二則可收殺雞儆猴之效，為後來「胡思亂寫」者戒。以成全「十億人民十億兵」，個人行動聽號令的「安定團結」的中興大局。

前者強，力未能勝，故禮賢之；後者弱，囚亦何妨，故嚴懲之。強者王，弱者懲，遠者交（台灣政要幸賴有海峽阻隔之「地利」方得

「相逢一笑」的「人和」。否則，只有天曉得了）近者攻。此權謀術數，歷史悠久，北京政府無非推陳出新，古為今用而已。

然而筆者却認為，中國共產黨既已「掌握了科學的馬列主義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對「誤入迷途」的幾個黃口儒子，何不「容，然見君子」，讓其自由發表他們的見解。君不見他們所探討的問題，在國外早已有汗牛充棟的著作探討過了，探來討去，各國最後還不是——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了嗎？多幾個中國土生土長的黃口儒子參加探討，真理不亦愈辯愈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亦能在討論中發展到更高階段了嗎？

可惜如今竟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王者之道，襲「百家爭鳴，一棍打殺」的霸者之道。那些個「莫須有，何患無」的「反革命」「里通外國」罪名，豈能不令海外赤子齒冷台府兄弟心寒？

這種崇尚權術，無視法理的做法，實為中國統一大業的障礙。

當今世界，信息傳播事業發達之致，牽一發可動全身。醉心於以強力制造那種「全體通過」「一致擁護」的表面文章，對國家，對政府，對主義的「崇高威望」只有損無增。

事實上，在一切教理之爭中，不論你手上是否「握有」真理，也不論你的政敵是對是錯，當你在法庭上把思想異己分子量刑定罪時，你亦被歷史定了罪。蘇聯政府囚索爾忍尼欣，徒然自找晦氣。台灣政府囚雷震，亦遭天下有識之士恥笑。曹操昔年手握百萬雄兵，尚懼青史遺臭，不願親殺當眾擊鼓辱罵自己的彌衡。

計利莫計一時利，求名當求其實名。吾願共產黨內有識之士能明白：思想犯一日不放，兄弟禮一日難成。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五日

簡介 | 政治空間 | 史 均



本篇想介紹一下韓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限於短文的形式，詳細的介紹是說不上的，只是想借此來使讀者熟悉一下「政治活動空間」這一個概念。

已經故世的韓娜·阿倫特曾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以及「論人之條件」（On Human Condition）等書，全部的著作固不限於此，上列乃其重要者，尤其是前者，可以說是奠定其學術地位之巨著。

作為歐陸的猶太人而最後在美國定居，阿倫特曾身處希特拉與史大林叱咤風雲的時代，對極權機器，尤感切膚之痛。在遷居到了新大陸之後，自然會對其所謂自由空氣倍感親切。於是，在其思想中，就對「政治空間」（political space，筆者譯成「政治活動空間」，以便於中國讀者理解）之有否，特別執著。

乍看之下，阿倫特的思想似乎無甚新意，因為她的基本價值仍然是十八世紀式的自由主義，亦即是主張必須要有議會那樣的直接政治活動的場所，並將之絕對化，認為只要有就總比沒有好，根本不理解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為那一個階級服務？」、「建築在那一個『生產方式』之上？」一類的問題。

更有甚者，在廿世紀這個群眾革命的時代，阿倫特甚至反其道而行，提出了這樣「反動透頂」的命題：只要能容許有這種政治活動空間的出現，即使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之上也無妨。她甚至還說：像古希臘雅典的那種直接的民主政治活動，正必需要廣泛的奴隸墊底，才能讓一批公民從事直接的政治活動。

到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起來抗蘇，妄圖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之時，阿倫特又起來高聲歡呼。

光從這幾方面看，阿倫特之可以坐實為「反動派之代言人」，「帝國主義垂死之狂吠」，似乎毫無疑問了！

然而，她的思想演繹到後來，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使人不能作出前面那種論斷，但同時又不能說她的思想起了變化，因為，她執著的仍然是她的那一個「政治活動空間」的前題。

當六十年代美國的新左派青年運動蜂起時，她又對之加以無上的肯定，並且認為這是美國民主的將來。從這裏出發，她從各種歷史場合中抽出人能夠直接參予政治活動的樣本，作為人類未來的理想制度模型，而這些場合却是：法國大革命早期雅各賓黨人還未執政以前的那一段國民大會的民主，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初期的「工農兵蘇維埃」，匈牙利抗蘇時的基層民主，以及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直接政治行動。

上面這些歷史場合彼此之間是相當不協調的，由別的標準出發，是搞不到一處去的。然而，阿倫特用的却仍然是她執著的那個「政治活動空間」的標準。的確，上述的歷史場合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人能夠直接參予政治行動。

顯然，阿倫特的「政治活動空間」是一個理念型的抽離。它本身就是一個終極的、絕對的目的，而不用理會這個政治行動是為那一種政治服務，事實上，幾乎等於是說：這個行動本身如果攙混了其他的政治目的，就會遭到變質的命運。阿倫特確曾這樣地說：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早期的純粹為了行動。解放了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一旦當雅各賓黨與布爾塞維克黨想執行「平均分配」這個社會理想，並且以剛為人民所獲得的政治行動自由去為這個社會目的服務後，這個行動空間就很快地沒有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阿倫特思想中的「烏托邦」因素與無政府主義傾向。事實上，無政府主義本身就是烏托邦的，它縱使能夠展現，也是曇花一現的，甚至可以說它的純粹性就寄寓在它的瞬間性之中。例如：西班牙內戰時期農村中的無政府主義基層民主，確實是做到了理想狀態，它讓每一個人都直接參予了政治活動，每一個人都具有高度覺醒的「政治掛帥」的意識，而且，都是自己直接行動的主人。然而，大家都對這個狀態的狂熱的投入，似乎是基於潛意識中的這種懣悟，那就是：這個「

反常」的現象必然是曇花一現的，就如同一個人在抽了大麻以後刺激而成的暫時的亢奮一般。事實上，只有在革命與戰爭時期，大家的日常生活都脫了軌，才會有出現這種場合的契機。在平時，大家都要生活，又有多少人能夠無時無刻地直接參予政治行動？

然而，阿倫特是一個政治理論者，並不是一個歷史學者。因此，在方法學上，她可以毋需像後者一般，注意及每一個歷史場合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前因後果，而將某一類狀況作理念型的抽離與孤立，從而突出其重要性。自然，從辯證唯物論的角度出發，可以指控這種做法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然而，認為只有一個角度才能「反映」真實，排斥了多方面的方法學上的假設，以及突出各種現象的重要性之可能性，才真正是「形而上學的」！

事實上，阿倫特「片面地」突出了「政治活動空間」這個概念，正足以引起原先不知它為何物者對它之注意。的確，世界上有太多的政治行動者，一心以為自己是為了人的自由與解放奮鬥的，但心底裏却是為了另一事物服務，例如「平均分配」之類。自然，「平均分配」也可以是一個政治目標，其崇高性不一定在「政治自由」之下，在某些歷史場合中甚至比後者還要迫切，但是將它永恆絕對化的話，也是可以排除了「政治自由」的。這一點，確實值得建國以後的中國人之深省，因為中國人素來不能掌握這個觀念。至於那些連「平均分配」也不懂，只是因為自己人格不能獨立而常需要「十億人」者，就更差了。■

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性 共 芝

在海外一片爭民主、爭自由的呼聲下，筆者想找個與這呼聲有關的小問題來談談。在哲學領域內「疏離性」實在不是個小題目。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這個問題被有意地或無意地忽視了。筆者在以下所淺談的有關內容，祇求在爭民主自由的行列內略起點作用。

馬克思對「疏離性」的解釋始見於一八四四年所撰的「經濟與哲學手稿」。「疏離性」這個名詞也不是馬克思首創的。在基督教歷史裏，早有人認為神與人之間存在「疏離性」。到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時期，由於機械作業代替了原始的手工業，農村式的生活方式被破壞了。人們受工業化的影響，失

去了自然精神。於是有人便認為，工業化使人疏離了大自然，甚至使人疏離了他的家庭，朋友及自我。

馬克思受這套倫理化的自然主義影響很大不單如此，他在手稿中更把這些思想演譯一番。他認為工業化並非像浪漫主義者所說的那般罪惡。相反，工業化能帶給人類物質上的滿足，從而驅除無知與疾病。馬克思認為，祇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把僱員與產品視作同樣的謀利工具。僱主和僱員之間總是錢字當頭，因而錢是「疏離性」的突出表徵。

馬克思提出解除這「疏離性」的「良方」——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是否定私有財產，認為私有財產會使人與他的自我意志產生疏離感。而共產主義可以使人回到人性的自然面目。馬克思在手稿中肯定的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已發展的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同時，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已發展的人文主義——自然主義。

到了一八四六年，馬克思推翻了他在手稿中所表達的思想，開始批評倫理的社會主義者。他認為人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元素；把愛與友情解釋為「階級鬥爭」。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強調了「階級鬥爭」、「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等重要思想。他同時嘲笑那些倫理的社會主義者所談的自然主義為烏托邦主義。馬克思到此時似乎完全否定了他在手稿中所解釋的「疏離性」、「自然主義」。此後他所談的思想內容，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一套了。

因為馬克思很不重視他早期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們也忽視他在手稿中提出的「疏離性」。倒是近年來，在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某些倡導自然主義，以爭取民主、自由、反獨裁統治的人們，大談馬克思在手稿中所寫的倫理化的自然主義思想。以作為他們鬥爭的依據及掩護。

無可否認，在金錢掛帥，物質利誘的資本主義國土內，到處存在「疏離性」問題。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內不是也同樣存在嗎？最近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中，不少人竟在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政治庇護。在大陸也有不少「無產階級的元素」，千方百計地藉著「海外關係」申請出國。他們對社會主義也產生了「疏離感」。四個現代化在搖搖擺擺、左右不定。無產階級是否發現他們本身與目標之間也產生了「疏離性」？正如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到的，失去了人的自然面，失去了人的自覺性。這些都是引人深省的問題。■



幻影 5 · 16



鮑
不
平

我是一個大陸公費留學生。我與我的朋友們暗中百分之一百地贊同和支持你們的正義舉動。但是，考慮到將來回國的安全和避免諸多麻煩，雖然我們身處自由世界，也被迫地自己剝奪了自己的自由，更要違心地表態百分之一百地反對中國之春。這也是我只能以筆名寫信給你們的原因。然而請相信，我所寫的全是真情實意。

今天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文化大革命中所謂北京「五大領袖」，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與北航的韓愛晶分別被判處十年或十五年徒刑。這條新聞在國外不會引起多大注意。本人今天也不是為他們叫冤，免被認為支持十年浩劫，而是從這段新聞中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和痛感中國大陸缺乏民主與法治。因而更從內心裏支持你們的民主運動。

提起冤假錯案，人們就會想起五七年的「反右」，與文革中的「清隊」。往往忽視了由「紅太陽」掛帥，「副統帥」領導，周總理親自指揮的全國大抓特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首戰告捷，抓到了幾十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從南京到北京，從北京到武漢、西安、廣州、哈爾濱……；從軍隊到地方，成千上萬的軍民被關進私設的牢房——學習班。有「走讀生」有「住讀生」、有「集體的」、也有「單獨的」。有些頑固的「五一六分子」經大會鬥、小會壓、七

批八鬥，終於低頭認罪、坦白交待，有些畏罪自殺。所有審查的材料都表明，這個陰謀集團有頭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林副統帥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個轟轟烈烈的清查運動持續了兩年之久。清查的重點是紅衛兵與造反派。當然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全是「五一六」的骨幹分子。全市開了批鬥大會當眾逮捕法辦（之前早已進入「學習班」喪失了自由）。陳伯達失寵之後，中共黨內傳達了陳伯達是「五一六」的靠山；林彪事件之後又傳達了林彪是「五一六」的後台。自林彪事件後，全國有一股「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翻案風。那些原認罪服罪，坦白交待「五一六」分子又次坦白交待，我不是五一六分子，我檢舉揭發×××是被迫招供的，是被拳頭打出來的供詞。偉大領袖竟也俯察民意，就寬洪大量、高抬貴手，發佈了中央文件。批評有些地方，有些大學把百分之四十的師生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打擊面寬了一些，搞錯了的要在適當範圍內平反把材料交還本人。

按當時的文件祇是「面寬」了一些，就是說「五一六」是存在的，清查運動是對的。

鄧小平復出後提出「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意欲實事求是地解決歷次冤案。在「三中全會」上、在陳雲的鼓動下開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首先為五七年的

「反右」受害者平反。六〇年的「反右傾」、六八年的「清除」也相繼平反。唯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被排除在「檢驗」之外，不予平反。人們私下發牢騷說：「鄧青天」的平反是有方向性的。逆我者亡，管它冤案不冤案。

清查「五一六」運動，完全是毛澤東與林彪的政治陽謀。抓「五一六」的重點是文革初期被他們利用的紅衛兵與造反派。毛澤東把天真的青年們當作一塊一塊石頭投向他的政敵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擊倒「目標」的石頭反過來成爲毛林道路上的「絆腳石」。經過「造反」，青年知識分子從盲從——思考——覺醒，他們識破了毛林的陽謀，要起來向造封建專制造反。一九六八年毛林派軍隊與工人佔領大專院校，從組織上保證了對知識分子的鎮壓。毛林仍感到不安全，繼則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清查「五一六」運動。用「無產階級的鐵拳頭」，以威脅和清除由於被他們利用而誘發出的「叛逆性」與「叛逆者」。這是毛澤東慣用的各個擊破的高明手段。這個「五一六陰謀集團」是紅太陽的「陽謀傑作」。

鄧小平、胡耀邦等明明知道幻影「五一六」是地地道道的冤案。所有的表格、誓詞、揭發認罪，全是專案組的傑作。他們是誘供、指供、逼供的專家。鄧小平自己也是內行人，深知其中虛假。但何以不予平反呢？那是因爲這一批人喊過、罵過「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今天鄧大人心中的怨氣還沒消。對舊的「冤家」是決不饒恕的，當然要判劊大富等人十年以上徒刑。把十年浩劫歸罪到當時只有十幾歲、廿多歲的娃娃頭上，以他們作替罪羊難道就能

維護「偉大領袖」的光輝嗎？就能維護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形象嗎？

「五大領袖」自一九六八年一直被禁監，至今已十五年。他們在毛澤東的鼓動下「造反」一年多，却被毛澤東關押了十倍於他們「造反」的時間。現在的鄧小平再宣判十五年徒刑，這太不合理，也不合法，此外還對衆多的紅衛兵骨幹規定幾不准：如不准提拔、不准出國、……。

我必須再說明一下，本人一點也不支持聶元梓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爲（儘管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支持並贊美，聶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只是同情他們被人教唆而被人利用。也使我痛苦地感到在中國大陸至今仍沒有民主法治。

本人是公費留學生，剛剛來到國外，知道現在的當權者把中國之春，特別是王炳章博士等民運成員列爲現行反革命分子名單中。在公費留學生中，大使館也在秘密偵察，普遍「過濾」。國內則更爲注意。但願鄧小平先生萬萬不要再導演一場抓中國之春的新冤案。雖然不同於「幻象的五一六」，中國之春的確是存在的。

致以

敬禮

中國公費留學生

鮑布萍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美國紐約

春 紅

卜友書

書兩什懸壁自昴，並奉贈中國之春雜誌各方家。

1 新生

（調寄《烏夜啼》）

林蒼現了春紅
又匆匆
長在淒風苦雨
黑暗中

開言禁
莫專政
理性崇
自此中國解放
捲長風

2 堅韌

（五／四兩韻）

春花不算花
至夏方可誇
秋紅多榮耀
冬天，不怕它：

冬深春不遠
寒盡日漸暖
請看雪溶處
春紅又數點

1983/5/21

（美國德納威州 都城多味）

來信 摘編



謊話多說幾遍就成了真話

各位老編：

今天同時收到兩封你們的來信，感謝我對「中國之春」的關心鼓勵。說來慚愧，我只是見世界日報對中國之春的報導有感而給你們去了兩封信。沒想到竟收到你們如此鄭重的覆信。在覆函中沒見到一個缺了胳膊，斷了腿的中文，倒是讓我感到驚奇。

關於有的報紙說你們是住「希爾頓」，也到過台灣和國民黨有接觸。這也是他們的言論自由哪！反正謊話多說幾遍就成了真話，誰有閒空去求證它。

中國之春工作人員有着當年孫中山先生的抱負，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當年滿清帝國雖然腐敗，但是老百姓尚是自由的；如今中共雖不是帝國，但老百姓是不自由的。如今改革想必比當年國父要更辛苦。當年國父在世界各地都有會員。有財力，人力，物力的支援（包括老外），也還經過了十次的起義才成功。中國之春的運動是否能在大陸上也嚐試十次的失敗經驗呢？

中國之春要加强與各方面的聯絡，在做法和宣傳上都可以互相討論研究，有些可私下聯繫。只要是正義的事情，用手段去爭取並沒有錯，也不可恥。

祝大家

成功愉快

美國加州 王慧

四月廿日

「告海內外同胞書」評注

中國之春編輯部諸君大鑒：

和你們一樣，我也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九六四年我與我的同伴懷着為祖國獻生的理想去農村去。六八年前後我和我的同伴們都感到失望，以至絕望，有的人甚至自殺了。那時我們稱為「精神崩潰」，現在稱為「信仰危機」。看不到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前途所在。我十分悲痛地感到我們非但無法以自己的智力，體力去增進農村的文明與富裕，反而淪落為與廣大貧苦農民爭食的多餘者。毛澤東的「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我不但不領情，反而覺得人格大受侮辱——為什麼我們這些人類子孫連謀生的本事都喪失了，反而要靠國家接濟才能生存呢？！我們痛苦地感到我們被人誤導了，被人欺騙了。我們重新檢討學校給我們的思想，探求走向真理的途徑。

對於「四五」論壇，民刊雜誌，在四川時我就看到。同意他們的理想，但不相信在專制政體下會有實際成效，故未曾參與，並勸告友人不要參與。如今我們在海外寫寫說說未嘗不可。至少不會跟魏京生一樣被抓去坐監。我不怕坐監，但不喜歡坐監，更不希望自己或者朋友為譚嗣同式的英雄好漢。

拜讀中國之春編輯部「告海內外同胞書」一文有感，乞諸君教正：

第四段文中：「『三信』危機，空前嚴重」。這八個字好像也是大陸的災難了。我則認為「三信」危機正是民族命運轉機之希望所在。是件好事。

第六段文末：「但其加工出口型經濟仍存在着種種問題。」這是一句廢話。世界上無「沒有種種問題」的完美經濟典型。

第八段中「香港同胞，人心思歸」頗有中共的「黨八股」、「幫八股」之氣味。諸君有何民意調查資料顯示香港同胞人心思歸？愛祖國不等於愛中共統治。如此行文，該打屁股。

第十段文中：「要徹底解決中國的苦難只有……」

「徹底」二字我看是永遠辦不到的。民主的進程即是現代化的進程。兩者必然是同時並進的。你們的文章缺乏「逐步」二字。要麼就「徹底」，要麼就「實行」。天下事那有那麼方便。

第十二段中：「繼承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光榮傳統」。不如改為「繼承中華民族爭取自

由民主平等的光榮傳統」範圍大一些。從辛亥革命起值得繼承的就不少了，原文似有宗派氣。

最後再進一言。王炳章博士答記者問時說：「中國之春不接受任何政府、政黨的經濟援助，僅接受民間團體組織的支持，難道政黨不可以是民間團體嗎？似有概念錯誤。我認為應該反過來，公開宣佈接受政府、政黨、團體、個人的人力物力支持，但不得附加任何先決條件。如果霍梅尼願捐錢支持中國民運，以伊朗政府名義，試問有何理由拒絕？心中無賊念，何妨飲盜泉。

卽頌

編安

徐至宣

三月廿日凌晨
於香港



有客自大陸來

中國之春編輯部：

我是從瀋陽到日本的自費留學生。來日本已三年多了。最近我有機會訪問了由中國大陸到日本探親的同胞（大陸常有人到日本來）。他們向我反映了一些情況，使我感到憂慮。從他們反映的情況看，目前中共（鄧、胡、趙體制）統治下的祖國大陸，在政治上通過各級領導班子的更新，加強了中央集權獨裁統治。完全靠軍隊和警察來維持危機四伏的政權。秘密警察到處亂竄。對政見不同者明目張膽地大肆鎮壓。據悉，黑龍江省勞改局最近設立了可容七百個床位的「精神病院」。專為迫害思想犯而準備。很有些蘇聯KGB的味道。在經濟上他們繼續採取左右搖擺的「探索方式」。國營市場蕭條，自由市場混亂。賣鴿子與賣君子蘭花草的販子大發橫財。進行正常交易的群眾與投機倒把的奸商被官方一視同仁。

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各級重疊機構對農民層層盤剝。什麼「管理金」、「稅款」、「經費」多如牛毛。農民氣憤地歸納為「十八抽」。多數農民的生活仍然十分難熬。城市企業的「經濟承包」責任制也是五花八門。有的企業實行「承包」後，因產品過剩銷售不出去，只有半年生產，半年停工。搞得工人啼笑皆

非，怨聲載道。

鄧小平上台以後，全國幾次調整工資。據說，目前又為事業單位每人加一級。然而工資不如物價提得快，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擺花架子套取民心，到頭來還是百姓倒楣。這一切使我夜不能寐。想起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含辛茹苦的父老，樸實善良的人民，他們忍辱負重在期望中已等待了數十年，他們還能等多久？人的忍耐終究是有限度的呀！

我們生活在海外，被國內同胞視為「幸運的游子」。然而，客居異鄉總不像在母親的懷抱中那樣溫暖，那樣安祥。但我們却具備了有利的鬥爭條件。我們要充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為改造中國做些有益的貢獻。致以

同志的敬禮

中國留日學生：謙明
於日本橫濱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皇皇畫展」

不要與政府勢不兩立

親愛的戰士們：

首先向你們致敬，並對你們辛勞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欽佩。

我是一位自費留學生，今年才二十歲。在七八級同學中算是一個小弟弟了。我是學工程的。我是一個科學救國者。在所有的事業中我最崇拜的是科學，是人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因為我認為一個沒有科學頭腦的人是無法為人類作出更有用的貢獻。

青年人的血都是熱的。在大學裏由於我是個讀書迷，什麼樣的書都想翻一翻，也讀過一些民運刊物。我贊賞那些勇敢的批評者，革新者。實際上從那以後，我自己也逐漸變成一個

激進的批評者了，在私下和同學們為魏京生等鳴不平。

我的政治理論懂得不多。但什麼是自由民主，什麼是好，我是能辨別的。我希望瞭解你們。為了能使祖國早日擺脫貧困，我願盡我的微薄力量。這不是幫助，而是一個中國青年應盡的義務。

看了這一期的中國之春，我似乎覺得它有點偏右，不是指站在台灣國民黨的立場說話，而是指較多地強調了國家存在的問題和導致的惡果，缺乏一種熱忱的、建設性的氣質。也許你們認為我是「改良派」的思想，但我個人認為一個國家強盛是建立在 Improvement 上的，特別是現代社會。我相信現在的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是希望把國家搞好的。至於怎樣能搞好，則是個策略問題。難道不可能有一個某種含義上的統一戰綫嗎？可惜，由於國家法治的不完善，使這種可能性很小。我也承認我們國家法治不完善，特別是國家的根本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領導人，而人民沒有一點選擇的權利，使人深深擔憂。

但我們希望學政治學，學經濟學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不要做出與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妨放棄成見，消除隔閡，掏出自己的赤誠之心，匯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通過各種途徑轉給有關領導人，讓他們瞭解青年人是怎麼想的。一座建築需要不斷的維修甚至翻新，但在翻新之前，難道連維修也不要了嗎？大廈的倒塌，人民受害呀！

我希望你們能有一個正確的綱領。不是志在推翻一個政權，而在於如何改造這個政權。如何使全體人民認識到改造它的重要性，並一齊參與改造。其中包括大多數共產黨員和幹部，他們亦具愛國之心。

希望瞭解你們，並希望與你們一起做些有益的工作。學習緊張、時間有限，字迹潦草望原諒，順捐助 \$ 30 元以盡微薄之義務。

祝

順利

大陸留美留生 黃果益
四月二十五日



沙灘上的大廈

當今之世在北美洲黃金美鈔之地棄醫從運，王先生之精神值得欽佩。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而志士之少實為可嘆！

民主化實在是「四化」之本。中共現在的領導集團只圖在技術上「四化」抹殺基本的政治民主改革。這正如在沙灘上建造大廈。中共現在和繼起的貪污腐敗是不可收拾的。局勢的發展可能比波蘭更壞。

但願王先生能為民喉舌，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茲附上三百元支票。區區之捐款請用於中國之春的推展。

加拿大讀者 陳之榮

一九八三年三月

由它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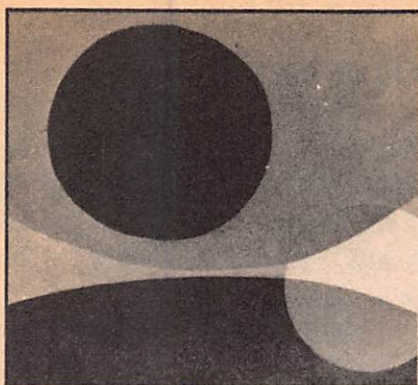
同志們好！對於中國之春有以下一些意見供參考。民運總部似應為一鬆散的聯盟。在一個大原則下（爭取中國民主進程）允許不同意見，甚至不同黨派存在。有新的組織誕生或派生出來，這不失為一件好事。作為民運總部的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應保持她的戰鬥性，純潔性和理論性，不要糾纏於一些瑣碎小事，避免流於一般市民雜誌的趨向。當然目前並無明顯跡象。但「對一些問題的澄清與回答」一文使我產生這種憂慮。飯後酒餘的市儈議論總是難免的，由它去罷，就旅館和信箱等問題的澄清也不必放在首要位置。就我聽到的反映來看，幾乎沒有人關心這些細節。但對中國之春的政治趨向，組織狀態和行動步驟却甚為關注。另外希望中國之春能更敏感地報導國內民運及政壇動向。

作為一個靠打工維持所有生計的大陸自費研究生，很能理解你們的困難處境。你們已經做了被人引以為驕傲，同代人引以為鞭策的歷史性的事。不要為目前存在的錯誤和缺點而感到絲毫的氣餒。真正的中國人都會看到你們一顆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致以

敬禮

中國留學生：陸華
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於北美



羣衆運動

中國之春諸位先生大鑒：

陸續讀了貴組織未來發展方針及計劃等消息，在下深深感到中國的希望湧現了，並於夢中爲貴組織歡呼，爲中國前途慶幸。

今天寫此信是向貴組織報個名，並提出如下建議供參考。因爲中國的前途——民主與統一——繫於中國之春的發展如何。而中國之春的發展如何則取決於其採取的策略。

中國之春的民主運動是一個羣衆運動，而羣衆運動必須不斷地吸引羣衆。發行雜誌鼓吹民主自由僅影響知識分子階層。對於廣大農工羣衆則必須具有堅實的組織及明確的目標，並把組織擴展到大陸與台灣，也爲祖國統一打個基礎。

在報上談到爭取國際支援是貴組織當前工作重點之一。在下認爲國際支援的有無並不在於是否盡力去爭取，而在於本身力量的大小。如果自身力量大到以引起國際的重視，支持自然而來；如果自身力量微不足道，就是叩破了頭也是枉然。

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如未來的工業化問題、人口、糧食問題與蘇俄日本關係等問題可分配給有關同志預作研究以免未來需要時措手不及。

現今大陸與台灣如此般對峙，能夠打開這個死結的只有第三者——中國之春。由此觀之，貴組織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的前途問題與貴組織息息相關，貴組織是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敬祝

中國之春日益壯大

台灣：黃宗霽 1983年4月12日

但願某個春天……

敬啓者：

想到您們就高興，我常覺得有許多話要向您們講。但想想也不必多說什麼。我認爲中國走向合理進步的道路又寬又平，並沒有多少真正困難。只要不自找麻煩。各國都歡迎中國走上好路，也有助於世界和諧。

全世界沒有人受這麼多指責。中共看來是可憐兮兮的，只怪自己不爭氣。三十多年來不幹正經事，以致如此貧困落後，讓人見笑。文革這種低級悲劇簡直莫名其妙。最可惡莫過於企圖使中國人由寬宏大度變爲偏狹歪邪。幸好中國人民並非那麼容易摧損。人性良知還是永恒的。

與朋友閒聊時常聽說將來要去黃河釣魚，長江游泳，長城漫步等。但願某個春天大家歡聚一堂。祈求上蒼佑我民族永恒安樂。

以病歷紙隨筆所寫請原諒。附美金一百元捐助貴刊。謝謝，順祝平安。

台北市民 李燕
一九八三年四月

請不必介意

中國之春的同志們：

自李一哲大字報，北京民主牆的出現，我曾狂歡過，認爲中國年輕一代覺醒了，中國有救了。因此我經常在周末以聚會形式集中旅居在荷蘭的、熱情關心中國的老同學與同事商討國事，組織文藝研究小組，引導大家聲援民運，爲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

魏京生的受害、民主牆被毀、取消四大、迫害民運戰士、封禁民刊，使我對中國統治者深痛惡絕。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後一代又犯了罪。使我悲觀失望。

現在這覺醒了的一代，以你們爲代表又樹起了報國救國的大旗。中華民族有救了。我現在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缺乏衝力。而且二十年前是你們紅衛兵的敵人呢！請不必介意，因爲這是共產黨有意分化中華民族，分化知識分子所犯下的罪過。現在爲了國家民族大家要團結向前看。

荷蘭：藍志國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



中國人的恥辱

來信收到。我將在六月份去香港，因為七月份我的太太與小孩將離開祖國到國外團聚。我去香港接他們。

我們為什麼到外國來呢？這實在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恥辱。在這裏我們沒有親人。我爸爸在台灣，我媽媽現居住在新加坡（她也是持多米尼加護照）。我們既進不了新加坡，也進不了台灣。實在地講，對離開祖國我是很不樂意的。但是考慮到做兒子對家庭應承擔的責任，也考慮到為自己子女教育，所以就出來了。資金和人材的外流對我們中華民族損失多麼大呀！如果我們的祖國現在是富強的，統一的，何至於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了改變國籍，化了這麼大的代價，絕大多數來此辦理歸化手續者，僅僅為了一本護照。為什麼一本中國護照不如一本外國護照。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不痛心呢！來辦理歸化的大多數是身居香港、台灣的同胞，他們是由於懼共，害怕回歸與統一後被共產黨整，被鬥爭。所以及早留一後路，或是拿錢買了安全感。免得淪落為中南半島的難民。共產黨的形象已淪落到這個地步，中共的領袖們是該檢查一番了。

現在的大陸是共產黨的中國，台灣是國民黨的中國。應該還政於民，國家是人民的。

就我所知道的大陸農村情況，一個生產大隊就有八九個脫產幹部，浪費實在驚人。在公社裏共產黨是無所不專，無所不治。事無大小決定於黨委書記。以一人治衆人，一人治天下。瞎指揮，作威作福。幾十年來廣大農村仍然很貧窮，這就是他們的政績。由於農民數十年來消極怠工（這是中國人民的可憐的鬥爭方法）迫使中共作了些讓步，實現了包產到戶，使農民有了一點自主權，從政治角度來看，實質上是一場廣泛的民主運動。這正說明民主運動不僅適得其時，而且有廣大的人民基礎。

我們遠在國外不知如何為祖國的進步作些貢獻。強蠻不講理的霸者動輒抓、關、禁，真叫人有理無處講，有理無處求。

此致

編安

多米尼加：劉協騰

四月四日

很高興你們發表了主張

中國之春的朋友們：

在台灣你們的消息間斷性很大，因此對你們的情形雖很關心，但所知實在有限。不過我仍願在所知的範圍內，為你們提供一點意見，以後也將繼續這麼做。這是我對「民運」唯一能盡點力的地方，我不能眼看別人為國家奔波操勞，自己却坐享其成。

言歸正傳，日前「中國之春」社論所揭示的「中國之春」主張，內中有一條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這是目前各國所實施的，不過這是大綱，內中有一些缺失，目前各國都有了改進的措施，不知你們是否注意到。問題在有了政府，就必須有專家從政，這些人員一部份固可透過選舉產生，但更多的基層人員勢必要以考試選出，這時按三權分立制度及「考用合一」原則下，考試該由行政機關主辦，而這是否會造成「人情政治」？各機關任用與自己有私誼的朋友或親屬這種弊端是否會形成？

另一條「停止中央計劃經濟與經濟的控制」。在產業革命之前，社會生產供不應求，各國之間的貿易也不是十分繁盛，這時實施自由經濟本可促進經濟發展，有利一般人民，但現在經濟組織已變得複雜，各國貿易不但頻繁，且諸多涉及政治問題，經濟貿易也已成爲外交手段的一種。而有些經濟問題也非國家之力不能完成，例如「保護關稅」、金融股價的控制、市場利率的調整、政府公債的運用、國防事業的發展、人民民生必需品的供應無匱，這些都必須由政府經營，否則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獨佔者經營掌握，國外商品傾銷阻礙國內工業的發展，這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是很嚴重的。一句話，高度中央集權經濟制度，固然不好，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能力與貢獻。

此外「三權分立」制度，對於行政機關及人員的工作、人品考核，是由立法機關執行，但如此一來，國會一方面負責立法工作，一方面又兼監察權是否會造成「國會專制」？這確是個很大的問題。

很高興你們把各項主張一一發表出來，一來使那些惡意中傷的人來個「心裏認同」，二來使大家能確實了解你們究竟是否只是一個沒有理論基礎、觀念混淆不清的組織。

附上剪報一紙，寥做參考。

祝

好！

友程屏敬上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

一個外國友人的來信

CHINA SPRING

June 9th, 83

Dear friends

In order that Chinese people will lead a decent life with freedom, safety and democracy, you are holding up the Ideal Banner that in the past century numerous pioneers and martyrs had struggled and died for.

I admire your courage and spirit. Herein I enclosed \$100 as a tiny support to your great, difficult and righteous enterprise.

I hope I can see several words in your next issue indicating that I have used the right address.

Your friend
Bill Carrol

親愛的朋友們：

爲使中國人民獲得自由，安定和民主的公平生活，你們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幟，繼承着過去一個世紀來無數前輩和先烈爲之奮鬥犧牲而未盡的事業。

我欽佩你們的勇氣和精神。現寄上 100 元，做爲對你們偉大、艱巨和正義事業的微小支持。

您們的朋友 比爾·卡洛
1983.6.9 於加州

雨 水

獻給中國之春

燕 君



這赤色的天空，
黑雲撞着黑雲。

這灰色的中間，
狂風追着狂風。

這黑色的大地，
暴雨打着暴雨。

雨——水。
水——雨。
雨水啊！
你要幹什麼？

雨水
溪水
河水
海水——
水，拉着水
水，推着水
奔騰、翻滾、撞激——

水，
珠江
長江
黃河
黑龍江……

願你撞翻那江上的盜船
願你摧垮那攔路的礁石，
再和平地流去，
再奔向那綠的原野

脫稿於萊茵河畔
八三年六月一日



懷念林志毅君

蔡可風

去年十月，中國時報記者金垣煒君到紐約來，告訴了我們一個不幸的消息：前北斗月刊的主編林志毅君，四月在廣州市被拘留，至今下落不明……。

驀然聽到這個消息，我只是信疑參半。因為幾個月以前，我還收到過他的來信，談及他當時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由於我沒有保存信件的习惯，翻箱倒櫃也找不到他的原信，便無法找到他最後一封信的發信日期。每年寄來的聖誕卡却仍然保存着。以後，恐怕不能再收到他的聖誕卡了。

記得是一九七七年三月，我到達香港才幾個月。剛剛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雖然收入不豐，也足可維持生活了。不久，因胃部出血症住院。出院之後，倒也有幾天的休息時間，就搬到劉憲平家裡去談天。劉當時是一間製衣廠的裁縫，不慎割傷了手指而在家裡休息。兩個人正好高談闊論，也讓我享受到他家的照顧。

一天，劉憲平告訴我：今天有一位在新亞研究所附讀的學生，名叫林志毅，是“黃河”雜誌的成員，將會到訪。聽說他正在籌辦另一份雜誌呢。

說話間，林志毅就敲門而來了。他看來三

十歲剛出頭，中等身材，嘴巴老是笑嘻嘻的。沒等劉給我們介紹完，他就用力地跟我握手。當他知道我很愛好文學時，高興得大聲嚷道：又多一個人了！又多一個人了！

我這時才知道：劉和他認識很久了，劉也曾經為黃河雜誌辦事，林志毅是黃河的成員之一。後來，林志毅籌集了一些資金，由於觀點和黃河的分歧，決定另外辦一份雜誌。

當天，我們彼此交換了觀點，發覺我們三人和觀點都比較接近而跟黃河雜誌難以一致，都認為該另辦一份雜誌。但是，這杯水車薪的資金是不足以辦一份雜誌的。林志毅說：他將設法再籌，只要辦得成，人家會支持。如果只是談，誰也不肯掏腰包來給一群未知能否做事的人的。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就表示堅決支持他辦。但是，資金方面我是毫無辦法的。我們暫定：林志毅繼續籌集資金，並多寫文章，我和劉則盡力去聯繫多點人，加上自己盡可能多寫點文章作為創刊號之用。於是，雜誌的創刊就基本上算開了頭了。

這天晚上，我們談到八九點鐘。由於我是病後，精神已經不支，林志毅君就要把我送回到西洋菜街的寓所。以往，我是坐兩站車的。這晚，我却由他陪着步行。到感到不大舒服時，又坐在路旁公衆用的靠椅上歇一會兒。看來，他十分興奮，滔滔不絕地大談他的觀點；但是，這份雜誌連名字還沒有定下來呢？

好幾天，我們的工作都得不到預期的結果。當我們到一些寫過一些作品、在社會上反應不錯的朋友家裡請他們一起辦雜誌時，得到的是觀望的態度。有些人則提議說：至少要準備三期以上的作品，才好出版創刊號。更有一些人說：他們準備了三年，都未把雜誌辦成，我們幾個人才到達香港不久，想辦雜誌是太太幼稚了云云。

我們把得到的反應綜合分析：如果我們照這些人的觀點去做事，再過三年也不會有雜誌。我們深信，我們的觀點將會得到衆多的人——特別是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人的同情和支持。我們的雜誌有別於一般香港的雜誌，走的路也不能因循這條老路。只有把創刊號出版了，才能射出去的鳴鏑，誘發出萬箭齊發的局面。

本來，林志毅還聯繫了一位姓陳和姓彭的兩位先生，作為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後來，證實了這兩位先生是缺乏這方面質素而沒有再耽誤他們的時間。新亞研究所的岑小姐却加入了我們的編輯小組，翁文嫻後來成了雜誌中堅份子。

經過好幾次會議之後，我們把雜誌定名為『驚蟄』，並且，由我來撰寫創刊詞。但是，很快就在新亞研究所內得到意見：他們認為，『驚蟄』是中國的一個節令，在七古神奇的香港報攤，有的是談算命、皇歷之類的書籍和雜誌。『驚蟄』雖然有很好的意義，但會和這類書刊混淆起來的。他們建議我們採用『北斗』這名字。我們覺得有理，就給『北斗』雜誌定了名。隨後，他們還給我們送來了幾百個『北斗』的字樣。伍麗華小姐所寫的為林志毅極力推舉而作為創刊號的封面。

當時，林志毅仍舊是個學生，劉與我都得上班工作。只能抽業餘時間去雜『北斗』。到五月，是學生考試季節，看來林志毅只有“空槍上陣”去考試了。迫得劉憲平辭去了工作，把創刊號的主編工作承擔了下來。每個人都用幾個筆名去撰寫文章以壯大聲勢。到六月一日，創刊號終於誕生，而封面尚未議定，林志毅就因患腸出血進院留醫了。

林志毅這次病倒，完全是忙出來的，他在幾年前多次的偷渡過程中，遭遇到很多挫折：盤骨跌傷，尾髓骨跌碎了，大腸反復出血多次，這都嚴重摧殘了他的健康。這次大復發，使他元氣大傷。醫生不得不把他的大腸部份割去了七呎，才換回了他的生命。

當我們把將出版的『北斗』樣本送到他的病床時，他像忘記了剛動過的大手術似的，高興得連聲嚷道：別人說要準備三年才辦得到，我們只要三個月！

『北斗』月刊出版以後，果然不出所料，立刻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絕大部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青年的來信。不少人追問我們的編輯部地址，要來和我們詳談。後來，才知道我們的編輯部時而在某個編輯家裡，時而在新亞研究所的涼亭裏，時而在某間書店的閣樓裏呢。到第四期月刊出版之後，我們才在九華徑以廉價租賃一個小單位，結束了“流浪式編輯部”的生活。同時，稼永和鴻宇都加入了編輯小組。

爲了提高銷售量，劉憲平擔任了營業負責。而把主編的任務交還給林志毅。林志毅對於理財是不大稱職的，往往因其他工作忙而擠掉了管理賬目的時間，到『北斗』第七期出版，竟然增加到八十六頁而仍售每本港幣二元。嚴重的虧蝕使雜誌經濟入不敷支。週轉不靈，債主臨門導至『北斗』停刊時，還有數十篇文章已打好字，等待下一期的出版。

『北斗』停刊之後，林志毅又一次病倒；

之後，到香港的一個離島，名叫日光島休養，去過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生活。

一年多以後，林志毅及我都分別結了婚。恰巧，我們都在同一個月內辦理的。本來，他在大陸已有一妻三子女，後來，根據法例而作離婚處理了。他的再婚看來是有助於他的生活和健康的，再婚之後，沒有再生孩子。以至他於去年四月回廣州探望父母和子女時，被拘留而失去了自由。

離開『日光島』後，林志毅組織了『北斗學社』，當時，我已轉到一間承建地下鐵路的公司工作。工作十分繁重，無法抽身出來。他們把以前在『北斗』發表的小說，加上幾篇新作，蒐集而成一本小說集，名為『反修樓』。並請陳若曦代為作序。這次出書，完全是集資出版的。原意是任由虧蝕，也要發表。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本書獲得了白先勇、李歐梵諸君的推薦，並獲得了中國時報文學獎。一時間士氣大振，準備以後再出第二本小說集。筆者也給他寄了些近作，孰料林志毅却失去了警惕，跑回大陸去自投羅網？這突然的變故，實在太令人大惑不解。

數來，林志毅已是近四十歲的人了。他畢業於北京人民大學的哲學系。飽歷滄桑，逃到香港之後，仍舊經歷重重災難。無論怎樣說，他都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人。現在中共又向海內外的民主人士磨刀霍霍，林志毅是否會成爲這次災難的犧牲品？我實在無法估計，以他那多病的殘軀，是否能忍受中共的鐵窗囚禁和極權的交煎？我實在不敢去想像。別了，我們北斗雜誌的主編。中共可以裝出一副笑臉去迎合國民黨人而『統戰』，却決不會輕易地放過一個批評他們的民主人士的。但願，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日子早早到來，使志毅永遠脫離這無邊的苦海。



(電影文學)

王希哲

作者：小 楓

路漫漫兮修遠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 原

序

(字幕：1968年，秋)

廣州，小北，登峰路，第十七中學校園，小操場上搭起了一個平台，白色的橫額上四個墨字「批鬥大會」，周圍牆上和籃球架上都貼滿紅線標語：「清理階級隊伍，揪出壞頭頭」、「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倒十七中井崗山一小撮壞頭頭」、「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講台上一個穿新軍裝的青年人正在講話，台下黑壓壓地坐滿了中學生。台邊還有兩個穿工人服的人分兩邊叉着一個人的後頸，壓着他彎腰低頭，這是司空見慣的「噴氣式」。

被叉着的人身材高大，一身淺色軍服，只因彎腰低頭，只見頭髮，不見臉孔。(近鏡頭)。頭髮下面是一個大牌子，白底黑字「反革命份子王希哲」，名字上用的紅色的。

(旁字：王希哲——演員 飾)

幕外批鬥者的聲音：王希哲！你是不是沖過軍區？

台下群眾(雜七雜八地)：說！

王希哲：是。

幕外：你是不是寫過文章攻擊黃永勝和廣州軍區？

台下群眾：說！

王希哲：是。(聲音弱了一點)

幕外：你是不是把鬪爭矛頭指向「三紅」，指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台下群眾：說！

王希哲：(聲音更弱)我的頭，我說不出聲音來。

講台上的發言者一頓，斜目看了看坐在主席台上的戴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訓團」胸徽的軍代表，軍代表微微點頭。又着王希哲後頭的兩隻手慢慢地鬆了，王希哲漸漸抬起頭來，英俊的臉，被毆打得不成樣子了。他習慣地甩一甩遮着眼的頭髮，(他自小就模仿有藝術氣質的電影明星)，滿眼怒火。他慢慢地左右看着台下的群眾，全場靜默了良久。然後，傲然地頭一昂，說：不是！

全場爆發了起來，一片呼口號聲，台上兩個打手便拳打腳踢，王倒下。

(字幕：1968年，冬)

廣州，大沙頭碼頭。鑼鼓喧天，一群群，一隊隊紅衛兵舉着紅旗、毛澤東像，奔向碼頭。紅色的橫額：「歡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碼頭上輪船升火待發……。

月台上，人群擁擠，送車的攜老帶幼，出

行的知青背着行裝，一頂「務農光榮」的帽子，一條肩擔，上書「××中學革命委員會贈」。鑼鼓聲、鞭炮聲，人們表情不一，有的人表情嚴肅，只有從眉目中可見一絲不敢表露出來的茫然和擔憂。

陳一陽：我走了。

（旁字：陳一陽——演員——飾）

陳一陽母親：你走吧，我們對不起你。

陳一陽：不關你們的事。

陳一陽母親：昨天我去探你父親的牢，他叫你要小心，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任性……。

陳一陽：（眉頭一皺）這個，也不關你們的事。

陳母：（眼中閃着淚花）你總是這個樣子……

陳一陽：你回去吧。（他望了一眼遠處人群中正在監視他的工宣隊員一眼，霍地，轉身走進列車，他神色如常，舉止有禮，只有在把背包往座位一丟這個動作，才能覺察出他內心的煩燥。）

（車廂內正在唱着毛語錄歌。有人在拉手風琴，一個同學一把抱着陳的肩膀）：小陳，來，一齊唱。（陳一陽輕聲說：“等一下”。“等一下”。擰了幾下沒擰脫）

陳：（爆發地）等一下！

（歌聲頓停，全車廂都回過頭來。望着他倆，那個同學也被他嚇住了，慢慢地縮回手。）

陳：（又恢復正常，輕聲說）對不起，我只是說，等一下。

（字幕一九七二年，冬）

廣州，西村，南京路卅一號。廣州市警備司令部監獄。辦公室。方處長坐在辦公椅上，胖子，臉上一付大人物似的微笑。（方處長——飾）旁邊是直屬林彪小艦隊的廣州軍區三十號辦公室的李國（李國——飾）。

。坐在他們對面是一個「犯人」。

方：（例行公事地）什麼名字？

犯人：鄭明。（旁字：鄭明——飾）

方：交代清罪行沒有？

鄭：還沒考慮好。

方：（和李對視一眼）想不想出去呀？

鄭：還沒考慮好。

方：出去以後還要不要再「揪軍內一小撮」呀？像你在廣東工學院「紅色暴動」報上的文章一樣？

鄭：沒有考慮過。

李：（跳起來）媽的，你這小子，你想要滑頭，什麼都說沒有考慮好。

方：（又看了李一眼，李坐了下來。方才轉頭對鄭說）出去。

方在鄭的檔案卷宗袋上批了兩個字：釋放

李：（洩氣地）真他媽的，便宜了他。

方：沒辦法，中央有緊急命令，不管怎樣，全部先放，以後再說。

方：下一個。

（衛兵帶進來另一個犯人，犯人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旁字：劉華——飾）

方：（收起原來的微笑，皺了皺眉頭）什麼名字？

犯人：劉華。（架起腳，順手抓過李面前的烟，就點火）

方：交代清了沒有？

劉：有呀，全部都認了。首長。

李：（又跳起來）你胡說！你一共提審了八次，可八次的供詞都不一樣。你想要我們？

劉：不是，首長，我是個老老實實的人，半句假話都不會說。可是他們每次都打我的頭，我跟他們說要打就打身體，不要打腦袋，一打腦袋就什麼東西都忘記了，可是他們就是不聽……。

李：你媽的還教訓我們來了，你是不是繞個圈子來罵我們用刑「逼、供、訊」？

劉：我沒有這個意思。首長。

李：（有氣不能出）（大聲地）你討打。

方：（一擺手，讓李坐下）想不想出去呀？

劉：想呀，白天黑夜都想。首長。所以我天天都打報告給你們要求釋放。

方：（也有點忍不住了）可是你每天的理由都不一樣！昨天你說的是要結婚。……

劉：是呀，我得馬上，我等得很急了，就像首長你們一樣……

方：（一拍桌子）住嘴。出去。

劉：（站起來，臉上一絲幾乎看不出的諷刺的微笑）是，首長。

（劉出去後，方嘆了一口氣，在檔案宗卷上又寫了「釋放」二字。）

方：下一個。

（衛兵推了一個「犯人」進來。矮小身材，過於寬大的軍裝，深度眼鏡，一雙極不相稱的大皮鞋。）（李正天——飾）

方：什麼名字？

犯人：李正天。光明正大的“正”

李國：你胡說！

方：認罪了沒有？

李：沒有。

（李國又想發作，後來又咽一口氣忍住了）

方：想不想出去？我們可以釋放你。

李：想。

方：（想盡快了結這類討厭的談話，拿起筆來就寫，剛剛寫了一個「釋」字）

李：慢着，我有個要求。

方：（抬起頭來）什麼？

李：我要求把整我的黑材料交還給我，並當衆燒燬。

李國：你放屁。你把現在當成是文革初期嗎？



「李一哲」成員一九七九年在廣州東湖省委招待所門前休憩
從左至右：陳一陽、王希哲、李正天與郭鴻志。

你他媽的……。

方：（強壓着怒火）好，我們會考慮你的要求。出去！

（李出去後，李國霍地轉過身來，說：“什麼？你答應了他？”）

（方冷笑一聲，把檔案推給李看，上面批的是一行字：違反獄規，再押兩個月。）

（一）

（字幕：一九七三年）

廣州光塔路，光塔旁邊的一間房子。鄭明家。兩個穿着大衣的人一前一後走近大門，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周圍有沒有跟踪的人，敲門。門開了。開門的是王希哲。

王：我是「廣州兵團」的常委，我叫王希哲，請問，您是……

來客：我是「八一兵團」的常委，我叫……（附在王的耳邊耳語）

王：好。請進。

（他們關上門，往裡走，門鈴又響了。）

（打開門一看，是個女的）

王：我是「廣州兵團」的常委，我叫王希哲，您是……

來客：我是「紅旗工人」的委員，我叫……

王：好，請進。

（兩人走進屋裡，鏡頭推向客廳，密密麻麻的滿是人頭，大家的臉色嚴肅。有的人在交頭接耳。）

王：好，人也差不多齊了。現在開會吧。現在先請李正天發言。（李正天站起來，兩手習慣又在腰間，他總是在模仿列寧演講的姿態）

：我們草擬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有的同志已經看過了，又經過了反復的討論，今天應該是定稿下來，大家簽上名，作為我們的意見和建議，獻給毛主席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面我詳細地談談文章的觀點……。

（下面的群眾對李的演講，議論紛紛。不同意的居多，終於，一個戴眼鏡的站起來，廣州大學生中最著名的造反派頭頭武斌。）

武：我武斌。大家都認識，不用自我介紹了吧？

（大家哄然一笑，有些人擠眉弄眼：省革委常委，好神氣。）

武：我同意文章內的觀點，但是我不能同意這種做法。我們應該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相信省委。毛主席對廣東省委是信任的。我們要看準了，誰是毛主席一邊的人，誰是黃永勝、丁盛一伙的，我們要緊跟，一步步來，不要打亂了中央的步署。（群眾中有人鼓掌，有人反對。）

陳一陽：相信毛主席不等於相信省委，中央裡也有人不聽毛主席的話。（群眾：誰？誰？你說的是誰？）

王希哲：我們不願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問，要求民主與法制對不對？

（群眾中開始有人退席）

鄭明：我叫鄭明，中南林學院學生。我也不同意這種做法。空談理論根本沒用。

（更多人退席）

王希哲：（站起來）你怕了？你以前的膽量去了哪裡？

（鄭不理他）

劉華：請問，你們文章裡所說「林彪體系」的總根子是什麼？是誰支持林彪上台的？誰是這幾年文革大災難的元凶？

（全場突靜）

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劉：你應該明白。（眼睛閃過一絲笑意）

李：（一托眼鏡）……你，你是錯誤的！

（群眾哄動起來，不少人大罵，紛紛離場，陳一陽把桌面上的「關於」一文攤開，叫着，「同意我們文章的請簽名」沒有人理會他。）

王：不革命的滾出去！

（劉、鄭坐着沒動，全部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李、一、哲、鄭、劉）

李：你們為什麼不走？

劉：因為我們不是「不革命的」。（有點譏諷地）

李：你的思想很危險。

劉：你們的，也很危險。（微笑）

王：我們的區別在於相不相信毛主席。

劉：是的，還不只這些。

王：那……請吧。

（劉注視着王片刻，然後起身走出去，走到門口，回轉身來）

劉：記着。你們會需要我的。（出去）
李：虛無主義！
王：不，他是條漢子。
陳：（轉身對鄭）你呢？（望了望擺在桌子面的「關於」一文）
鄭：我也不會簽名的。
王：那你留下來幹什麼？
鄭：（生氣地）這是我的家！
王：……
鄭：（誠懇地）我留下來跟你們商量商量。
李：有什麼好商量的？你不是說空談沒用嗎？你還要做什麼？
鄭：我要的是證據！林彪一伙對人民實行專政，屠殺人民、迫害人民的證據。（她從書包中掏出一本子，上面題著「海南調查報告」。打開本子，裡面是一堆照片）
鄭：這是在海南島儋縣，軍隊法西斯暴行的照片，……這是在西聯，殘酷迫害幹部的照片，……這是在西慶，無法無天，槍斃無辜人民的照片……
李：你們是怎樣搞到的？
鄭：我們一伙人，沒有糧票，沒有工資，花了整整幾年的功夫，冒着生命危險，東躲西藏的避開當局的耳目，到處偷拍照片，調查這成千上百個冤案。
王：呀，你們真成，（一步衝上前，緊緊地拉着鄭的手，鄭臉一紅，趕緊抽出手。）
李：，世界上只有軍隊和警察去查殺人案，在中國，却是人民秘密去查軍隊和警察的殺人案。
鄭：可是調查了又怎樣？材料往哪裡送？送法院嗎？現在的法院沒有國法！送省委嗎？現在的各級黨委沒有黨紀！偌大個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告狀！
王：送毛主席！（眼睛閃閃發亮）
衆：對，只有毛主席和周總理，我們才信得過！

（二）

（一列北上的列車沿着京廣綫飛馳。王在車廂裡，有一個閃過的側臉很像劉華，他原想起身追去，又坐下。火車慢慢地開進「韶關」站。王希哲隨着旅客走下站台，他背着一個綠色的軍用書包。他東張西望，顯然對這地方並不熟悉。最後，他終於走進一家飯店。）

（他把書包掛在椅後，開始用飯）

（突然，他看見一個扒手偷了一個路人的錢包，而被偷的尚未發覺，他馬上站起身，走到了街上，告訴那個路人，和那個路人向着小偷溜走的方向追了過去。）

（半個鐘頭後，店員清理王吃飯的桌子，一邊忙碌一邊吹着口哨，香港流行曲，發現了書包。）

（他提着書包，走到櫃台，經理正在和他的情人在電話裡打情罵俏。）

店：經理，有個小子吃飽開溜了。

經：沒用！（又對着電話）不是說你，嘻嘻。

店：這小子走急了，留了個破書包在這。

經：丟掉！（一邊對電話說話）去醫院把它拿掉好了。在這裡墮胎是不犯法的，又不是香港。

店：（自言自語）看看裡面有什麼證件沒有？

經：（瞪眼）窮知青，有什麼油水，還不趕快丟開一邊去做事！

（店員已經打開了書包裡面的紙包，赫然是兩本冊子「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海南調查報告」。他有點好奇，一打開冊子，臉頓時嚇白了，經理也伸過頭來看，兩個人都呆住了。店員把書包一放，想開溜。薑畢竟是老的辣，經理一下子清醒過來）

經：慢走！書包是你撿到的，你得打電話去報派出所。我只能作個旁證。

（店員無奈，只好打電話）

（門“呼”的一聲打開，走進來的是化了裝的李國：“不用打了，書包交給我！”他出示證件。）

王希哲急匆匆地往飯店趕，他已經發現了自己的粗心大意。當他差不多走到大門時，突然迎面被一個工人帽差不多壓到眼睛的人用肩膀一撞，他差一點驚叫了起來，認出了是劉華。劉頭也不回，低聲喝道：“快走。”王驚覺，方向不變，脚步不停，不進大門急走。

與此同時，飯店裡埋伏的警察發現了他，一窩蜂地擁了出來，王拔腳就跑，警察跟着追。……「站住！」「站住！」……

王終於擺脫了警察，跑到了市郊的一個小松林裡，他臉色蒼白，衣服扯破，氣喘如牛。

突然，聽到後面輕微的樹葉聲，他警覺地傾聽，驀然回頭，發現一個人倚着樹站在那裡。又是劉華。

王：你怎麼也會來韶關？

劉：（仍然是那討厭的微笑）我們是同路。

王：同路？

劉：是的。我們是同路人。

王：（開始領會）既然最後的目的地不同，那你爲什麼管我？

劉：這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王：謝謝你的好意。（冷冷地）

劉：不客氣。

王：我得走。

劉：一切交通要道都封鎖了，你得繞路回廣州。

(王嘯的一聲，頭一昂，往前走，劉注視着他的背影。)

廣州，東山，西河甫路。廣東省委機關大樓。辦公室內。趙書記、方處長、李國。桌子上就擺着「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三人都在沉默，顯然已經討論了很久。方、李兩人垂手而立，等待着命令。趙正在來回踱步。

趙：好！先把他們給抓起來。
方、李：是。(立正敬禮，轉身就走，走到門口)

趙：回來。(方、李對視一下，走了回來。)
趙：(摸着下巴，又沉思了一會)。不，先不抓。(決斷地)嚴密監視他們三個人。文章急送中央政治局。

方、李：(立正)是。(出去)
(在走廊上)

李：你看，書記的意思是……

方：你懂什麼？你我都不是政治的料子！首長有首長的考慮，上面又要搞「運動」了，這年頭，不摸清風向，誰來背黑鍋？

李：(恍然大悟)哦。我服了你。



圍觀李一哲大字報的盛況

(三)

廣州，中山五路絲綢商店對面，車水馬龍，人群絡繹不絕。一輛破吉普車開過來，「嘎」聲停住。李、一、哲三人跳下車，「勞駕」「勞駕」，他們提着漿糊桶、漿糊掃、大字報，叫人群讓開一條路到牆邊，就一人抹漿糊，兩人把大字報往牆上貼，大字報的標題是漂亮的美術字：「廣東怎麼辦？」署名是「李一哲」。

(人頭擁擠，議論紛紛，百口百詞……)

群眾甲：喂，你們是高幹子弟嗎？

陳：不是。

群眾甲：不是高幹子弟怎麼敢貼這種大字報？
衆：(笑)

群眾乙：「廣東怎麼辦？」你們說怎麼辦嘛，現在不是很穩定嗎？幹嘛又來搗亂它呢？
王：我們不是要搗亂，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大民主。林彪死黨在廣東的勢力很大，必須要揭這個蓋子！

群眾丙：要揭把材料送到黨委去。(衆哄笑)
李：大家都知道，送去沒用！我們只好訴諸於人民。……

群眾女：說得好！

群眾男：說得好又怎麼樣，以後還不是要掉腦袋？揭蓋子，揭這種蓋子(他拿出一個酒

鬼隨身帶的一種小酒瓶)

群眾女：去你的，酒鬼！

(人群中鄭明和一個姑娘站着，正在傾聽着王希哲的演說。突然，她發現一個傢伙正在自己的背後，偷偷地拿出照相機利用人頭的空隙來拍照。就在按快門的一刹那，鄭的頭部快速地橫過鏡頭。那傢伙也發現旁人在注意他，迅速地走了。王希哲朝鄭點點頭，笑了笑。)

(方處長和李國坐在「省保衛組」裡。方穿着便服，他們都升官了。)

李：(對門口)進來。

(外面進來那個拍照片的便衣公安人員)

李：(不動聲色)你工作做得不錯。

便：(沒發現李是在譏諷)那裡，工作做得不夠。

李：(冷笑一聲)這是你拍的照片。(把桌上的一張照片向前一推)

(便衣伸頭一看，滿額是汗。)

(是一個梳辮子的姑娘的後腦！)

便：我……

李：同志，這是階級鬭爭哪，怎能掉以輕心！

便：……

李：晚上再去重拍吧！拍完大字報洗掉。

方：等等，打個電話，叫環境衛生局派人去洗

便：環衛局？

方：對，就說快要開交易會了。保持廣州市容的清潔。

便：是。

（鏡頭交雜）

（中山五路百貨商店 窗前，夜深人靜，一輛環境衛生局車停在大字報邊，幾個大漢用水龍在沖刷掉大字報）

（同樣的地方，另一個晚上，李、一、哲等四人拿着漿糊桶，看看洗掉的大字報殘骸，搖搖頭嘆口氣，又貼上新的，標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館始末。）

（廣州中山二路，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門前的大草坪上，王希哲、陳一陽在演講，大批的人群圍着他們，一陣陣掌聲夾着七嘴八舌的辯論。遠遠的幾排戴工人糾察隊袖章的工糾佈下了警戒綫。但是沒有衝突。）

（廣州北京路（舊漢民路）財政廳前，李正天登上財廳的寬闊石級，發表演說，下面掌聲雷動，馬路堵塞，車輛全部停了下來）

李：同志們，我們公佈了那麼多的慘無人道的冤案，我們叫了那麼多天的「民主」，可是省委、市委却無動於衷，我們怎麼辦？我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群眾：要省、市委出來解釋！不解釋不行！

李：走，我們到省委去。

衆：走！

李：大家排好隊，不要亂，遊行去！

（遊行隊伍在大街上，一邊走，一邊呼口號）

（省委門前，平端着槍的解放軍阻止了遊行隊伍。李擠到槍尖前，扶了扶眼鏡說：“同志，我們要見趙書記。”士兵不出聲。王希哲：“嘿，同志，我們要進去。”木然的士兵仍然不出聲。後面的群眾鬧哄哄，有些人喊“衝”。李安穩住了大家。）

（省委大樓裡，趙書記倒背着手，在辦公室內走來走去。方、李兩人垂手站着，大氣都不敢吭一聲。趙走到辦公桌前，緩緩地坐下。）

趙：中央仍然不表態。……

趙：（抬頭對兩人，果斷地）叫秘書處出去一個人，說我答應他們的要求，定限接見他們的代表，盡快解決冤案問題，請大家群眾相信省委、我和許司令是站在人民一邊

的。

方、李：是。

趙：還有，餘下的工作，就是你們倆做的了。

方：請首長指示。

趙：怎麼？還得我教你們怎樣做嗎？老方管文，老李管武，從宣傳部調一批秀才來。

方、李：（對視一眼）是。（轉身出去）

趙：（待他們出去後）一下按熄手上的烟蒂，霍地站起來，又慢慢地坐下，口裡喃喃地說：“多思，多思，主席英明，多思！”

（一個幽靜的月夜，詩情畫意的廣州東山區東湖公園裡，垂柳拂着湖水，遠遠只有一兩對伴侶在談情。王希哲和鄭明，手拉着手，肩並肩地坐在湖邊）

鄭：你想他們下一步會怎樣？

王：我沒有想過。

鄭：我想免不了來硬的。

王：你不能「懷疑一切」，趙書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相信毛主席就快要表態了。

鄭：我，我只不過有點不吉的預感。

（黑黑的柳叢林，鑽出來幾個工人糾察隊，一下子圍住了他倆）

工甲：我們是“掃流隊”的。

工乙：好大的膽子，在這裡耍流氓。

王：胡說，我們坐在這裡犯什麼法？

工甲：還嘴硬，起來。

王：我是王希哲。

工甲：我知道你是王希哲，你在那反革命大字報上不是說過“刑不上大夫”是錯的嗎？現在我們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鄭：你們胡說。

工：帶到派出所去，你們也嘗嘗“法制”是什麼味道。

（又施又拉，帶走兩人）

（省委保衛組內，李國在打電話。）

李：什麼？放！放人！你們這班混蛋！陳一陽把大字報貼到門口了，說我們侵犯人權。混蛋！

方：（微笑）你好像有點進步。

李：還不是向你老哥學的，那幫傢伙真是，一點都不得“有理、有利、有節。”

（鏡頭又一轉）

（依舊是中山五路百貨商店的門前，滿滿大字報欄裡，多了兩張新貼的大字報，一張的大標題是「一株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評李一哲的大字報」，署名是「宣集文」，另一張是李、一、哲寫的大字報：「——評宣集文」。旁觀的人都臉孔嚴肅，交頭接耳，一種不祥的氣氛。劉華披著衣著時髦的女友的肩，也站在人群中，他倆不說話，只是聽。當然還是有不少人不知道事態趨向嚴重。一個穿堅固尼

藍工人服的人正在大聲嚷嚷。)

工人：“宣集文”“宣集文”是個什麼人呢？

“宣”這個姓，我可是從來沒有聽過，老伯伯「百家姓」上有這個姓嗎？

劉：你看清楚了，「宣集文」不是一個人，而是「廣州市委宣傳部」集體寫的文章。

群眾甲：嘩，是廣州市委，那不組織出面干預了嗎？爲什麼不用文件呢？當官的選出來貼大字報？

劉：這是用大字報對大字報，「以夷制夷」。

群眾乙：（是個挽着菜籃子的老太太在仰着頭看）市委？市委不就是官府了嗎？官字兩個口啊，怎麼鬧得過？

劉：老婆婆，這種事不是你我管得了的事，你看累了，人又擠，我們回去吧。（上前扶着她）

（老婆婆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民不與官鬪，民不與官鬪……）

（陳一陽的家裡。李、一、哲，還有一個叫郭志的四個人正在開會）（敲門聲）

陳：不要作聲。（走去開門）誰？

陳母：是我。

陳：（打開了門）幹嘛？

陳母：給你們一些開水。

陳：（接開水）媽，你睡吧。

陳母：唉，你們也要早睡，天天這樣子，人就壞了。你父親也睡不着，老是唉聲嘆氣的。

陳：（不耐煩地）好，好，好。（關上門）

李：老人家怪擔心的。

陳：老頭子剛從學習班裡出來，「市政協」裡開政治學習會，迫着他發言，反對我。

王：他怎麼樣？

陳：他發言了。回來又倒在床上悶頭大睡不吭氣。

李：老民主黨派嘛，這幾十年，也真夠他們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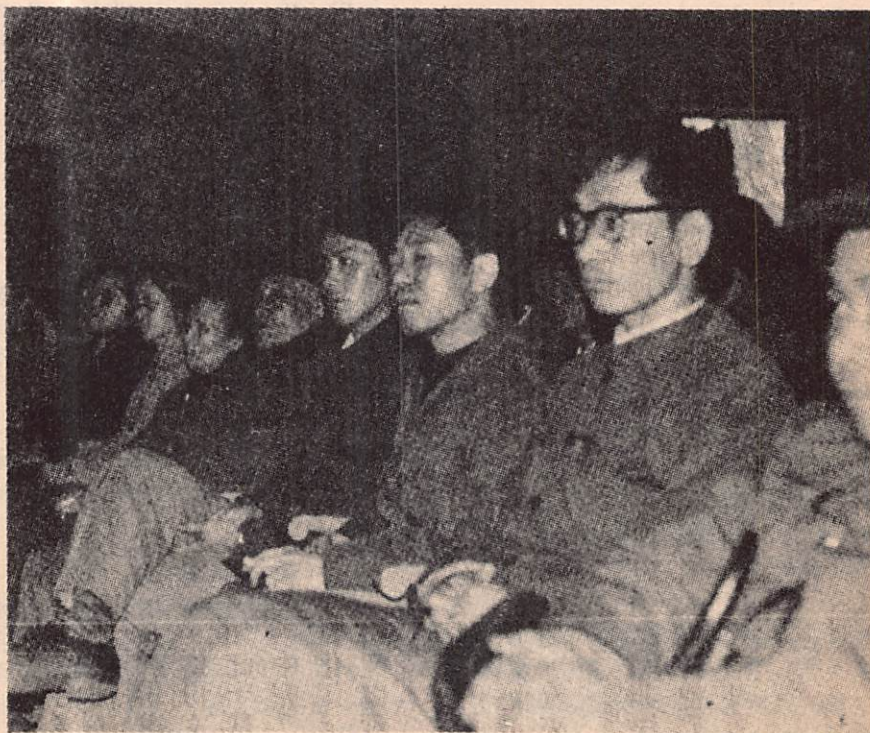
陳：不談這些了。看看下一步我們怎樣走吧。

李：現在是群情激昂，「宣集文」的出現，正是給中國人民多了一個「反面教員」。聽說我們的文章已經送到了北京中央政治局。只要一到了毛主席、周總理手裡，中央一表態，整個形勢就會一面倒向我們這一邊。

王：對。我們要抓住當前這個大好形勢，趁勝追擊，把我們總的綱領「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貼出去。

陳：好。說幹就幹。

（下期續）



王希哲、陳一陽的家屬在「李一哲」平反大會上，左起第一人是王希哲的太太，第二人是王希哲的母親。



波 蘭

由於波蘭受全球經濟波動與世界能源短缺及原料不足的影響，導致波蘭國內生產銳減，必須大量輸入物質、糧食；結果造成國際收支不平衡，加上外債高築，必須償還，更使通貨膨脹加劇。波共政權不得已，唯有調整食物價格以謀求解決之道。於是提高肉價，因而觸發最近幾年來的激烈工潮（或稱「工人民主改革運動」）。又因它的發展是由波蘭的「獨立團結工聯會」所推動，故此筆者就其發展的主線將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勢力成長階段

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波共當局宣佈正式提高肉價。由於長期以來工資偏低，生活未獲合理改善，而物價却不斷上漲；次日，在華沙附近URSUS（烏爾賽斯）地方的拖拉機廠工人乃首先發動罷工表示抗議。其後罷工風潮迅速擴大，七月十六日LUBLIN（盧布林）三千鐵路工人選舉工人代表與當局談判；至八月中旬，影響所及GDYNIA（格地尼亞）、SOPOT（索詩特）、STETTIN（斯特丁）等地工廠工人紛紛響應；以後更由北部蔓延到南部的LODZ（羅茲）、KATOWICE（卡托維契）、首都WARSAW（華沙）附近也發生工潮，終於演成全國性的大罷工。超過一百五十多個工業與公共服務單位，從飛機工廠、紡織工廠到城市垃圾收集員、公共汽車駕駛員，都紛紛加入罷工行列。罷工人數亦由數萬劇增至三十萬

，甚至高達五十多萬人。八月十四日格丹斯克GDANSK的列寧造船廠一萬六千名工人亦開始罷工，要求加薪，招回被開除工人及組織自由工會；當時該地對外通訊曾一度中斷，而陷於癱瘓狀態。八月十七日GDANSK二十一家工廠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並推派以LECH WALESA（華里沙）為首的工人代表七人與波共當局談判，提出包括增加工資、取消漲價、准許組織自由工會、廢除新聞檢查制度、保障言論出版自由、釋放政治犯及允許教會從事新聞傳播等十六項要求。波共當局成立「調查委員會」，由部長會議副主席TADEUSZ PYKA（畢卡）領導，負責研究工人要求。八月十九日波蘭第三海港SZCZECIN（什切青，舊名STETTIN史特汀）開始出現罷工運動。稍早，波蘭煤礦中心SILESIA（西里西亞）地方也發生騷動。起初，波共當局拒絕與聲稱代表二百七十九家罷工工廠的工人代表的「工人罷工委員會」直接談判，堅持個別商談，形成僵局，以至情勢發展日益嚴重。於是波共乃改派MIECZYSTAW JAGIELKI（雅蓋爾斯基）接替TADEUSZ PYKA（畢卡）的「調查委員會」，八月廿二日即與GDANSK（格丹斯克）的「聯合罷工委員會」代表首次接觸，爭辯二個半小時，未獲結果。聯合委員會更提示廿一點要求。

波蘭工人黨（即共產黨）於八月廿四日開始讓步，召開「中央全會」，對黨政人事作大

幅度調整；總理 EDWARD BABIUCH（巴比烏赫）去職，由 YT PINKOWSKI（平科夫斯基）繼任，並全面改組政府。八月卅一日，雅蓋爾斯基與工人代表華里沙達成諒解，並簽署「格丹斯克協議」，允許成立「獨立團結工聯會」，接受廿一項要求。（1. 組織自由工會；2. 工人享有罷工權利；3. 言論出版自由；4. 准許因罷工事件而被解僱者恢復原職；5. 公開討論國家改革計劃，充分報導經濟、社會實況；6. 官方傳播機構宣佈罷工委員會之要求；7. 支付罷工期間工資；8. 工人加薪；9. 應隨通貨膨脹自動調整工資；10. 國內市場充分供應食品；11. 廢止共產黨員特權；12. 在市場情況改進前，肉類採配給制；13. 退休年齡提前；14. 改善退休金制度；15. 改善健康服務；16. 增加托兒所；17. 產假支薪；18. 縮短房屋配給時間；19. 增加出差費；20. 週六不上班；21. 管制肉價。）至此時，波蘭獨立團結工聯會已擁有一千萬以上的會員（佔波蘭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為波共的四倍，人民支持信任度僅次於天主教會而名列第二位），並在波蘭全國設立四十九個支部。

（二）經濟妥協階段

自從八月卅一日達成「格丹斯克協議」後，於是格丹斯克 GDANSK 與 SZCZECIN（什切青）兩地區工人即在九月一日恢復上班；同時 WROCLAW（優拉茲拉夫）、ELBLAG（艾爾布拉格）、LODZ（羅茲）、POZNAN（波茲南）及 KRAKOW（克拉考夫）等地的工潮亦告一段落，只有 SILESIA（西利西亞）地區的工潮至九月六日才達成協定。於此同時，波共「六中全會」罷免吉瑞克（EDWARD GIEREK），而推選 STANISLAW KANIA（卡尼亞）繼任第一書記，並且立刻聲言：「當局和人民之間必須加強團結，這是過去所欠缺的。因此就招致了不滿，爆發危險的事件。」同時表示波蘭當前首要任務是：「恢復社會大眾對人民政權的信心，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者對黨的信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七日由卅五個地方罷工工人組織所成立的委員會，決定成立卅五個脫離共黨控制的全國獨立性工會，名叫 SOLIDARITY（團結）工聯會。十月四日，卡尼亞在波共「六中全會」上以「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當前任務」為題作報告，將一切罪過推諉於過去負責人身上，承認波蘭國內形勢非常嚴重，否認此次工潮是「反社會主義性質」，不過他指責那些「反社會主義」份子為自己的目的

利用這些衝突的現象。十月廿四日華沙地方法庭通過「團結工會」的申請，登記為一個獨立工會，但條件是由共產黨擔當領導角色，並需修改罷工權利。「團結工會」對波共此舉甚表不滿，乃發出罷工警告，並進行上訴，後來獲得最高法院支持，承認「獨立團結工會」正式取得合法性，於是工會主席華里沙才取消全國性罷工的計劃。十二月三日波共「中央委員會」宣佈剝奪吉瑞克所有黨內職務，並將其四位副手開除出政治局。翌日，美國宣稱：蘇聯正做好軍事干預波蘭內政的準備。

十二月廿三日波共政權宣佈，由於經濟危機，政府無法依照原定計劃，在一九八一年實行每週工作五天四十小時。「獨立團結工會」譴責當局違反「格丹斯克協議」。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數以百萬計的波蘭工人再度掀起大罷工，以示抗議波共政權反對一週工作五天的要求；同時波蘭農民也提出組織「獨立農會」的要求，且得到波境 RZEWOW（里茲索夫）地區之最大工廠工人的支持。洛茲市的「洛茲大學」與醫學院學生也為支持工人、農民實行罷課，並提出包括取消馬列主義課程在內的一些要求。

徐文立 在入獄前給波蘭團結工會的一封信
——本刊資料室

親愛的萊赫·瓦文薩主席：
您對自主的團結工會全副心
意支持，使我感到無限的榮幸。
我和我的朋友們，在您的鼓舞和
支持下，完成了註冊登記的任務。工
會勝利地完成了註冊登記的任務，這
是以前您的勇敢、智慧和勇氣所
為全波蘭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

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開創了全世界
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史的新紀元。
在您的鼓舞下，我們更堅信，我們
一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波蘭人民，為工人階級的友誼而
中波兩國人民，為工人階級的友誼而
七月二十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徐文立

Lettre de soutien à Solidarité envoyée par le démocrate
chinois XU WENLI à LECH WALESIA.

(三) 政治攤牌階段

由於「勞工危機」加劇，迫使波共政權再度改組，二月九日波共「八屆八中全會」罷黜平科夫斯基，任命波蘭國防部長WOJCIECH JARUZELSKI（雅魯澤斯基）為總理。由此次撤換文人，改由軍人擔任總理的行動顯示波蘭當時情勢已近爆炸邊緣，同時亦是波共向自由工人運動採取鐵腕政策與軍事鎮壓的先聲。二月十日，波共最高法院駁回私營農民所提出組織「獨立農會」的申請。二月廿三日蘇共黨書記布列茲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在一次蘇共大會上，聲稱在波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正受到威脅；三月十八日，波蘭新聞媒介宣佈「華沙條約國」開始在華沙附近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同月廿四日在彼得哥什與波共當局談判未取得成果後，華里沙即警告說：「如果波蘭當局宣佈緊急狀態，即舉行全國大罷工。」卅日華里沙與波共當局談判人員達成協議，取消大罷工。

四月一日波蘭全國實行肉類配給，同月七日，波共宣佈結束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國」在波境延長的軍事演習。六月七日蘇共「中央委員會」致函波共要求嚴厲對付「反革命」。七月廿七日波蘭工人因為抗議糧食短缺，再次進行示威和罷工；八月七日約百萬人在「西里西亞」工業地區舉行四小時罷工，要求當局解決糧食短缺。表示波蘭人民對當局藉外來的軍事壓力毫不退讓；相反地，更強烈地表達自己獨立意的反應。正如同月廿一日波蘭「文化雜誌」所載民意調查顯示：在波蘭人心目中所信任的對象順序為教會、獨立團結工聯會、軍隊、國會、集體總統制、政府、法院、民主黨、警察等，而「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却排在第十三位。可見波蘭人對波共的信任危機之嚴重程度。九月三日蘇共在波蘭邊界附近的「波羅的海」沿岸舉行大規模海、陸、空軍事演習，這又顯示蘇共對波蘭暗中施加的軍事壓力繼續增強。

九月五日波蘭「獨立團結工會」在格丹斯克召開「第一次全國性大會」，工會領導階層聲稱要建立「我們夢中的波蘭」（獨立、民主、自由的波蘭），大會更通過一連串強硬的決議，呼籲當局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進行基本改革。

由於經濟制度注定無法改善人民生活，而通貨膨脹加劇，物價飛漲，波共政權束手無策



▲格丹斯克列寧船廠外的紀念碑，很多人來這裏獻花。

，乃再度人事變動。十月十八日波共政治局撤銷「卡尼亞」的黨書記職務，並由雅魯澤斯基取代，而雅氏集軍、政、黨大權於一身。波蘭已進入半軍事性管制階段。

十月廿一日波蘭全國又爆發罷工、抗議食物短缺。而波共中曾有廢止罷工權利的建議，十月廿四日波蘭「獨立團結工會」發出罷工號召，廿六日波共軍隊藉口應付冬天糧食煤產供應分駐全國二千農區；廿八日波蘭團結工會實行全國性大罷工，至十一月廿二日止，波蘭全國四十九省中又有廿八省出現罷工行動或提出罷工威脅。而首都華沙又遍貼「停止飢餓」、「停止迫害」及「我們要自治共和政體」等標語，形成十四月來與波共政權最強烈的對抗局面。此後，波蘭全國各地亦相繼爆發學潮，並從大學擴展到中學。而地方警察與群眾流血衝突亦發生。十一月廿八日波共總理雅魯澤斯基在波共「中央委員會」上要求採取特別措施，結束勞工動亂。十二月十二日獨立團結工會在格丹斯克總部開會，通過決議：「若波共實施緊急權力法案，將再度發動大罷工。」同時工會人士要求「自由選舉」和其他改革。波蘭危局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經濟問題惡化，波共與工聯對峙互不相讓。十二月十三日波共政權宣佈「戰時狀態」，成立「救國軍事委員會」，實行軍事戒嚴，大捕團結工聯領袖人物和活躍份子，血腥鎮壓波蘭工人運動。自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宣佈軍管止，共約十六個月的工潮乃告一段落。



波蘭團結工會
沒有屈服，他們在
一九八三年參加了
在巴黎召開的「國
際反極權同盟」成
立大會。

(四) 波共鎮壓與國際反應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賣國傀儡政權在蘇共的壓力下宣佈戒嚴，實施紅色恐怖的軍法統治。但波蘭工人英勇的抵抗運動仍然持續展開；除了小規模的流血衝突之外，更採取大規模的罷工、怠工等積極、消極的杯葛行動。在宣佈軍管的當日，未被拘捕的團結工聯領袖即發出全國總罷工的號召，於是波蘭各大城市的工廠、船塢、鋼鐵廠、煤礦、大學和圖書館等均出現罷工、靜坐抗議等行動。據法新社十二月廿一日報導，艾伯勒、盧布連、卡托維茲、什切青和洛克勞等廣泛地區騷亂持續；三千礦工佔領茲摩域和比亞特礦場，卡托維茲鋼鐵企業被八千工人佔領，並據報在波共軍隊開入時將主要高爐炸毀。縱使依據官方的說法，自發的罷工已停止下來，但各種消息顯示，反抗正在組織和繼續下去；在華沙，團結工會到十二月廿八日為止，已出版了四期的「新聞通訊」，呼籲全國進行反抗行動，工人正轉向消極反抗：降低工作速度，破壞製成品等。據報導，在恢復工作之後的一個星期內，烏蘇斯拖拉機廠的一萬五千名工人只製造一部拖拉機；在波茲南，工人在軍隊監管下製造了不能使用的產品；據「新聞通訊」報導，情況最壞的是在華沙，部份居民屈服在恐懼之下。省團結工會呼籲：「各人不要恐懼，將消息傳遞開去吧

！我們被佔領，但我們並沒有被打敗。每天晚上八時至九時半，點洋燭以表示反抗和團結。」在農村，農民害怕被徵糧，將牲畜和穀物收藏起來，並拒絕向政府售賣糧食；官方電台也間接證實了這個消息：農產品徵購的數量下降，威脅要對農民實施制裁。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反抗運動在社會各個層面自發地組織起來，並轉向地下活動。

波蘭人民對於波共的軍事鎮壓給予堅決的反抗與靜默的抵抗，得到全世界輿論的同情與聲援。當然東歐共產集團均追隨蘇聯共產帝國主義者，狼狽為奸地對波共施用軍事壓力迫使其血腥鎮壓；西歐各民主國家的政府諸如西德、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荷蘭、挪威、比利時、瑞士、葡萄牙、丹麥等對於波共軍事當局的鎮壓行動，多持觀望的態度，其中德國及法國政府更認為這是波蘭的內政問題而不擬干預。英國譴責蘇聯幕後主使其事；美國則

採取強硬的態度：一方面警告蘇聯不得干預波蘭內政，另一方面則要求波共當局必須尊重人權。雷根總統於十二月廿三日晚間宣佈：降低對波蘭政權的經濟關係；同時對蘇聯實施七項經濟制裁，以作為對蘇聯的警告。十二月廿四日又在耶誕致辭中號召美國人在家中燃點蠟燭，表示「自由之光不會熄滅」！更申明承諾：「支援苦難中的波蘭人民所採取的步驟……。」一九八二年一月卅日美國為支持波蘭工會，定為「美國團結日」，美國總統雷根更在電視廣播中向全球三億電視觀眾呼籲：「讓波蘭自由自在！」教宗保祿二世亦發表了要求波蘭當局結束軍管的呼籲。

西方政府基於國際政治的互動原則（即現實主義），故所持的態度較謹慎、保守。而人民却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於波蘭人民深表同情：多表現強硬的態度，並立即舉行示威遊行抗議波共軍管當局，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工會領袖、取消戒嚴令等。例如法國在十二月十四日由工會組織抗議示威，除了法共與法共控制的工會（勞工總聯盟）未參與之外，從極左到極右的黨派與工會都參加；其他各國勞工組織、民間團體等均採取行動抗議波共的軍法統治。美國工會的行動更具體，例如在碼頭拒卸波蘭商船的貨物。此外，西歐各國共黨，除法共外，都分別譴責波共實施軍事統治。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比利時、荷蘭與希臘的共黨組織都採取類似的行動，其中尤以意共最強硬。波蘭的工運，震撼了整個世界，揭開共產主義國家內民主運動新的一頁，它將永存史冊。

（完）



CHINA SPRING

TABLE OF CONTENTS

VOL. 1, NO. 4.

JULY 1983



EDITORIAL

Be vigilant, patriotic Chinese!

(APPENDIX)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ocument No. 14 - 1983: "The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Grasping firmly the work of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DOMESTIC COMMUNICATION

Some inside stories of "The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iu Ping, Beijing

Can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ry ensure the peoples' security?
Mu Yi,

SPECIAL REPORTS

The Founding of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in Paris.
-Staff reporter, China Spr

Welcome Zhu Jiangang.
-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APPENDIX 1)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joint "China Spring" by Zhu Jiangang

(APPENDIX 1) A letter to Zhu Jiangang by the leader of Chinese Hunan Flower Opera Troupe.

The War of Hongkong.
Yi Wen, Chicago

OVERSEA STUDENT GARDEN PLOT

The human rights of oversea Chinese Students.
-The special commentator for China Spring

A investigation report about the case of Bao Siqin from Boston.
-Staff reporter, china Spr

A investigation report about the case of Cheng Wei from

Rochester.

-Staff reporter, China Spr

IDEOLOGICAL FORUM

The torch of democracy movement. -Fang Dan, Hongkong

On Economic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Gu Shan, Guangzhou, China

Some questions about "One child only policy"
-Dr. Huang, China

Two main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Taiwan Democratization.
-Mu Mu

THE FUTURE OF MOTHERLAND

The Planned Economy is still better. -Zhao Li

Comments on private own system. -Shi Xing, Boston

ESSAYS

Jiang Jinguo and Wang Xizhe. -Liu Ying, San Franc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tical Space".
-Shi Jun

On Marxist Dispersion. -Gong Gong

The mirage of "5.16". -Bao Buping

LETTERS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rom Taipei, Holland, Dominica, U. S., Hongkong, Japan, Canada, presenting criticisms,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LITERATURE

A message to the orphan. -Bu Youshu

The song of Freedom. -Zheng Baoluo, Newyork

Rain Water

In memory of Lin Zhiyi. -Chai kefeng

Wang Xizhe(movie literature). -Xian Feng

MATERIALS

Poland Solidarity

The Third Announcement of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Back Cover Cat (Painting)

Li Shuang

公開鳴謝

自中國之春成立以來，全世界各地愛國華僑對於民主運動，積極支持，大力援助，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多倫多、紐約、舊金山、台灣等地人民發起了籌款活動，日本、香港、洛杉磯等地人民還奔走相告，發動贊助訂戶。更有一些城市的人民主動為我們免費提供演講場地、飛機票、雜誌出售處以及住宿的地方。這種熱情使我們感動得流淚。這種思想，更證明了中國有希望，民主有希望！

「中國之春」一定不辜負大家的支持，我們一定會在「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旗幟下，奮鬥終身。

特此向各界人士

公開鳴謝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徵稿啓事

本刊決定自第四期開始，逐步轉成綜合性月刊。熱誠希望各界朋友、讀者、作者給我們來稿，特別是與民主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文章，將優先採用。

本刊歡迎來自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各地的稿件。

本刊歡迎多姿多采的形式，不拘時評政論，專訪特稿文藝創作等等。

本刊樂意接納各種不同觀點，並相信真理愈辯愈明。

本刊稿酬為每千字十元美金，較優秀的作品另計。

來稿最好用原稿紙，並留底稿，稿件原則上不退。稿件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郵寄稿費。

本刊編輯部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NAME

地址：

ADDRESS

中文

零售：每本 \$2.0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12.00

平郵：\$4.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第三號公告

中國之春運動展開已有半年。目前，運動正向縱深穩健發展。

「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號召，喚起了廣大的海內外同胞。運動從北美發起，然後波及全球。

繼「中國之春」雜誌創刊之後，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西部地區創辦了「追尋」。三月份，日本又發出一聲雷鳴，中國大陸留日學生出版了雜誌「春雷」。另外，美國紐約一批來自大陸的青年，創辦了「探索」。最近，我們又獲知，一些大陸、台灣和香港留學生聯合當地華僑，在美國俄勒岡波特蘭市組織民主團體「新中國統一建設民主同盟會」，並將出版機關刊物「民主中國」。這樣，在北美洲東西兩岸，地球東西兩側，要求變革中國社會制度的運動風起雲湧，形成了遙相呼應之勢。

中國之春主張的是多元化民主政治。我們始終認為，民主運動本身也應是多元化的。只要追求民主的大方向一致，大家就要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促進，形成百花爭豔的局面。

為了使民主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推展，中國之春運動總部決定在各大洲建立聯絡站。我們宣佈，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澳洲墨爾本聯絡站、歐洲巴黎、比利時、丹麥和荷蘭聯絡站已經成立。另外，北美洲波士頓和多倫多聯絡站亦已成立。中國之春總部希望當地志同道合者聯繫，共同推展當地的民運工作。

中國之春目前仍為民主運動，我們準備下一步在各聯絡站的基礎上，成立正式的團體。

有關聯絡站的通訊處如下：

總部聯絡信箱及電話：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TEL: (212)-507-1914

日本聯絡站聯絡信箱：

日本國橫濱市鶴見區鶴見郵便局私書箱 52 號。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CHADSTONG
P. O. BOX 70
MELBOURNE 3148, AUSTRALIA

歐洲比利時聯絡站：

P. B. 246
5000 NAMUR, BELGIUM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HOLLAND
TEL: 020-999037

歐洲丹麥聯絡站：

POSTBOKS 293
8100 ARHUS C, DENMARK

巴黎聯絡站：

CHINA SPRING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P. O. BOX 23, STATION G
TORONTO, ONT. M4M 3E8, CANADA

波士頓聯絡站：

P. O. BOX 1136
BROOKLINE, MA 02146

洛磯杉聯絡站信箱改為：

P. O. Box 1187
Rosemead, CA 91770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



作者李 爽 「L ATTENTE」

選自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通訊處：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電話：(212)507-1914

定價（零售）

美國：2.00 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